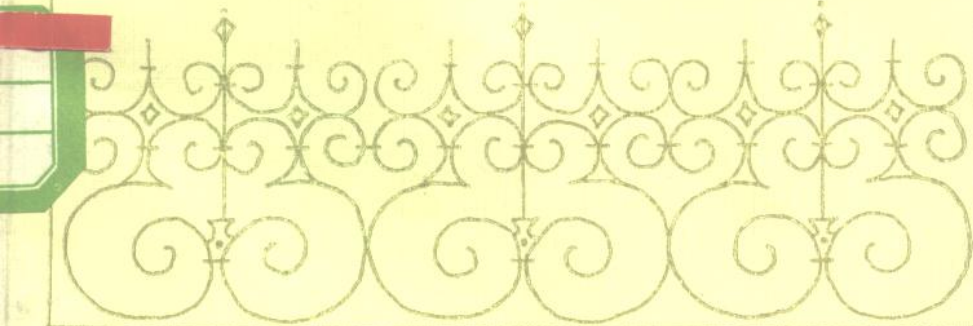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 一 卷

23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 一 卷

孙伯鍈 金隆德
任吉悌 涂荫森



山西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一卷

孙伯骥 金隆德

任吉悌 涂荫森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284千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4年5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 14,501—16,500册

书号: 2088·75 定价: 1.65元

出版说明

为了满足高等院校师生、理论研究人员、广大哲学工作者和各级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迫切需要，我们组织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大学和山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几位专业理论工作者编写了多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著。

本书第一卷，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过程及其伟大意义。作者严格依据史实，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进而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两次转变，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对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可贵的探索，《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面系统地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共产党宣言》把无产阶级这一新世界观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而丰富了这一世界观。

本书第一卷各章的执笔人是：绪论，孙伯鍤；第一、二、三、七章，金隆德；第四、五章，任吉悌；第六章，涂荫森。全卷统稿金隆德。

在本书定稿前，我们邀请汪子嵩同志和齐良骥教授仔细审阅了书稿，承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作者还请张恩慈同志、段世贤同志审阅了书稿，亦承他们提供宝贵的意见。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山西省委宣传部、人民出版社、南京大学、安徽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在此，我们一併表示由衷的感谢。

E/30/61

编者曾多次表示：他们编写这套书尚属尝试，书中难免有疏漏和谬误，热忱欢迎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从1982年起，将陆续出版二、三、四各卷，预计两三年内出齐。

山西人民出版社

理论读物编辑室

绪 论

为着科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绪论中，我们有必要先探讨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意义和方法等问题。此外，为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本书第一、二卷的内容，我们还将概括地论述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的几个时期。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意义和对象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认真说来，是近几年来的事。到目前为止，这样做的必要性也还没有得到哲学家们应有的重视。之所以没有被重视的一个客观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远远没有成为历史现象，而且在现实斗争中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仍然是现实斗争的思想武器，而不是如孔子和老子哲学或者德谟克里特和柏拉图哲学那样，对于我们仅仅有着历史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至今还没有被任何一种哲学所超过，它是得到实践证明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本身毕竟已经历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历史发展。从十九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诞生时起，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播和发展，影响所及，遍布世界每个角落，而且在世界的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活的面貌，开创了并且正在开辟着人类历史的新时代。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中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必然会遇到新的问

题。自黑格尔以来，人们就已懂得：科学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诞生之初，当然也不可能包含它在以后的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问题的现成解决方案，它只能在通过不断地概括和总结实践经验从而使自身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才能解决一个个迎面而来的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它的强大的生命力，不是包含在它的现成结论和公式中，而是包含在它的活生生的历史中，包含在它的辩证方法中。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把它的理论和历史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仅仅用理论的研究来取代历史的研究也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但真理是一个过程，它的正确性必须通过它的全部历史才能展现出来。只有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才能正确地、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斗争的历史。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以及机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不断的斗争中发展的。这个斗争很复杂，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人并不总是公开地打着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出现，特别是机会主义者往往自称最纯粹、最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随着历史的发展，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挂着各种时髦牌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要在历史舞台上充分表演和彼此角逐一番。在工人运动内部，这种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必然发展为政治斗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就不可避免地要和这些或那些个人、派别或集团的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各种机会主义者所糟蹋，这种状况又必然为工人运动的外部敌人所利用，他们幸灾乐祸地把机会主义者的哲学毒菌硬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现在，有些人所以发生所谓“信仰危机”，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

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存在着非常模糊的认识，他们往往不能从错综复杂的斗争情势中辨认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这种情况正说明，为了向广大群众进行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育，也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然而它的产生并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它是人类先进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它的每一个进步也都是在吸收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之后才得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任何形式的宗派学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它永远不会把自身封闭在一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体系中，即使在同敌对观点的斗争中，它也从不忽视吸收和借鉴敌对营垒中的每一个有价值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各门科学的总结和结晶，它必须跟上科学的发展，而不能做时代的落伍者。由于种种原因，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世界历史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研究，确实有些落后了。在世界历史的深刻变化和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面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面临着新的考验，面临着资产阶级哲学的挑战。这并不是说明资产阶级哲学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而是反映出在过去若干年内，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只满足于现成的公式，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出的日益增多的新问题关心不够，结果，只能听任资产阶级哲学去“解决”。无可否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在同现代自然科学若干学科有关的问题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些具体成就。这种情况，使很多人感到迷惑不解，以为资产阶级哲学竟然“果满枝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有花无果”。甚至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了。他们主张通过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兼

收并蓄，来“改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凡此种种，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面临着一个怎样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问題。

为此，我们必须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本问题上的区别和界限，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固有力量，还可以帮助我们认清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所谓最新观点，很多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史上被彻底批判和抛弃了的观点。我们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真正创造性的发展，不是恢复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证明其为错误的某些资产阶级哲学观点，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有方向来丰富它的内容，从各方面把它提高到现时代的水平。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发展中的科学来对待，是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的一条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研究的固然也是普遍的概念、命题和原理，但这些都是从大量的极其生动、丰富的具体事物中科学地概括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作为经实践检验过的普遍真理，它是不会过时的；然而，它必须去指导对新的具体事物的认识，并且在研究新情况、概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教条主义者离开这些哲学原理所概括的具体内容，也不去将这些原理运用于新的具体情况，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将这些原理绝对化、凝固化，把它们变成了空洞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是在科学地解决由历史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离开了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具体历史过程，就不

能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所以，为了避免教条主义，首先要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时也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有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呢？表面上看起来，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似乎是同一研究对象、同一内容，区别似乎只是前者按照历史的即时间上的次序来研究，后者则按照逻辑的次序来研究。若果真如此，那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建立就完全没有必要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理论历史科学，其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严整的哲学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超历史的纯逻辑体系，它作为一个哲学科学体系，是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在它的曲折前进中，又包含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按照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研究它作为一种严密科学体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之所以产生的各种充分和必要的条件，论证其历史的和科学的合理性，并且根据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研究它在历史和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的进一步的运动和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所作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考察、论证与研究。因此，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通过不断地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来进一步发现、丰富和阐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却不是直接地去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研究它的各种概念、范畴以及观点和方法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种种条件和根据，其中包括它赖以形成的历史

和理论前提，它的发展所概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以及在现实斗争中由实践作出的检验和修正，等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然也离不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不过它并不是仅仅从理论本身的逻辑上来把握理论，揭示概念和范畴的科学内容，分析和解剖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研究观点和方法的掌握和运用等等，而是广泛地根据各种有关材料，从逻辑和历史的结合上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研究它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如何和在什么条件下产生出来，并获得确定的内容，后来，它们又在什么条件下，沿着什么方向获得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经过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具体生动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丰富内容，而且能够对它的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提供实践的论证和历史的、逻辑的说明。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仅是历史科学，而且是理论科学，它不以探讨和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为限，而且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发展作出更加深入而具体的考察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哲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哲学科学史。作为一门哲学科学史，它要求象研究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样，用严密的逻辑论证，以及历史的和科学的丰富实践，来证明它的原理和概念系统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科学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它的理论前提——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指出它怎样掌握和改造了先前的各种科学，怎样概括各种社会生活过程并揭示出它们的本质，怎样掌握和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丰富成就，逐渐地、有科学根据地形成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无

产阶级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武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每一步都是和群众的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群众革命实践的成功和失败，必然这样或那样地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有关，实践有时从正面、有时从反面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并且用日益丰富的经验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仅要求同现实、历史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起来，而且要求直接同无产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历史联系起来。和任何科学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原理、观点和方法所作的评价，必须以实践为标准，但这里所说的实践是指全人类历史的实践和自然科学的事实与成就，而不是指任何个人的和局部的经验。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不应以任何个别的实例或局部的经验来加以证明或反驳，因为这里说的是一般规律，而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作为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伟大的认识工具交给人类，首先是工人阶级。

作为哲学科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不是单纯的历史编纂学。其实，即使是一般的哲学史，也不应当是单纯的历史编纂学，而应该是思想史的某种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这样，它不能仅仅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及其继承者们的思想和活动作历史的概述，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诠释，而应当力求站在时代的水平上，根据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作出一定的总结和评价。这样，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一门严整的科学，来研究它的发展和变化，并对那些被一度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其实是赝品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作出适当的结论，把它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概念系统中剔除出去。总结和

纯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清除在以往的历史过程中渗透到其中的杂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同一般哲学史的研究方法相比较，既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一般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当然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从历史（包括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去研究哲学思想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应采用这样的方法。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特殊性，它还应当有不同于一般哲学史的特殊的研究方法。

首先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论”和“史”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历史，同时又是理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概念和范畴体系的研究，必须把历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高度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史”和“论”，不同于一般历史科学中的“史”和“论”。这里的所谓“史”，不仅是指充分地占有详尽的历史资料，而且还指结合概念和原理系统的起源与发展，来确定和阐明它的理论内容。这就是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所研究的历史的理论资料，不是被当做既成的、静止不变的概念和原理体系来加以诠释和说明，而是被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中，从它们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来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而不致根据研究者的主观臆断，断章取义地诠释经典著作的内容。事实上，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中，断章取义的诠释方法，

过去占着相当地位，许多哲学工作者在争论中往往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概念，以致有些并不是特别难解的理论问题，经过多年的反复争论，仍然得不出明确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论”，也不同于一般哲学史中的“论”。它不仅包括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观点，而且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身要有深刻的理解与领悟。

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是一门有着鲜明党性的科学。它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推动它的发展而开辟的新的研究领域，只有在这个目标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才能建立起来，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很多，但其结论大都是歪曲事实的。例如，他们无中生有地捏造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所谓对立和分歧，别有用心地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和著作来反对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和著作。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的只是某种“创作天才”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中的转瞬即逝的表现，后来就渐渐衰退了。修正主义者出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常常根据他们的需要，时而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些作品，时而又大肆赞颂其另一些作品，并且随心所欲地作出歪曲的解释。教条主义者把经典作家们的每一部著作甚至每一句话都当做无可怀疑的绝对真理。对于他们来说，同样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并且是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采用科学的态度，才能建立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总之，把理论的研究和历史的研究、党性原则和科学态度密

切结合起来，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方法，这样做的好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个概念、范畴和原理都放到具体的历史联系中，放到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加以研究，从而既确定它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又确定它们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因而就能系统地、准确地和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

其次，是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突变，然而就其产生本身来说，它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的发展乃是一个在历史上发生的渐进过程，它的概念和原理是按照一定的时间上的顺序逐渐形成起来的，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但是，在研究这个历史事实的时候，除了必须研究和阐明每个特定的概念或原理借以形成的历史前提和条件以外，还必须研究它们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史的联系与线索，这就是说，必须揭示先后出现的各个概念和原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作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严密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个概念、范畴和原理在历史上形成的先后次序，决不是偶然的、杂乱的，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内在客观逻辑。只有把握住了它们之间的内在思想逻辑，它们在历史上的依次出现才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些经典著作家思想的演变，也只有摆到历史发展中去，才能正确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哲学，它的全部概念和原理系统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引进的任何一个新的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都不是从先前的哲学思想中逻辑地演绎出来的，也不是通过纯粹哲学的思辨制定出来的，而是在深入研究各门科学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抽象和逻辑的推理概括出来的。例如“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并不是从费尔巴哈的“人类”

这个概念中逻辑地推演出来的。虽然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人类”一词当做“社会”来理解，但在具体地揭示人们之间的物质生产关系以前，“社会”这个概念仅仅是一个抽象范畴。只有在马克思深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之后，才逐渐形成“生产关系”这个概念。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也只是在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的写作，即完成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之后，才最后制定并完善起来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在纯粹逻辑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现实、历史和科学思想的内容，它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历史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合乎规律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在现实斗争的需要中，为了回答和解决现实斗争中提出的各种问题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历史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密切相关。只有深刻了解近代历史和科学发展的状况及要求，了解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地位及其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实际斗争，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客观的逻辑必然性。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必须把历史的研究和逻辑的研究结合起来，既探索它的历史的根据，又探索它的逻辑的根据。

第三，是把理论观点的研究和方法论的研究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旧哲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一度信仰过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过程也就是他们从原来的哲学立场转向新的哲学立场的过程，即扬弃旧哲学和创立新哲学的过程。新的哲学体系的产生决不是在一刹那间实现的事情，也不完全是渐进的进化过程，而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如何从量的变化中区别出质的变化，就是说如何既不把量的变化看成质的变

化，也不把质的变化看成量的变化，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过程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时间定在《德法年鉴》时期，这显然是把量变看成了质变；另一些人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熟时期推迟到1847年，这又是把质变看成了量变。为了准确地断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时间，在研究他们的早期著作时，必须把对他们的哲学观点的研究同他们用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联系起来。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经过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然后扬弃费尔巴哈哲学而创立新的世界观的，要确定他们何时脱离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而过渡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单单从他们早期的著作中寻找唯物史观的萌芽显然是不够的。要判定他们是否已经在根本点上脱离了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除了对照研究他们的哲学观点之外，还必须把他们用来批判现实问题的方法进行对照和研究。例如，在马克思1843年到1844年初的哲学著作中，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方法就被马克思运用于对国家和法、私有制和劳动的批判。所以，尽管这时马克思批判研究的领域已经大大地超过费尔巴哈，但是他所运用的方法，他认识和理解问题的思想路线仍然是费尔巴哈的。在这类著作中，虽然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唯物史观的萌芽，但是它们所反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的转变仍然属于量变阶段，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界限。

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时，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方法，前者被恩格斯称做十八世纪的思维方法，并且在《反杜林论》中做了详尽的批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时，把个人看做“社会原子”，并且总是企图在个人身上发现借以构成“合理的社会制度”的“终极成分”，这种

“终极成分”被认为是不变的。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杜林,所用的都是这种方法。只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还没有抛弃这种方法,则无论他们所批判的是宗教、国家或私有财产,其根本的哲学立场还是费尔巴哈的。只有方法论的转变,才标志哲学观点的根本转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一般都具有非常完整的结构,从思想内容到观点、方法都形成一个整体。因此,必须注意从作品的整体上,即从它所采用的观点、方法以及基本思想内容的一致上来判断它们的性质。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思想都有一个演变过程,从他们早期著作可以看出,在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必然要产生出新的观点和方法的萌芽,而新旧观点和方法之间必然会出现矛盾,随着这种矛盾的发展,新的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就一步一步地从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因此,没有必要论证他们的早期思想和后期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只有从各个时期的思想整体来分析,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他们的思想演变过程中所发生的每一个转折,从而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的几个时期

本书第一卷讲述十九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第二卷讲述十九世纪40年代末至十九世纪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善和发展。为了对这些内容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有必要先概述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的几个时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 创立时期 (1837—1848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时期虽然是从1837年到1848年,但主

要是从1842年到1846年，即从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到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在这一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两度转变和三个阶段。第一次转变发生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转变到共产主义立场，从青年黑格尔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具有浓厚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第二次转变完成于1845年到1846年，通过这次转变，他们同时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活动开始于1837年，恩格斯开始于1839年。最初，他们都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力图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应用于对宗教和政治的批判与斗争。费尔巴哈在反基督教的斗争中同时摧毁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直截了当地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这就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下子从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过在社会历史观的转变上，费尔巴哈哲学并没有给予他们多少决定性的推动，而不过是起了某种中介环节的作用。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历史观点上发生根本转变的，是他们所参加的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是他们为了回答各种历史性的重大问题而对法国历史、英国工业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在这一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积极地参加了德、法两国的工人斗争，并和英国工人运动建立了联系；另一方面又阅读了大量文献，进行了许多方面的研究和著述。这些材料和著作，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经历了一个多么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绝不象任何其他哲学体系一样，是靠一两个哲学家关在书斋里杜撰出来的，而是在时代的激流中冷静地观察人类的命运和科学地总结十九世纪最先进思想的结果。所以，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上半期西欧社会

历史发展的本质，以及哲学和各部门社会科学发展的成就，对于理解作为无产阶级新世界观必然要在这个时期内诞生出来是绝对必要的。

普鲁士王国1842年的政治反动，对于推动马克思哲学立场的转变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普鲁士王国专制主义的反动本质充分暴露出来了，使马克思原来对普鲁士国家所抱有的一点改良主义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摆在面前的只有诉诸群众、诉诸武力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由于《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被迫从社会退回到书房，并且不久就移居巴黎，这不仅使他直接参加了法、德两国的工人运动，而且接触到最新历史和最新科学的大量文献，他的理论批判的锋芒，也立即从德国的国家制度转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上来。这一情况，促使马克思的思想在1842年底到1844年初发生了第一次深刻的转变。1842年底，恩格斯离开德国前往曼彻斯特，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也促成了他的思想发生了同样的转变。这种时间上的巧合，说明了英、法两国的现实历史发展，和在当时已经充分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刻矛盾，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站在现代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冷静地观察人类命运、科学地总结全部人类历史所作出的哲学概括。所以，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而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放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考察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由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发现的私有财产的运动规律，只是全部人类历史规律的局部情况。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必然依赖于马克思对历史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对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的改造。这就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1844年初就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但要真正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的水平，那还是以后的事情。后一个转变只是在1845年到1846年间实现的。

真正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史上的深刻变化的，是1845年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所拟定的批判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提纲也表达了恩格斯当时所获得的新观点。在那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费尔巴哈的发现除了少数几点保留以外，一直是极为推崇的。他们都认为费尔巴哈在哲学上发现并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出发点，即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个人，这个出发点成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论证社会主义运动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哲学基础。自从十八世纪以来，人们的思维着的悟性就成了衡量历史发展和一切社会制度的唯一标准。如果说，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已经埋葬了当初启蒙思想家关于解放全人类的美好理想，那末新兴的工人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又重新唤起人们久已埋藏在心底的关于未来社会的人道主义理想？所以，要创立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就不仅是要摆脱来自费尔巴哈哲学的个人方面的影响，而且面对着巨大的历史传统，这种历史传统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间历来都被看做一切进步思想的源泉。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极富于创造天才，但是要彻底冲破十八世纪思维方式的束缚也还需要经过艰苦的科学研究，需要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本质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而于1846年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则是两位奠基人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由他们发现的新学说。1847年，马克思运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蒲鲁东的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空想体系。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经典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告了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这样,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马克思主义就产生出来了。

(二) 运用和发展时期 (1849—1883年)

象任何一种现代科学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必然要有一个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和获得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直到马克思逝世。这中间经过了两次革命,即欧洲1848—1849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50年代末,马克思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改造,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接着又完成了《资本论》的写作,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解剖,同时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从70年代开始,恩格斯开始了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系统地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探讨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辩证逻辑问题。在这期间,为了回答杜林的挑战,恩格斯又写了《反杜林论》一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备体系。总之,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广泛应用于实际革命斗争和科学研究的领域中去,它不仅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

1848年春,《共产党宣言》刚发表,欧洲就爆发了席卷整个大陆的革命。这次革命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矛盾,在它的中心——法国具有鲜明的反资本斗争的性质。革命到处都因为资产阶级的背叛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而归于失败,历史的进程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现代社会发展的法则。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写了大量著作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特别从政治科学方面探讨和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规

律。

50年代初，马克思恢复了早在巴黎就已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由于他在革命后被法国政府驱逐而移居伦敦，使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具备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到50年代末，他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改造，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然后，他通过《资本论》的写作，完成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从而不仅制定了科学的哲学方法论，而且使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获得了系统完整的表述和严格科学的证明。《资本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包括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整个结构，作出了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说明，这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丰富实践）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

1871年发生的巴黎公社起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革命是激于对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卖国行为的义愤而自发地发动起来的，它的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惟其革命带有自发性，因而巴黎公社就成为革命工人阶级的历史首创精神的最令人信服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高度的热情和敬意，总结了巴黎起义的经验，赞扬并阐发了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认为它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备的形式，但却为未来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确立了不可磨灭的原则。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达到了完备的程度。

从70年代初开始，恩格斯由于彻底摆脱了使他厌恶的商务，决心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去，以便为他们的整个学说奠定自然哲学的基础。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总结近代自然科学的全部发展成果，证明整个自然界包括

它的各个方面，也象人们的思维和历史一样是辩证地运动的，自然界也有一部发生和发展着的历史，这对于证明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得到充分证明的完备的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恩格斯十分细心地阅读和评述了所有基础学科的大量科学著作和材料，通过他写成的论文和札记，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思想遗产。虽然恩格斯没有能够完成他的著作，但是他的富有成果的工作毕竟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奠定了自然哲学的基础。

70年代中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渗进了拉萨尔和杜林的机会主义思想，甚至一部分党的领袖也沾染了这些机会主义的毒菌。事实表明，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普遍缺乏应有的理论准备。为了反击机会主义并教育全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重要著作。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当做一个统一体系来阐述，科学地论证了三者之间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至此，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作为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而出现。

（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时期（1884—1895年）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肩负的任务更加沉重了。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耗费了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此外，作为德国和欧洲各国工人政党的领袖和顾问，他也不得不花去很多时间。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撰述工作。

1884年，恩格斯为了完成马克思的遗志，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这部著作的出版，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科学研究上的一个空白，创造性地阐发了关于两种生产的理

论，使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到了关于人类史前史的科学资料的证明。

1886年，恩格斯又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富有成果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并由此得出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而产生出来以后，任何企图重新恢复黑格尔哲学或费尔巴哈哲学的尝试都不仅是不能成功的，而且是反动的。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和北欧诸国的新费尔巴哈派，就是妄图复辟旧哲学的例子。90年代，即恩格斯逝世前的几年里，他为再版马克思的一些著作而写了导言，同时，为了澄清人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不正确和不完全的理解，他写了许多封长信。在这些文章和书信里，恩格斯根据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新的发挥和说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它第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几个主要时期。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	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阶级根源	7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	13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前提	18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最初转变	30
第一节 马克思初期的思想和革命活动	30
第二节 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 共产主义的转变	41
第三节 恩格斯初期的思想和革命活动	75
第四节 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 共产主义的转变	82
第三章 创立无产阶级新型哲学的理论探索	102
第一节 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地位	102
第二节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萌芽	131
第四章 批判思辨唯心主义，奠定历史唯物主义的 理论基础	152
第一节 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是社会主义理论战线的紧迫 任务	153
第二节 对鲍威尔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	163

第三节	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	169
第四节	对历史唯物主义重要原理的阐述	179
第五章	清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全面制定历史唯	
	物主义原理	200
第一节	包含无产阶级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200
第二节	对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清算	221
第三节	对施蒂纳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	232
第四节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	246
第五节	系统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252
第六章	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 进一步制定历史	
	唯物主义原理	281
第一节	批判蒲鲁东主义, 为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	281
第二节	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进一步制定历史唯	
	物主义原理	297
第三节	批判蒲鲁东的矛盾调和论, 进一步阐明唯物辩证法	
	的基本思想	318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问世和它在思想史上	
	实现的革命	340
第一节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340
第二节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	
	问世	34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	
	革命	36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 社会历史条件

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首先必须弄清楚为什么在十九世纪40年代会产生这种崭新的哲学形态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不是什么创始人“内心激动”的成果，也不可能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一定的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时，曾经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时，就必须了解十九世纪40年代世界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及思想发展的情况，弄清楚这些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

哲学虽然是远离社会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但它的根源仍深

^①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5页。

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同样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产生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却并不是专属德国的现象，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分析它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应着眼于十九世纪前半期世界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早在十四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孕育成长。从十六世纪起，欧洲的先进国家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实行分工协作的手工工场有了较广泛的发展。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路的开辟，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拓了新的活动场所。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大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起来。

十六世纪70—80年代，尼德兰^①最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发动了革命，十八世纪末又爆发了震撼全欧洲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些国家先后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广泛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在不断扩大，需要在不断增加，工场手工业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了，加之资本的积累，大量自由劳动力的供应，终于促成了由工场手工业向以蒸汽动力和机器为标志的大工业的过渡，发生了工业革命（亦称“产业革命”）。到十九世纪上半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有了三百年的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西欧一些国家占据了统治地位，欧洲几个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机器大工业阶段。

^①尼德兰是当时西班牙王国的属地之一，包括现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和法国的东北角。它也是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下面是英、法、德等几个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情况。

英国的资本主义产生较早，十五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已在英国封建社会内部萌芽成长。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到十六世纪，英国就已经有了相当繁荣的工场手工业。十七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斗争，终于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开辟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新时代。从十八世纪60年代起，由于珍妮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开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业革命，到十九世纪30—40年代，英国各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都先后采用了机器，形成了工厂制度。当时，英国制造着全世界需要的工业产品，成了“世界工厂”。

法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虽然稍后于英国，但早在十六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在法国封建社会内部开始萌芽。到了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在农业和工业中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北地区开始建立起资本主义大农场，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使得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也日益发展起来。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初，法国也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生产中机器的使用逐渐增多，1830年拥有蒸汽机六百二十五台，到1847年就猛增到四千八百五十三台，其中增加最快的是纺织业部门。

至于德国，也早在十五世纪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由于农民战争失败以后诸侯势力的加强，三十年战争的破坏，以及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它的经济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要迟缓得多。但是，到十九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和

英、法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德国资本主义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虽然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是它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构成部分，然而机械化生产也在逐年增加，1826年全普鲁士拥有蒸汽机仅五十八台，1837年增加到三百二十八台，到1848年又增至一千一百三十八台。施泰因-哈登堡的政治、经济改革，也促进了工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到40年代末，德国除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已发展成重工业区外，萨克森、西里西亚和柏林等地区的工业生产也有了飞速的发展。

除英、法、德等国以外，欧洲其他国家如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等国的资本主义大工业也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到十九世纪上半期，上述各国都先后进入了工业革命的阶段。

资本主义以大机器生产代替了封建社会分散的小生产，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英国，十八世纪初，棉花输入每年不过一百万镑，1764年约三百八十万镑，到1789年便增至三千二百多万镑。煤的产量1700年为二百六十万吨，1790年增至七百六十万吨，1795年又增至一千万吨。生铁产量1740年仅一万七千多吨，1788年为六万八千多吨，1796年增至十二万五千吨以上。在法国，棉花消耗量1831年是二千八百万公斤，到1845年增至六千四百万公斤。煤的消费量1830年不超过二百五十万吨，到1847年提高到七百六十万吨。铁和钢的产量1832年十四万八千吨，到1846年增至三十七万三千吨。铁路线长1831年是三十八公里，到1847年达一千五百公里。在德国，工厂生产的产值1820年为八千五百万英镑，1840年则增至一亿五千万英镑。棉织品和生铁的产量1844年约比1836年高50%。仅在普鲁士一邦，1831—1842年采煤量就由七百万吨增长到一千四百九十万吨。1835年始建铁路，1840年铁路总长四百六十九公里，到1850年达五千八百五十六公

里。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确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①

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新的大工业排挤掉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多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被突破。同时，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打破了以往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对于人们眼界的限制，使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能够达到全面的了解，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客观历史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经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包含着它自身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这就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贯穿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9页。

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始终。不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初期，它表现得还不明显，而到了十九世纪前半期，当欧洲各先进国家的社会经济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时候，这个矛盾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生产上的表现就是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它的阶级表现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牟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它不顾一切地盲目扩大，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而资本家用以扩大生产的一切办法又必然要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榨，使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买不起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于是就爆发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1825年7月，英国爆发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1836年和1847年，又先后发生了影响欧洲各国的经济危机。从此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以一定的周期循环往复地发生。它有如社会瘟疫，使千百万无产者遭到严重的灾难，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它尖锐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从生产力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页。

发展的动力，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①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为消灭自身创造了物质条件，它本身固有的矛盾的发展，预示着社会革命的时候已经到来。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阶级根源

毛泽东同志说：“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②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阶级基础，必须研究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获得的发展。

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雇佣工人。没有雇佣工人，资本家就不能生存。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然而与大工业相联系的近代工业无产阶级，则是在产业革命后形成的。恩格斯说：“产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③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页。

②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0页。

③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5页。

这个阶级，随着产业革命对一个又一个工业部门的占领，在人数上不断地增加。例如，英国使用机器生产的织布工人1820年为一万，1844年增加到十五万，十九世纪20年代，英国产业工人的总数就超过了两百万。又如，德国的工人1800年还不到九万，30年代初增至四十万，40年代末增至二百万，其中产业工人占八十万。随着人数的增加，工业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力量也增加了。

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资本家为了贪求最大限度的利润，采用种种方法大幅度降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廉价雇佣童工、女工，拚命榨取工人的血汗，使得大多数工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从恩格斯在十九世纪40年代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当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多么悲惨。在工人居住的贫民窟里，简直象猪圈一样，污秽不堪，臭气熏天，人畜杂处，疾病丛生。有些工人甚至还无栖身之所。就在1844年前后，伦敦就有五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何处安身。他们的生活毫无保障，今天找到工作就能勉强糊口，明天失业就只得挨饿。纺织工人和花边工人们织出了大批的丝绸呢绒和各式花边，供资本家 and 他们的太太小姐们去享受，而工人自己却往往衣衫褴褛，不能蔽体。再加上每天十五至十八小时的繁重工作和恶劣的劳动条件，工人们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结果弄得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被毁灭了。据统计，1840年英国工业区利物浦的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平均寿命只有15岁。正如当时人们所诅咒的：“工厂是地狱的真正入口。”无产阶级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无产阶级只

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才可能摆脱这种非人的境遇。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孕育成长的，早期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身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他们不仅积极地参加了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在革命过程中多次发动过本阶级的独立运动，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对私有制的批判，英国大革命时期杰腊德·温斯坦莱发动的“掘土派”运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组织的平等派运动。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开始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来，并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在英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当时工人用暴力来反抗对机器的使用。1769年，布莱克浦的哈克里夫工厂的工人捣毁了新发明的纺纱机。同年，英国国会通过法令宣布以死刑惩治破坏机器和厂房的工人。1779年，兰开夏的工人又开展了破坏机器的斗争，参加者近八万余人，发明水力纺纱机并建立第一个纺纱工厂的理查·阿克莱也遭到工人的惩罚。其后，又出现了以罢工形式反对厂主降低工资并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当时，工人们还没有认识到造成灾难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机器，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还处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工人运动还处于自发阶段。随着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加强，无产阶级的反抗运动也因之加剧。无产阶级在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没有政治权力就不可能根本改善自己的处境。从十九世纪30年代起，西欧一些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开始了独立的政治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有：1831年和1834年

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1836—1848年英国的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在工人运动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1830年7月法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金融贵族攫取了政权，在革命中流血牺牲的无产阶级不但没有得到好处，经济状况反而比过去更加恶化，这在群众中引起了普遍的不满。1831年11月21日，里昂丝织工人和其他手工业者为抗议厂商破坏工资合同、拒绝增加工人工资而宣布罢工，当工人队伍走向市区时，突然遭到资产阶级国民军袭击，于是工人们便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的工人高呼“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手持腰刀、长矛、棍棒和步枪，经过三天激战，占领了里昂市，拘禁了省长。他们在告市民书中宣布：“里昂将成立普选的初级代表大会，听取本省人民的要求，同时并将组织一个新的公民保安团。”^①这是工人对政权问题提出的第一次不十分明确的要求。但这个计划还没有来得及执行，12月初起义就失败了。到1834年4月9日，里昂工人为抗议政府逮捕工人互助会的领袖和颁布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的法令，又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工人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口号。这次起义获得了巴黎、马赛等重要城市工人的积极响应。经过六天血战，起义又被镇压下去了。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标志着法国工人已经开始走上独立政治运动的道路。

十九世纪30—4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也发动了全国性的争取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1832年英国议会实行选举制度的改革，

^①转引自让·勃吕阿：《法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4页。

只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而在这个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工人却没有得到选举权，这就迫使工人不得不用自己的独立行动来争取政治权利。1836年6月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次年6月，这个协会召集工人大会，草拟了一份致议会的请愿书，提出了争取普选权的六点要求。1838年5月8日，这个请愿书公布了，被命名为《人民宪章》。到1839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就有一百二十五万人以上。同年7月，请愿书遭国会否决，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1840年的经济危机，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农业受灾，全国饥荒，因而在40年代初第二次出现了宪法运动的高潮。1840年7月，组织了统一全国宪章派团体的宪章协会，称为宪章党。第二次的请愿书，除提出普选权外，还提出了废除贫民法，限制工作日，实行政教分离等要求，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三百余万人，占英国成年男子的一半以上。由于资产阶级激进派退出，这次运动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结果仍遭议会否决，罢工运动也被镇压。在1847年的经济危机和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下，宪章运动第三次形成高潮，请愿书宣布：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果实应享有优先权，人民则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五百万人。但随着法国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失败，欧洲反动势力得势，宪章运动终告失败。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政治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是整个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政权的进攻，它组织了第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英国的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①

^①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1页。

1844年8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是一次直接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斗争，并且提出了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问题。在当时的德国，资本主义尚未完全占统治地位，工人深受工厂主、包卖商和封建主的重重压迫和剥削。40年代初，工厂主为了和英国商品竞争，大幅度地降低工人工资以减少生产成本，使工人的生活极端困苦。1844年6月4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爆发了争取提高工资的群众性的武装起义，高唱着革命歌曲《血腥的屠杀》，对厂主进行了英勇斗争，并发出了反对私有制社会的呼声。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斗争目标极其鲜明地对准了私有制，对准了资本主义剥削。就在这次起义后的两个月，马克思便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象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①

法、英、德三国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充分说明在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争夺政权的斗争尚未结束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了。尽管这些运动仍不免带有一定的自发性质，但是，无产阶级显然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政治要求，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政党，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一切说明，阶级斗争已经发展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

^①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3页。

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不可少的阶级基础。

一旦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长期有意识、有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实践中，获得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这就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建立起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使之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实质，理解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

同时，在阶级斗争的发展中，各种因素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觉醒，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贵族和外国资产阶级时求助于无产阶级的力量，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还有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大量的教育因素；此外，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在近代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其中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十九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用科学的方法总结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形成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

恩格斯说：“象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

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

在欧洲，近代自然科学是在十五世纪下半叶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索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②

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中叶，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在与物体的简单运动形式即机械运动有关的力学和数学方面。意大利的达·芬奇是近代自然科学的最初代表，他在数学、力学和物理学等方面都有重要发现。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书出版，证明了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同其他行星一起绕着太阳旋转，推翻了地球不动的学说。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而大踏步地前进了。

自然科学在这一时期中的主要工作，是搜集和掌握材料。当时发展较快的是天文学和力学以及为它们服务的数学。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英国科学家牛顿，他在伽利略和刻卜勒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力学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并差不多与莱布尼茨同时地制定了微积分。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如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进展比较缓慢。人们所获得的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与发展，往往用力学观点去解释自然现象。

在这一时期，由于人们对自然界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使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②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7—348页。

自然科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方法容易使人们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以致逐渐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即认为在自然界中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一成不变、永远如此的。这就必然使得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具有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性质。

随着欧洲许多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大工业的建立，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近代自然科学进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这个时期，自然科学主要是整理材料，研究关于自然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联系。

当时在僵化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1755年，他发表了《宇宙发展史概论》，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他认为，云雾状的星云团由于吸引而不断凝聚，由于排斥而发生旋转运动，太阳系就是通过本身这种运动规律，从最初的混沌状态中，逐步发展成为有秩序的天体系统的。这就推翻了太阳系在上帝“第一次推动”后就永远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然而，康德的这一著作当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1796年，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给星云假说作了详细的数学上的证明后，人们对它才逐渐重视起来。

接着，自然科学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后，化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先后出现了拉瓦锡的氧化理论、道尔顿的原子论，特别是在1828年，维勒写成了《论尿素的人工合成》的论文，说明利用无机化合物可以合成一种有机化合物尿素，证实了无机物与有机物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中，1830年，英国地质学家赖尔发表了《地质学原理》，以丰富的材料论证了地层是在各种自然力的缓慢作用所引起的变化中逐渐形成的，把发展变化的观点带进了地质

学。在物理学方面，1831年，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这个现象把机械运动、磁同电流的产生普遍地联系在一起，它预示了电气时代的到来。

十九世纪30年代以后，自然科学在许多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基础上，相继出现了几项重大发现。

一是细胞的发现。1838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用显微镜发现了植物细胞，证实植物的所有组织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一切植物借以发展的根本实体。次年，德国解剖学家施旺把细胞说扩大到动物界，完成了《关于动植物的结构和生长一致性的显微研究》，奠定了动物细胞理论的基础。到40年代，经过许多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的补充和修正，说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生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一个生物体的成长发育，是通过细胞的分裂、增殖和分化来完成的，由于细胞本身具有变化的能力，从而出现有机体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细胞的发现，“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从前不可理解的奇迹，现在已经表现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依据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所共同的规律进行的。”^①这样，动植物之间的联系、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联系也就被揭示出来了，从而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二是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发现。1842年，德国医生迈尔从研究动物热的来源得到启发，于1842年、1845年，先后发表论文，论证了机械能、热、化学能、电磁能和辐射可以相互转化。英国的焦耳、格罗夫和丹麦的柯尔丁从不同的角度，用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37页。

不同的方法，几乎同时找到能量守恒定律的严密的科学根据，并计算出热功当量的数据。1847年，德国的赫尔姆霍茨在《论力的守恒》中也公布了自己独立研究的同样结果。这个规律揭示了这样的事实：“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①这就是说，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表现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而运动的总量保持不变。这一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不仅直接表现了物质世界的统一性，而且证明了物质运动的永恒性和绝对性。

三是进化论的发现。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德国、法国等都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物进化学说。德国诗人歌德首先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他在《植物变态学》中断言，所有不同形态的植物都来源于一种原始植物，所有植物不同的器官都来源于一种最原始的器官，即叶子。1759年，德国的自然科学家沃尔弗发表了自己的学位论文《发育论》，驳斥了预成论，科学地论证了渐成论。1809年，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进一步提出“用进废退”学说，指出一切物种都是可变的，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由古老的物种演化而来的，同样，人类也是以自然的方式通过变异由许多类似猿的哺乳动物演化来的。

总之，十八世纪后半期以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以上几项重大发现，使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得到了说明。至此，我们就能够依靠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了。这时，“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68页。

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①

自然科学发展到如此程度，迫切地要求一种哲学概括。这种哲学概括要能够揭示自然界发生的各种过程有规律的相互联系，还要能对自然界的发展作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论证，因而，这种哲学概括必然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可见，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到十九世纪前半期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及其几项重大发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牢固的自然科学基础^②，它从一个方面表明了唯物辩证法产生的必然性。正由于唯物辩证法呼之欲出，所以，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它，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不依赖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前提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前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是有其一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的。这些思想资料，除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0页。

②有许多论著把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看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因为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才发表，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达尔文的进化论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提供了自然科学的证明。

③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9—490页。

日益丰富的实证材料外，主要的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革命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我们知道，西欧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发展和发展的。从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适应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尔创立了近代资产阶级哲学。这一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洛克等人举起唯物主义经验论的旗帜，反对唯心主义“天赋观念”论，创立和发展了系统的机械唯物主义。但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他们不能同宗教神学彻底决裂。而当英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日趋反动后，便抛弃了唯物主义，出现了为之服务的贝克莱、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

十八世纪末的法国革命，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这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导的，是法国的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它继承了十七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完全抛弃了宗教的外衣，公开反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同时反对笛卡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并把唯物主义发展到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形态。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法国唯物主义仍然没有摆脱机械论、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也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具有突出的软弱性，加之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它要求进行资本主义改革，但又无力行动，并且惧怕人民的革命运动。当时德国的哲学革命，便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前导。这个革命由康德开始，他推翻了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继续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就是处于矛盾地位的德

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其中，作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的黑格尔哲学思想表现得最为典型：它的哲学体系是保守的，反映着德国资产阶级向贵族的妥协、屈从，以及对人民、对革命的恐惧和憎恨；它的辩证法则抽象地发展了被十八世纪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忽视了的主体的能动的方面，表现出它的革命性，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要求变革的进步性。费尔巴哈作为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代表，在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斗争中，重新举起了唯物主义的旗帜，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是，他的哲学仍然具有两重性，其进步的和革命的方面就是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宗教，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保守方面则是它所包含的唯心史观和宗教伦理杂质。

以上是近代西欧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和德国哲学革命的一般概况。下面，再看看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德国的哲学革命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德国哲学革命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辩证法思想，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

康德所提出的“星云假说”中，就包含有辩证法思想因素。康德的“星云假说”用物质的吸引和排斥的对立统一来说明宇宙的发生和发展，这是当时哲学中的一场革命。恩格斯说：“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①。在康德的这一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如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4页。

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

在费希特和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也包括有一定的辩证法思想因素。费希特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特别阐发了人的能动性，他认为“自我”是能动的，是能克服“非我”的阻碍的，“自我”要用“行动”来和“非我”作“斗争”。尽管费希特所讲的能动作用仍然是停留在自我意识范围内的活动，但是他把人看作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存在，就是企图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克服旧的机械论的缺点。谢林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但是其中也包含有辩证法思想因素，他看到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矛盾，把自然看成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认为有机物和无机物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还把精神生活也看作是有运动和发展的。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最大代表黑格尔，不仅创立了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而且第一个系统地以唯心主义的形式阐发了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同志说：“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①

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他把所谓的“绝对精神”描绘为是由许多方面、环节、阶段内在地联系着的发展过程，它由于自身的矛盾而不断推移和转化。这样，他就从精

^①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66年版，第278页。

神和概念的思辨之中猜测到了客观事物的辩证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①

黑格尔在对“绝对精神”发展过程的描述中，揭示了一系列事物运动的辩证规律。恩格斯在论及辩证法时，曾经指出：“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只当作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它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是整个体系构成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②

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黑格尔尽管错误地认为矛盾最后要被调和，否认矛盾斗争的绝对性，但是他在《逻辑学》和其它著作中都有十分精彩的阐述。他指出，具体的概念就是不同规定性的统一。在他看来，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包含有差别和对立于自己本身内的东西。”^③他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1页。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01页。

③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8页。

才具有动力和活动。”^①

关于质量互变的思想，尽管黑格尔对质变和量变的论述是唯心主义的，把质和量看作只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二个环节，但他也认为质和量是每个事物所具有的统一属性，猜测到了质变和量变之间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指出单纯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度，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在他看来，量变是“渐进的运动”，质变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是“飞跃”。他说：“一切生和死，不都是连续的渐进，倒是渐进的中断，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②这一思想也是深刻的。

关于否定之否定的思想，这是黑格尔用来建立他的全部哲学体系的基本公式。尽管他的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三段式实际上是一种虚构的公式，他还往往凭空臆造、歪曲事实来填补他的三段式的框子，但是其中也有许多合理的猜测。在黑格尔看来，否定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辩证的否定即扬弃；概念由于自身包含着自己的否定，因而转化为另一个概念；概念的运动、转化是循着肯定（“正”）到否定（“反”）最后达到二者对立统一（“合”）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不断提高和深化的。可见，他猜测到了人类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人们认识事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沿着螺旋式不断前进运动的过程。

此外，黑格尔也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

①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6页。

②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04页。

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①

由上可见，尽管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神秘的，但是他确实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列宁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②然而，黑格尔毕竟受到他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受到他那个时代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的限制，还受到他所代表的向封建贵族妥协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及其唯心主义世界观的限制，所以，他把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颠倒了、歪曲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它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最后被他的哲学体系闷死了。恩格斯指出：“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③

在黑格尔那里，尽管形式是那么唯心和抽象，他的思想发展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页。

②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3页。

③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事物的真正的关系虽然被颠倒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世界被迫必须符合于一定的思想体系，然而这种思想体系自身又只是人类思维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这样，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末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也立刻就会变成简单而明白的了。由此便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在走出这个迷宫通向正确认识世界的道路中，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十九世纪 30、40 年代，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中产生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它的最大功绩是在康德、黑格尔唯心主义长期统治德国后，重新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应有权威。费尔巴哈用这种哲学作武器，批判了宗教神学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

当时，基督教是德国思想界最主要的敌人，费尔巴哈花了很大精力来批判宗教神学。他认为，人是有赖于自然界而生成的，人崇拜自然，把它当作自己生命的主宰，因此，人对神的崇拜实际上是人的自我崇拜的一种表现。同时，人们在崇拜自然时，又把自己的本质移到了这种非人的东西上去了，使它成了一种人格化的超人的存在，所以说神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在费尔巴哈看来，上帝作为一个精神实体是不存在的。这显然是唯物主义的。他还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分析了宗教神学的认识论根源，并且把对宗教的批判推广到对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

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完成。因此新哲学（费尔巴哈称自己的哲学为“新哲学”、“未来哲学”——编

者注)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存在理由,主要是与对黑格尔的批判有联系的。”^①他指出,唯心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主体是一个抽象的、仅仅能思想的存在物,肉体是不属于人的本质的;与此相反,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则是:主体是物质的、有感觉的存在物,肉体连同它的全部特征正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费尔巴哈自觉地把他的哲学同唯心主义哲学对立起来。黑格尔把自然界看做是从逻辑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费尔巴哈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逻辑概念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他批判黑格尔“不是拿自己的概念去符合事物,而是相反地拿事物去附会自己的概念。”^②

黑格尔认为思维是构成事物、存在之本质的东西,是事物的原始基础,而事物、存在则不过是思维的“外在化”,这种“外在化”的东西,最后终究还要被否定而回复到它的原始基础——思维之内。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他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是别的,只是抽象的、与自己分离了的所谓有限精神。”^③

他认为,黑格尔的思维就是存在,思维是主体,存在是宾词,逻辑学自己思维自己的思想,实际上,这种思想或是无宾词的主体,或是同时兼为主体和宾词。与此相对立,费尔巴哈强调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存在的本质,就是自然的本质,“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

①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47页。

②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26页。

③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4页。

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①

此外，费尔巴哈还揭露和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神学本质。他指出：“黑格尔关于自然、实在为理念所建立的学说，只是用理性的说法来表达自然为上帝所创造、物质实体为非物质的、亦即抽象的实体所创造的神学学说。”^②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恩格斯说：费尔巴哈“不可遏止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③

费尔巴哈通过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然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也有严重的缺陷，这就是：一、对黑格尔哲学没有采取分析的批判态度，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仅仅看作是黑格尔用于体系的证明的方法，不懂得黑格尔在概念辩证法中猜到了事物的客观辩证法，因而把它简单地抛掉了。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他不懂得社会实践的决定作用，虽然他肯定人可以直接地感触到客观事物的现实性和真实

^{①②}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5、114页。

^③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性，但他不懂得认识是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而实现的。三、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离开人的社会性，抽象地用人的自然属性来说明人的本质，不但鼓吹建立爱的宗教，还企图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超阶级、超历史、到处适用、永恒适用的道德基本原则。

总起来说，费尔巴哈虽然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但是由于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局限，他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因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①这从哲学思想发展的角度，进一步透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当然，马克思主义是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理论的过程中，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遗产，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如果没有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以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改造，就不可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也不可能克服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来讲，其中最主要的思想资料 and 理论前提乃是黑格尔哲学中所提供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这是因为，从哲学思想发展的总体来看，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一旧的哲学形态推进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崭新的哲学形态，其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基础已经是确定的了，而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料 and 理论前提就是辩证法思想。这一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2页。

点,列宁讲得十分清楚,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成果,特别是用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能以产生的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认识是相对的。”^①毛泽东同志也明确地指出过:“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一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②

恩格斯在谈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产生的条件时,曾经说过:“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③同样,也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有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划时代的发现,有了德国的辩证法,因此,十九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①列宁:《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页。

②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8—279页。

③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7页注。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 和政治立场的最初转变

到十九世纪 40 年代，产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崭新哲学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成熟了，但是，还需要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用科学的方法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批判地吸取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遗产，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才能创造出来。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担当起了这一艰巨的任务，成了这一崭新哲学的创始人。

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成为这一崭新哲学的创始人呢？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①

第一节 马克思初期的思想和革命活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诞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城的一个犹太律师的家庭里。受过法国革命影响的特利尔城，当时正处于拿破仑失败后的反革命势力的统治下。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在特利尔又兴起了反对派运动，

^①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4页。

它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愿望，以及劳动人民、特别是日趋贫困的摩塞尔农民的民主要求。同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的矛盾已经显露，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特利尔也很流行。在当时潮流的影响下，卡尔·马克思的父亲希尔舍（亨利希）·马克思乃是一位推崇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开明律师，马克思就读的特利尔中学的校长和一些教师，都积极参与了进步的政治活动，甚至他的邻居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岳父）也向往真理与进步，他经常教导马克思要注意圣西门的人格和事业。这些，都对年轻的马克思确立自己最初的政治方向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马克思中学毕业考试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就表现出他在启蒙思想影响下所确立的最初理想。他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①在这篇唯心主义色彩浓厚的作文中，也有深刻的思想闪光，如说：“有些职业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这些职业对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巩固的、不动摇的信仰的年轻人来说，是极其危险的。”^②

1835年，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一年后，又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在这里，他进一步受到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教师和学生的影响。其中，黑格尔的学生、法学教授爱德华·甘斯对马克思的影响最深。甘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他认为奴隶制度在本质上还没有消灭，工人们为了不致饿死依旧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49、48页。

要象牲口一样地受剥削，应该把民主主义意识的火花带给这些不幸的无产者。由于甘斯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使他逐渐留心社会问题的研究并探索其解决的途径。

柏林大学在当时是黑格尔学说的研究中心。在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影响下，1837年马克思便放弃了法学研究而转向了黑格尔哲学。他研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翻阅了黑格尔的大多数学生的著作，并加入了由布鲁诺·鲍威尔、鲁滕堡、科本等几位大学讲师、中学教员和文学家组成的“博士俱乐部”，参与讨论黑格尔哲学和政治问题。

马克思开始跨进斗争生活，正是德国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而加速了普遍经济高涨的时期，随着资产阶级实力的增长而兴起了自由民主运动，与此同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萌生。在始于1835年的“青年德意志”的文学-政治运动逐渐衰落以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政治运动又代之而起。这个运动是通过黑格尔学派的分裂而逐渐形成的，其右翼如辛利克斯、加布勒尔、费舍尔等人，始终墨守黑格尔保守的哲学体系，用基督教正统思想来解释黑格尔哲学，片面吹捧黑格尔的法哲学，为普鲁士的反动统治辩护，其左翼则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方法，开展了宗教和政治的批判活动，以便适合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

从1835年施特劳斯（1808—1874）发表《耶稣传》开始，青年黑格尔派首先在宗教领域内展开了批判活动。这部书提出了福音神话发生说，宣称基督教只是一种历史现象，认为福音书起源于神话，而神话则导源于自发产生的传说，它们集中反映了早期基督教社团的幻想和希望。由于他把属神的东西完全移入人类的历史中，黑格尔关于神的概念所固有的形而上学的和超验的性质就被扬弃了，因而表现出同黑格尔反动体系的初步决裂。有关这

部书的论争，促进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形成。但是，由于没有得到资产阶级在实力上的支持，这个运动最初只是局限在思想领域内。他们同黑格尔一样，把历史发展主要看成是精神的运动，力图用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来决定未来，从而把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暂时地变为观念的斗争。

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不仅对神的存在表示怀疑，而且对耶稣其人的存在也表示怀疑。他不同意施特劳斯把福音书说成只是犹太民族的神话的产物，而是把它理解为基督徒的自我意识的表现。他片面强调自我意识，认为普遍自我意识具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所具有的那种作用。我们知道，黑格尔把思维同存在、精神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当作基本原则，与此相反，鲍威尔则重又回到费希特，认为普遍自我意识是通过自己同外部世界的不断对立而发展的。因而，在他看来，通过自我意识对现实中不合理因素的批判，特别是对基督教和基督教国家的批判，就可以促进历史的发展。在青年黑格尔运动中，卢格(1802—1880)首先使批判哲学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性质，他不仅用批判的武器来反对基督教，而且直接反对普鲁士国家的反动倾向，希望通过这种批判使普鲁士国家取得某种改革和进步，以适合资产阶级的意向。

然而，青年黑格尔派的世界观仍有着根本的弱点，因为他们大都是唯心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主张自我意识哲学，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极端轻视群众的实践活动，认为只有通过批判地思维的个人(杰出人物)的批判活动，才能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

正在这时，费尔巴哈(1804—1872)沿着与批判哲学相反的方向对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同时发动了进攻，从而推翻了唯心主义的统治，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他在《黑格尔哲学批判》

(1839)一文中指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导致虚妄的世界观,只有抛弃唯心主义,把哲学同具体世界、特别是同自然界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正确的世界观。

斗争是激烈的。青年黑格尔派一开始就遭到新教正统派和虔诚派的不断攻击,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当政时,由于文教大臣阿尔坦施太因的保护,境遇还稍好些。1840年,威廉三世和阿尔坦施太因相继去世,继位的威廉四世日益反动,他任命正统派分子艾希霍恩接任文教大臣,诏聘老朽反动的谢林主持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黑格尔主义者先后被逐出了大学。这样,青年黑格尔派对普鲁士国家所抱有的微弱希望终于破灭了,他们进而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使斗争更加尖锐化。

马克思在柏林求学期间,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一起,也热情地参加了反对基督教和普鲁士国家的斗争。在斗争中,他成了鲍威尔和科本等人的战友,经常给他们提供思想理论武器,被称为“思想的仓库、制造厂”和“思想的牛首”。

在这一时期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完整地表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

从1839年初起,马克思就开始广泛搜集资料,研究伊壁鸠鲁哲学,先后写了七本摘要和笔记。他最初是打算研究包括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在内的希腊后期的整个思潮的,后来由于要结束学位考试,只得先把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1840年下半年开始写作,次年3月底结束。

这时,马克思在哲学思想上已经摆脱了费希特式的主观唯心主义而达到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他在阐发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论证了个别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能动性,论证了独立自

由的个人在对周围现实的关系上所应采取的积极态度。马克思就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来研究伊壁鸠鲁哲学的。

马克思之所以对研究伊壁鸠鲁哲学感兴趣，不仅是因为这一哲学坚决否定一切宗教，具有无神论的性质，而且认为可以通过对古希腊哲学历史的批判考察来探索黑格尔以后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从马克思当时观点来看，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的哲学都是黑格尔所谓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它们和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发展相类似，都是时代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如果说在自由精神遭到粗暴践踏的希腊晚期社会中，自我意识哲学的出现意味着人们被迫到自己内心世界中去寻找自由与安宁，那末当时在基督教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德国也面临着为自由而斗争的类似情况，所不同的是人们将不是在内心寻找自由，而是力图通过以哲学为武器的批判斗争来改造外部现实，从而获得自由与解放。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有部分章节散失了，余下的部分主要是论述德谟克里特^①和伊壁鸠鲁^②在认识论方面的对立。马克思指出，这两人虽然是从同样的原则出发，都认为原子和虚空是万物的基础，但是，他们在一切方面的观点彼此却正相反对。

首先，在德谟克里特的认识论中，原子的概念和感性的直观互相敌对地并立着。一方面他把存在的感性现象看做主观的假象，另一方面，他视为真理和原则的原子本身却没有现实性，它们始终停留在纯粹抽象的范畴里。这样，作为实证知识的不倦的追求

① 德谟克里特（约前460—370），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者之一。

② 伊壁鸠鲁（前341—270），古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他捍卫和发展了德谟克里特的唯物主义原子论。

者，他不能不抓住感性现象这唯一存在着的東西，然而这个存在着的東西又是变化着的、不稳定的，因而不能直接被当做真理。相反，在伊壁鸠鲁那里，原子世界是作为他的伦理原则的永恒的自然基础而被设定的，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是不能相互矛盾的，凡作为原子（原则）而规定的東西，都必然体现在现象世界（经验生活）中，因此，他把感性世界认作客观现象，而以感性知觉为真理的准则，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①

其次，德谟克里特认为感性世界虽然是主观的假象，但是，正因为它与原则相脱离，处于独立现实性的地位，具有巨大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他不满足哲学，投入了实证知识的怀抱，认为认识世界是科学的任务；而伊壁鸠鲁虽然承认感性世界的客观性，但他认为在哲学里面就可以感到满足和幸福，因而轻视实证科学。

此外，他们的不同还表现在德谟克里特注重必然性，把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与此相反，伊壁鸠鲁则注重偶然性。他说，被有些人认为是万物的统治者的那个必然性，是不存在的，不如说，这些事物是偶然的。

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在认识论上的这些差别是如何产生的呢？除了导源于他们的哲学的不同特性（前者重在对自然的认识，后者重在伦理行为）外，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由于它们是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的不同表现。德谟克里特哲学是自由的希腊精神的体现，它充分肯定世界发展的合理性、必然性，把对新知识的不断追求当做最大的享受与乐趣。而伊壁鸠鲁哲学则是希腊城邦奴隶制衰落崩溃时期的产物，

①马克思：《博士论文》（贺麟译），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页。

这时许多人都被迫转向内心寻找安宁。马克思曾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情况：“飞蛾在普照万物的太阳西下以后就这样去寻找人们各为自己点燃的灯火。”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还根据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观点，阐发了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等思想。

马克思通过对偏斜运动的研究，揭示了伊壁鸠鲁原子所具有的质料和形式之间的矛盾。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虚空中有三种运动：一种是直线式的下落，另一种是脱离直线而偏斜，第三种是众多原子的冲击。第一种和第三种运动是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共同的，第二种运动则是伊壁鸠鲁对德谟克里特原子论所作的重大修正。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伊壁鸠鲁在这里将两个相互否定、相互矛盾的环节包含在原子的概念之中，他以原子按直线的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物质性，又以原子的偏斜运动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这种内在矛盾是原子的独立和自由的灵魂，是它的自我规定和自身运动的能动原则。德谟克里特没有达到这种内在矛盾的认识，他的原子仅仅是纯粹的质料，因而他的原子学说是机械论的。伊壁鸠鲁赋予原子以偏斜运动，使原子具有斥力，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打破了机械的必然性，同时又使众多原子的冲击和遇合成为可能，从而创造出世界来。在马克思看来，直线运动、偏斜运动和众多原子的冲击三者不是并列的，它们是原子在其生命过程中所具有的三个环节，如果直线运动表现原子的直接性即肯定，那末偏斜运动便是对它的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原子便按照它的概念实现了，它从本质世界过渡到现象世界，于是一个感性的世界就被创造出来了。可见，马克思在这里

①《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197页。

是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结构来理解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的。

马克思通过对“原子的质”的研究，分析了伊壁鸠鲁原子的本质与存在之间的矛盾。德谟克里特认为原子有两种质即形状和体积；伊壁鸠鲁则认为原子除了有形状和体积的差别以外，还把重量当做原子的本质特性。在伊壁鸠鲁研究原子的质时，就遇到一个明显的矛盾：作为本质的原子不应该有特质，作为存在的原子又必须具有特质。由于有了质，原子就获得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伊壁鸠鲁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在肯定原子有特质时，立刻就相反地肯定了一些规定来否定了这些特质，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这些特质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马克思在分析上述矛盾后指出：“对于原子的特质的考察，正如对于原子偏斜运动的考察一样都使我们得出同样的结果，即伊壁鸠鲁曾经客观化了原子概念中本质与存在之间的矛盾，因而就提供给我们以原子论的科学”。^①

马克思通过对“始基的原子”和“元素的原子”的分析，还进一步研究了伊壁鸠鲁的原子的内在矛盾。他指出，存在于虚空中的原子是始基的原子，而作为现象的基础的原子是元素的原子。它们并不是两种不同的原子，而是同一种原子的不同规定性。在原子的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与本质、质料与形式之间的矛盾，便被设定在个别的原子本身内了，因为个别原子具有了质。由于质，原子就从它的概念里异化出来；从具有了质的原子的排斥和聚集里，就产生出了现象的世界。在这种从本质的世界到现象世界的过渡里，原子概念中的矛盾显然达到了最尖锐的实现。因为原子按照它的概念是自然界的绝对的、本质的形式。这个绝

^①马克思：《博士论文》（贺麟译），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页。

对的形式现在是降低为现象的绝对质料、无形的基质了。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对原子作这样的区别，说明他把握住了原子的矛盾，并把这种矛盾加以客观化了。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具有这些“内在的辩证法”，所以他特别重视它。必须指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中虽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但如此深刻、辩证地说明原子的特点，这乃是马克思的理解。后来，马克思也说过：自己在关于伊壁鸠鲁的论文中，“根据一些残篇阐述了整个体系。不过，我确信这个体系，……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只是‘自在地’存在，而不是作为自觉的体系存在。”^①

马克思研究伊壁鸠鲁哲学的目的，是为通过对哲学历史的考察来探索黑格尔以后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因此，在论文中就必然要反映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以及在他解体以后出现的各学派的批判观点。

诚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写博士论文时，“马克思按其观点来说，当时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②然而，马克思这时却试图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冲破黑格尔哲学体系。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一样，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态度是把它的辩证方法和保守体系区别开来。他认为在黑格尔哲学中，那被保守的体系所隐蔽着的辩证发展观有着更本质的意义。他责备老年黑格尔派无批判地对待黑格尔哲学体系。在他看来，黑格尔所以从自己的哲学中作出保守的结论，其根源在于他的辩证法的不彻底性，

①《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3年3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0页。

②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2年版，第576页。

作为黑格尔的学生就应该阐发他的哲学的内在本质即辩证法。如何来改造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呢？当时马克思用的是个别自我意识的原则。在黑格尔哲学中，虽然包含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作为二者的统一的绝对精神，然而作为人的象征的自我意识，却始终充当着绝对精神的不自觉的工具，因而黑格尔哲学极度忽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没有给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留下充分的余地，这也使它对希腊后期的自我意识哲学十分轻视。为了把哲学变成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自由解放的武器，就必须提高作为人的自由的象征的个别自我意识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

同时，马克思认为哲学应该转向世界，实现自身，成为改造现实的武器。黑格尔虽然把绝对精神描绘为某种能动的过程，但这只是一种脱离主体的抽象思维的能动性，它仅仅对于体系的构造才是有用的。绝对精神这种抽象的能动性，只有转化为意志，转化为个别自我意识才能进入实践的领域。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只觉得同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有矛盾，但却不知道它自己的努力只是为了实现黑格尔哲学的个别环节。

马克思在揭示出青年黑格尔运动和黑格尔哲学这种又相对立又相继承的关系后，进而分析了从黑格尔哲学解体中产生出来的各学派。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后德国哲学内部的斗争，主要是在批判哲学和实证哲学之间进行的。一个要求转向世界，另一个要求转向哲学本身。前者是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力图利用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方法和理性概念来批判基督教和专制主义的现实，从中作出革命的结论，所以只有它才能带来真正的进步。后者是以费舍尔为代表的实证哲学，它把主要的批判锋芒对准黑格尔的理性内容（绝对理念），而对于基督教信仰持调和态度，结果出现了颠倒和混乱。

虽然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一样，都是从黑格尔出发转向自我意识哲学，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分歧。因为鲍威尔等人在摆脱了黑格尔哲学体系后，只是简单地恢复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则珍视黑格尔哲学的积极内容即辩证发展观。在马克思那里，自我意识只是客观精神所采取的主观形式，因而它必须具有精神所固有的一切环节如普遍性、个别性和否定性。马克思认为这一切环节在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那里分别地得到了充分的表述，只有把这些体系合在一起才形成自我意识的完备的结构。因此，黑格尔以后的自我意识哲学不是要回到上述体系中的那一种，而是要发展出集各个环节于一身的自我意识的完备结构。

以上就是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篇论文乃是马克思初期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

第二节 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初步转变，可分两个阶段：在《莱茵报》期间，由于投入反封建的实际斗争，促使他开始了转变；迁居巴黎与卢格合办《德法年鉴》期间，他参加了工人的革命活动，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初步完成了这种转变。

一、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从1840年起，由于普鲁士王国政府变本加厉的反动，青年黑格尔派中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反对反动当局的公开政治斗争中去。

继费尔巴哈之后,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先后被赶出大学,这就断绝了马克思最初想当大学教授的希望。因此,在完成博士论文后,马克思就不再从事纯理论的研究,而是以哲学为武器,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

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德国,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运动日益高涨,普鲁士的出版自由问题成了当时政治斗争旋涡中最为尖锐的问题。德皇威廉四世继位后,加强了专制统治,1841年12月24日他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给自己抹上了一层自由主义的油彩,说什么要“坚决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的限制”,“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似乎要给予人民出版自由,实际上,它不仅保存了老威廉的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且更强化了这种制度,强调禁止“在出版物中传播错误的和破坏性的理论”,规定不许攻击基督教。

这一法令公布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为自由的时代已经到来,“要享受这片刻的恩泽”,而马克思则戳穿了威廉四世的伪自由主义。他很快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指出这个新检查法令的伪善本质在于它没有在原则上否定书报检查,它不是放宽而是加强了书报检查,并且提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①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所写的最早的一篇政论文章,标志着他直接跨进政治生活。这篇文章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按其哲学观点来说,还是唯心主义的,仍旧把理性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然而,马克思这时已

^①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

与黑格尔和鲍威尔的观点不同，他不是象后者那样把这种决定作用仅仅归之于主观精神，也不是象前者那样把主观精神看成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无意识的工具，而是强调“精神个体性”即个人自由思想的积极作用。

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①撰稿，同年10月至次年3月任该报主编。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由于投入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对他开始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此期间，马克思根据斗争的需要，给《莱茵报》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短评和报道。马克思首先抓住当时莱茵省的主要事件——省议会的辩论，打算写几篇文章予以全面的评论，揭露政府的反人民政策。当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发表后，第二篇论文（论普鲁士政府与大主教的冲突）就被书报检查机关扣压了。《莱茵报》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科伦日报》的嫉妒，该报主编海尔梅斯在一篇社论中指责《莱茵报》攻击作为国家基础的基督教，吁请政府禁止在报刊上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马克思立即写了《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坚决地加以抨击。针对当时反动的历史法学派为祝贺其鼻祖胡果和新任司法大臣萨维尼所发表的宣言，马克思写了《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揭露了历史法学派的学说为专横和暴力辩护的反动本质。奥格斯堡《总汇报》攻击《莱茵报》发表了梅维森和赫斯的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文章，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回答了这种指责，由此引起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

^①《莱茵报》全名《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是一些持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同自由派首领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商妥后，于1842年元旦在科伦创办的一家大型的反对派的报纸。至1843年3月31日被迫停刊。

问题的关心，促使他参加了在科伦进行的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10月间，马克思就林木盗窃法问题的辩论发表了评论，第一次探讨了社会经济问题，痛斥了省议会将立法权变成保护林木占有者私人利益的工具。12月中旬，《莱茵报》连续发表了三篇描述摩塞尔地区农民的悲惨境况的通讯，引起了当局不满，省总监冯·沙培尔诬蔑通讯歪曲事实，诽谤政府，提出要公开辩论。在记者不肯答辩的情况下，马克思挺身而出，根据自己收集到的材料，以记者的名义尖锐地抨击了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12月底，普鲁士当局查封了《莱比锡总汇报》，《莱茵报》对此提出了抗议，立即遭到了《科伦日报》、《奥格斯堡总汇报》以及《莱茵-摩塞尔日报》的围攻。马克思和他们展开了论战。马克思退出编辑部前，还写了《论科伦省议会的选举》、《〈莱茵-摩塞尔日报〉的舞文弄墨》和《伟大的宗教裁判者〈莱茵-摩塞尔日报〉》，进一步表露出他对经济问题日益浓厚的兴趣，并第一次对假激进主义进行了批判。

从马克思的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上的转变已经开始了。

在政治立场方面，马克思站到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最前列，逐步深入地揭露和批判了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虚伪狡诈、专横暴虐及其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本质，坚持为备受压迫和剥削的劳动人民辩护。

当时，马克思面对的社会现实，就是虚伪和专横的封建专制。拿莱茵省议会来说，它虽是由贵族、市民和农民三个等级的代表所组成，但实际上是地主操纵的维护封建特权的反动议会。在第六届省议会期间，科伦的民众递上了有一千多人签名的一份请愿书，请省议会转呈国王。请愿书只是提出了一些极初步的民主

权利的要求，结果也被国王拒绝了。

对此，马克思接连写文章予以严厉谴责。他说：“如果等级会议这一新的人民代表机关的特征不是省本身在这里起作用而是别人代替省起作用，不是省代表它自己而是别人越俎代庖；那末这种代表机关就会丧失一切意义。脱离被代表人的意识的代表机关，就不成其为代表机关。”^①

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记录的公布，使马克思更清楚地看出议会不是人民的民主自由的代表机关，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在评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马克思揭露出诸侯、贵族的代表不仅反对书报出版自由，而且反对人们的普遍的“类的自由”，维护其个别等级的自由；书报检查制度扼杀了出版自由的普遍权利，却维护了普鲁士政府反动统治的自由特权。

在评论中，马克思虽然还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的，把自由、国家和法都看成是理性、道德的体现，认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但是，他却依据这种观点来为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辩护。他认为自由是人类的天性，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普遍权利，谁反对自由，谁就是反对人民。反对自由，也违背了国家和法的本质。

“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②马克思指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

^{①②}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55、71页。

件。”^①因此，为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也就是为争取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的斗争。

揭露普鲁士反动政府的专横暴虐，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辩护，这在马克思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表现得更为鲜明。

当时，由于农民日益贫困，盗窃林木、破坏狩猎和牧场的行为已成为常事。第六届莱茵省议会通过的林木盗窃法，根据林木占有者代表的要求，竟然把劳苦农民到森林里拣枯树枝当作盗窃林木而严厉惩处，这显然是封建主对贫苦农民物质利益的进一步剥夺。

马克思当时虽然对经济问题缺乏研究，但是他竭力从法律上、政治上批判林木占有者，保护穷苦农民。他说，拣枯树枝和盗窃林木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做违反森林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末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法定谎言的牺牲品了。”^②他又指出，贫苦农民到森林里拾拣枯枝，早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习惯权利，而普鲁士的林木盗窃法却剥夺贫苦农民的这些习惯权利，保护林木占有者这些特权者的习惯权利。

接着，马克思批判说，特权者的习惯权利以其欲求为出发点，力图尽量多地压榨劳苦群众，这种习惯权利其实是“习惯的不法行为”，不但不应保护，而且应当予以惩罚，而普鲁士国家实际上竟变成了林木占有者的奴仆，“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

^①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75页。

^②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9页。

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①

那些维护剥削者的特权的历史学家们煞费苦心地为特权者的习惯权利辩护，而马克思则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唯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②

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也“把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狠狠地干了一顿”。^③位于艾费尔高原和洪斯吕克山之间的摩塞尔河沿岸的农民，以栽培葡萄、酿造葡萄酒为生。十九世纪20年代中叶到30年代中叶，葡萄连年歉收，关税同盟建立后税率低，法国葡萄酒大量进口，价格跌落，销路不畅，而乡镇政权、高利贷者、资产者又对他们进行残酷的盘剥，在此重压下，农民不得不把很少一点土地连同葡萄树贱价拍卖出去。而政府对摩塞尔农民的灾难竟置之不理，反诬农民的求救呼声是“一种蛮横无礼的叫喊”。

对此，马克思激愤地说：“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④马克思在分析摩塞尔农民贫困的原因时，揭露了贵族地主利用国家政权疯狂地夺取农民土地的罪恶行径。他说：“不能

①②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0、141—142页。

③《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8页。

④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0页。

想象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政府无关”。^①正因为普鲁士国家保护剥削者利益的这一本质，造成了摩塞尔地区农民经常性的贫困。

马克思越是坚持为劳动人民辩护，越是捍卫被剥削者的物质利益，就越是接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肯定了共产主义是当代的重要问题，指出这一问题是由一无所有的等级即无产阶级本身的生活和斗争所提出的。然而，当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知识还是很缺乏的。只是到了后来，由于他参加了工人运动，系统地研究了法国社会主义学说，才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所达到的激进民主主义观点转向共产主义。

在世界观方面，经过实践的检验，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哲学破绽百出，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无能为力，因而开始清算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逐步向唯物主义转变。

黑格尔说，“国家应是一种合理性的表现”，是“地上的神物”，^②而法也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③他进而认为普鲁士国家就是这种精神的、道德的以及自由的体现，是社会发展的顶峰。开始时，马克思也认为国家和法律是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上，国家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④然而，他从现实社会的无数事实中看到：普鲁士国家及其法律只是

①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7页。

②③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85、10页。

④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8页。

维护少数富人的利益的，穷人则成了“法定谎言的牺牲品”^①。

马克思在评论林木盗窃法时已经感到，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国家应“根据国家的精神来对待罪犯”，即“国家不但有把事情办得符合于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普遍性和自己的尊严的手段，而且也有把事情办得适合于被告公民的权利、生活条件和所有权的手段”，然而，实际上国家不过是林木占有者的工具，它“使自己降到私有制的与理性和法相抵触的行动方式。”^②通过对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研究，马克思断定这一地区的经常的贫困状况“给我们揭示出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③这就是说，普鲁士的社会现实和黑格尔哲学所设定的理性国家的管理原则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矛盾。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国家是“理性的自由的王国”，然而，实际上那些占统治地位的贵族老爷们却“认为自由仅仅是个别人物和个别等级的个体属性”，认为“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逻辑地构成的体系’的幻想。”^④凡此种种，说明普鲁士王国不仅不是历史发展的顶峰，而且完全违背了理性国家的本性。

正是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产生了马克思所说的使他“苦恼的疑问”。为了解决这个疑问，马克思开展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开始探索另一条哲学路线即唯物主义路线。

①马克思：《第179〈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8页。

②④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4、58页。

③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9页。

马克思的世界观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强调理论批判要联系实际政治，开始探索哲学的客观基础，逐渐认识到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

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里，就主张哲学必须与世界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通过同海尔梅斯以及柏林“自由人”的斗争，更加强了他的理论批判必须联系实际政治的观点。

海尔梅斯在《科伦日报》社论中，针对《莱茵报》叫嚷道：“通过报纸传播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也象在报纸上攻击这些思想一样，都是不能容许的。”他反对报纸谈论哲学，实际上也就是反对哲学与政治相结合。

马克思认为，哲学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象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然而它充满了现实的社会内容，“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②

马克思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他相信，“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③ 尽管海尔梅斯之流想借助政府的命令来阻止哲学与现实的联系，然而哲学已经浸进沙龙、神甫的家、报纸的编辑部和国王的接待室，浸进同时代人的灵魂，就是

①②③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120、121页。

哲学的敌人的内心也受到了哲学感染，他们要求扑灭思想火焰的求救哀嚎就暴露了这一点。

哲学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走出纯粹思辨的天地，同具体的现实打交道，充分发挥它的战斗作用。从敌人的叫喊声中，充分显露了哲学的现实战斗力，“哲学是在它的敌人的叫喊声中进入世界的”^①。马克思在谈到这种新时代的哲学时，庄严地宣告：“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②

从以上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从强调哲学必须同现实世界紧密联系的角度，触及到了新哲学的人民性和战斗性。

在普鲁士反动政府的压力下，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越来越远离政治斗争，走上了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道路。1841年底，他们成立了一个以鲍威尔兄弟、梅因、布尔、施蒂纳等人为核心的所谓“自由人”的无神论组织。他们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宣称必须对宗教展开公开的斗争。他们尽唱高调，企图完全摆脱阻碍个性发展的任何权威。这种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使得批判哲学走向极端，越来越把批判变成目的本身。他们把《莱茵报》看成是自己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要求来稿必登。

马克思坚决反对“自由人”这种脱离社会实际，醉心于抽象的理论批判的倾向。他把“自由人”的那些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作品，或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当作废料淘汰掉，并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

^{①②}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对宗教的批判要联系对当时政治状况的批判。^①马克思的这些忠告，“自由人”根本听不进去，梅因反而写信提出横蛮无礼的要求。从此马克思就和“自由人”分道扬镳了。

为正因马克思在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由于一定时代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哲学，又对现实的实践有所反应并且指导它们的发展，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有无限生命力的。所以，他告诫我们：“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②

(二) 开始从经济利益出发试图阐明政治、国家和法的本质。

在对待出版自由的问题上，为什么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态度呢？马克思对此进行了研究。诸侯和贵族的代表根本不容许任何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认为实施最严格的书报检查是绝对必要的。他们坚决反对出版自由，就是为了维护这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等级的利益。这个“等级的个体利益、先天的片面性都表现得极其强烈、凶狠，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③城市等级中大资产者的代表，在出版自由问题上态度动摇，这是因其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封建势力有很大的依赖性。一般资产阶级的

①《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6页。

②③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9、42页。

代表虽然赞成出版自由，却又把它归结为行会自由，这充分反映出他们把一切都看作商品的精神面貌。只有农民的代表，才发表了与王公贵族老爷们针锋相对的意见，他们指出：“过分长期监督的桎梏使人难以容忍，人们渴求独立”，检查制度是“一种妨害人们论述公开谈论的事物的令人痛恨的羁绊”，因此，“检查制度过时了”。可见，不同等级对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正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同乃至对立的反映。

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使马克思开始看到了不同集团、不同阶级的物质利益的尖锐对立，以及这种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事实很清楚，贫民阶级的利益就是不仅本能地要求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且也感到需要满足自己权利的要求，而林木占有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赤裸裸地表现出对穷人巧取豪夺、贪得无厌的心理和惨无人道的暴行。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立法的最高标准，把法律当作自己利益的盾牌，把国家变成自己的奴仆，于是国家也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

当特权者的利益成为左右整个国家机构的灵魂时，作为立法者一分钟也不能超脱狭隘、卑鄙的自私心理，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因此，“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末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一丝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①

^①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8页。

对经济利益的分析,使马克思感到对国家、法律、伦理、道德、感情与私人利益的关系必须重新考虑,既然社会上一切现象都受着一定的利益所支配,那末要想让统治者放弃政治统治,放弃特权,就决不是仅仅向他们进行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这归根到底,是一个“私人利益”问题,即一个经济问题。这种认识给马克思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恩格斯后来回忆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①

(三) 在研究社会生活现象中探索社会关系的客观本质,从而接触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问题。

马克思研究社会生活现象,开始时是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为出发点的,当黑格尔的观点在社会实践的检验中逐渐破产的时候,他便开始探索社会关系的客观本质。

这一点,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讲得很明白。他说:“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 and 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②

马克思在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也总是竭力把握住社会关

^①《马克思致理·费舍(1895年4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6页。

^②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6页。

系的客观本性。比如莱茵省总督对于摩塞尔记者极为仇视，这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总督由于作为政府的代表，和人民处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中，他自以为忠于职守，是按国家规定的法律、条例、方法来管理这个地方的，这种地位就决定了他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官僚，决定了他对摩塞尔农民的请求抱敌对的态度。正是由于客观存在的这种官僚本质关系所决定，“即使行政当局具有最善良的意图，它还是不可能摧毁这些本质的关系的势力，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这种命运的势力。”^①

在有关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还指出了每一个公民通过千丝万缕的生活神经同国家联系着，对于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和自己心血相通的活的肢体的人，应被看做一个应该保卫国土的战士，一个法庭应倾听其发言的证人，一个执行着社会义务的集体中的一员，一个神圣的家主，一个公民，等等。他认为，国家不应该把森林条例违反者只看做违法者、森林的敌人，不能因为这个公民割断了某一根神经，而国家便有权割断他的所有的神经。马克思在这里所阐述的个人和国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观点，同他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讲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显然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

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客观本性的考察，虽然这时还没有象他后来所达到的那样从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法的关系的根源，但是，他已开始接触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问题。

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发展从属于精神的发展，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历史的进程决定于普遍自我意识的发展，最初马克思按照黑

^①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9页。

格尔的观点，也认为历史是从精神和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发生的，至此，他开始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并非决定于绝对精神，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从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①

二、马克思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从退出《莱茵报》到与卢格合办《德法年鉴》，这是他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急剧转变的时期。这段时期内马克思所写的著作和文章，反映出他已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离开《莱茵报》后，马克思便着手解决他在实际中所产生的对黑格尔哲学的疑问。他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②这部著作，就是马克思从1843年3月底到8月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对其“精神哲学”的第二部分“客观精神”的具体阐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开始从唯物主义立场对《法哲学原理》一书的第261—313节（即第三篇伦理第三章国家部分）作了全面的分析批判。

从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我们看到马克思的世界

^①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9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观又有了进一步的转变。

(一) 开始用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在世界观上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决裂。

当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开始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荒谬性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批判给马克思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使他能进一步转变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观点。

费尔巴哈于1841年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用人本学唯物主义分析批判了基督教和一般宗教，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影响。1842年费尔巴哈又写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3年2月登载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上），在这个纲要中，费尔巴哈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存在的根据在它自身中。”^①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则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思辨哲学一向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实在的进程是一种颠倒的进程。”^②这就是说，黑格尔哲学就是从思维中引伸出存在，从抽象中引伸出具体。因此，费尔巴哈指出，批判和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方法，“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词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③同时，他还指出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是别的，只是抽象的、与自己分离了的所谓有限精神。”^④费尔巴哈的这些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

①②③④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5、108、102、104页。

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在黑格尔看来，客观精神发展的第三阶段——社会伦理观念的现实化，也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发展阶段，国家乃是伦理观念现实化的最高阶段。黑格尔虽然讲国家是由家庭、市民社会发展而来的，然而却认为国家是它们的真实基础，把家庭、市民社会仅仅看作是达到国家的中介，是被扬弃了的有限性的领域，而国家则是超出了这两个领域的无限的现实的精神，是它们所追求的目的。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颠倒国家和市民社会、家庭之间的关系_的唯心主义实质。他指出：“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①马克思反复强调：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然而，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马克思的这些分析，揭露和批判了黑格尔完全颠倒了国家和市民社会、家庭的关系的唯心主义实质。

后来，马克思在总结这时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想收获时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0—251页。

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①据此,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阐明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批评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开始的,他所以能够这样做,只是因为批评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工作早已为费尔巴哈所完成了。”^②

马克思还从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方面,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学说的唯心主义实质。黑格尔把国家看做机体,但是,他不是从它的具体性、从它的有机发展来考察它和描绘它,而是把一些抽象的概念,如必然性、实体、组织变成决定国家发展的本质,而把国家变成这些概念的宾词。马克思说:“黑格尔要做的事情不是发展政治制度的现成的特定的理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和抽象理念发生关系,使政治制度成为理念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③总之,在黑格尔那里,由抽象向具体的过渡,就是由抽象思想制造具体现实。实际上,这种神秘主义割裂了抽象和具体的联系,所以,这种从抽象向具体的过渡是人为的,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联系也是虚构的。

必须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对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就在当时,马克思也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哲学的水平上。马克思研读了费尔巴哈的这个纲要,并没有无条件地同意他的观点。反之,他指出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②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页。

③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9页。

而过多地强调政治。”①

(二) 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的保守性，强调了革命在变革社会制度中的作用。

黑格尔把国家绝对化为宇宙精神的体现，把普鲁士王国说成是理想的国家，他在《法哲学原理》中费了不少气力来证明这一点。马克思在逐节剖析该书时，揭露了他的保守性，即黑格尔为了向反动制度讨好，竭力赞美王权，贬低人民的主权，美化普鲁士国家。

为了从法的观点来论证君主的全能，黑格尔以主权这一抽象概念为出发点，宣布君主是主权的体现，从而赋予君主以全能。而马克思则指出，这种全能不是别的，正是无限的任性。

黑格尔还认为君主的出生就决定了他的主权地位。马克思讽刺说：“这样一来，在国家最高峰上面作决断的就不是理性，而只是肉体的本性。”② 既然最高的社会地位成为由出生所注定的特定肉体的地位，“怪不得贵族要这样夸耀自己的血统自己的家世，一句话，夸耀自己肉体的来源。这当然是纹章学所研究的动物的世界观。”③

黑格尔认为，君主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应当依据官僚机构和以不同方式代表着普遍利益，并构成君主和人民之间的联系环节。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官僚机构是国家的特权行会，它首先关心的是保持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根本不代表普遍利益。

在批判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的同时，马克思提出国家的主权

①《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②③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5、377页。

应该属于人民，因为人民，首先是“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①只有主权属于人民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民主制的国家。

在剖析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中，马克思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深刻之处也正是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②同时，又指出了黑格尔关于矛盾观点的唯心主义实质。他说：“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而事实上这种矛盾的本质当然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质的矛盾。”^③他举例说，立法权自身的矛盾（即其中各种完全不同原则的冲突），只不过是政治国家的矛盾，因而也就是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这就是说，矛盾的本质存在于客观现实中，而不存在于所谓理念中。

黑格尔企图借助于等级、政府作中介，来消除市民社会和国王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把这种中介作用说成是逻辑的思辨奥秘，是合乎理性的关系。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这种企图用中介来调和矛盾对立的观点。马克思指出，这种中介本身，与其说是中介的存在，还不如说是矛盾的存在。比如，作为国王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中介的立法权的等级和政府这两个要素，它们对立尖锐到随时可能发生斗争的地步，甚至还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性质。同时，中介可以变成为极端，最初被规定为两个极端的中介的东西，现在自己成为一个极端。这正如夫妻吵架时医生劝解的故事一样，医生本来想当调解人，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医生反而和

①②③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5、312、358页。

丈夫或妻子吵起架来了。

同时，马克思把矛盾对立概括为两种：一种是两种不同的本质的对立。“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它们既不相互吸引，也不相互补充。”^①另一种是同一本质的两种对立的规定。如说“‘两极是相通的’，北极和南极相互吸引，女性和男性也相互吸引”。^②马克思还认为，尽管两个极端都真正地存在着，然而“一个极端占了另一个极端的上风，两个极端的地位各不相同。”^③

此外，马克思还批评黑格尔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矛盾，并把这种表面当做事情的本质。他认为，“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④

由上可见，马克思初步论述了辩证法的矛盾问题，当时显然强调了对抗性矛盾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和作用，强调了这类矛盾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而对对立面的统一则谈得较少，对对立与统一这两者的关系尚未论及。

黑格尔作为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不敢从根本上触动普鲁士的君主统治，但是也曲折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他指出国家制度的前进的运动，“从外表看来是一种平静的觉察不到的运动。久而久之国家制度就变得面目全非了。”^⑤如此说来，国家制度发展中的质变、飞跃和革命就被完全否定了。马克思批判了这种改良主义的论调，他指出：第一、这种逐渐推移从

①②③④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5、355、356、359页。

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16页。

历史上看来是不真实的；第二、它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诚然，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①马克思强调了革命在变革社会制度中的重要作用。

这种社会革命的思想，在马克思为筹办《德法年鉴》所写的书信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展开。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分析了当时德国的现实，指出：“自由主义肩上的华丽斗篷掉下来了，极其可恶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的面前。”^②就是说，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改良的企图没有实现，用资产阶级共和国代替封建专制制度理想也破灭了。卢格对此灰心丧气。马克思却从这种绝望的社会现实中看到了希望。他说：“工商业的制度，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③就是说，旧制度的灭亡是必然的。

他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④马克思虽然对社会“往何处去”的问题还很糊涂，但他却满怀热情地探索着通向未来的道路。他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在于不是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总之，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获得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线索，促使他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1843年9月—10月，马克思还为《德法年鉴》写了《论犹太人问题》，进一步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5页。

②③④《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7、414、414页。

深化了他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所取得的理论认识。

犹太人问题，是德国当时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住在德国的犹太人，大多信奉犹太教，与奉基督教为国教的普鲁士国家处于对立地位。自1816年5月4日，普鲁士政府发布了关于犹太人不得担任公职、只能在国家中居于从属地位的命令以来，犹太人一直要求与基督徒享受平等的权利，遭到政府拒绝。然而，由于犹太人从事工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在经济领域中有着相当的势力，政府又不得不容忍和保护他们。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高涨，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讨论。布鲁诺·鲍威尔于1842年底到1843年初，接连发表了《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篇长文，认为基督教德国的宗教本质决定了它不能解放犹太人，犹太教的宗教狭隘性的本质也决定了犹太人不能获得解放。这在客观上支持了普鲁士的对待犹太人的反动政策。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以及一般德国人的解放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鼓吹实现民族解放首先必须消灭民族宗教的谬论。这种把现实问题抽象化的观点不利于德国人民对现实制度的批判，阻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以《论犹太人问题》为总标题，系统地反驳了布鲁诺·鲍威尔的这些谬论，从中我们看到马克思的世界观的转变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在对宗教这个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力求贯彻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得出的关于国家和法植根于市民社会的观点的运用。

如何看待犹太人的解放，这涉及到对宗教的认识。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变成了纯粹宗教的问题，这显然是在神学里面兜圈子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

陷的存在，那末这个缺陷的根源只应该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①正是基于这种唯物主义的认识，马克思提出，我们不要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要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马克思在具体分析犹太教问题时，也贯穿了这一基本观点。他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②现实的犹太人，在从事工商业活动中，把赚钱作为一切活动的目的，他们奉行的原则是利己主义。正是这些构成了犹太教的基础，犹太教正是从犹太人的这种活动中发展起来的。

可见，马克思当时虽然尚未提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样的科学概念，但是，对于这两者的关系，即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思想却有了进一步认识。

马克思根据在犹太教中有其虚幻反映的工商业实践来探讨犹太精神的历史发展，把犹太精神看作社会发展的产物，认为历史的发展把犹太人变成金钱势力的体现者，它也必然会随着这些条件的消失而灭亡，因此，问题不在于犹太人自己有没有解放能力，而在于人类解放的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实际上，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由于金

^{①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446页。

钱通过他们而成了世界势力，他们所掌握的金钱势力也必然会转化为实际的政治权力。

(二) 驳斥了鲍威尔颠倒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混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谬论，区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探讨了真正人类解放的本质和特性。

鲍威尔从唯心史观出发，认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这是政治解放的一个前提，一方面，他要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一切人放弃宗教，以为这样才能作为公民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是宗教的完全废除。鲍威尔“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出的条件只能说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全人类解放混淆了起来。”^①

马克思在论证了宗教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关系之后，全面地研究了宗教与人类解放的关系。他指出，象鲍威尔那样，只是探讨“谁应该解放别人”、“谁应该得到解放”这样的问题，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的，还应该研究这里指的是哪一种解放？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的成员之所以信奉宗教，是由于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二元性，是人们相互脱节和分离的表现。只要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宗教的根源，宗教就会存在。

“因此，我们不象鲍威尔那样向犹太人说，你们不先从犹太教彻底解放出来，就不能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相反地，我们对他们说，既然你们不必完全和无条件地放弃犹太教，也可以在政治上获得解放，那就说明，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②

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政治解放”，相当于他后来所讲的资产阶级革命。他明确地说：“政治解放同时也是人民所排斥的那种

^{①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24、435页。

国家制度即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旧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呢？一句话：“封建主义。”^①而他在这里讲的“人类解放”则相当于他后来所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用暴力达到“废除私有财产、限定财产最高额、没收财产、实行累进税”^②，以及消灭阶级差别，使人们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都实现真正的平等。

犹太人怎样才能得到解放呢？如果鲍威尔说的解放是指的政治解放，马克思认为那是无须放弃宗教的。例如，作为政治解放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消灭宗教，而是实现了国家与宗教的分离，不再把宗教尊奉为国教，宗教变成了人民私人的事情，从而实现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政治解放推翻了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当然是一大进步，但是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人的实际的宗教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利己的原则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就连宗族延续和男女关系都成了做生意的对象，因而，仍有宗教存在的根源。马克思认为，就是在绝大部分人还在信教的情况下，国家也完全可以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根据这种观点，犹太人不放弃自己的宗教仍然可以得到政治解放，他们要求和基督徒享受同等自由、平等和安全等权利是完全合理的。

如果鲍威尔说的解放是指人类解放，那末，人类解放并不以废除宗教为前提，恰恰相反，宗教的消亡却要以人类解放为前提。“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也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象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中、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③不仅如此，它还能启迪犹太人“直接从事

①②③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430、446页。

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①

从马克思所区分的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来看，鲍威尔所说的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研究的结果是，同工人和妇女的解放一样，犹太人的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提出“人类解放”的任务，说明他的世界观在不断前进。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迁居巴黎。由于当时巴黎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比较发达的地方，使他能够直接接触无产阶级，参加工人的各种革命活动，并开始研读法国革命史，英国古典经济学，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以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的著作，从而促进他完成了世界观的初步转变。这明显地表现在他于1843年12月至1844年1月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篇导言，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紧密结合德国现实的阶级斗争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解放的途径。这篇重要著作从多方面反映出了马克思思想认识上的飞跃：

（一）从理论上总结了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强调哲学的任务是要把对神学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当时在德国，随着革命的发展，对宗教的批判经历了一个过程。开始，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宗教进行了批判。接着，费尔巴哈又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推进并深化了这一批判。他指出，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我们的宗教的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这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

^①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6页。

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这样，他便戳穿了宗教的神秘性，远远地超过了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等人。然而，费尔巴哈由于其人本主义的局限，不把人看作社会的人，只是用孤立的个人的心理活动去解释宗教的产生，因而未能揭示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未能指出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也未能做到把批判宗教与批判德国封建制度结合起来。

马克思则从更为彻底的观点出发，力图揭示真正人的本质及宗教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①这就是说，人是社会的人，他是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生存的，而宗教也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基础的。在私有制社会里，劳动者做牛做马，饥不得食，剥削者却花天酒地，作威作福，一切都被颠倒了。劳动人民在现实社会里受苦受难，又不了解自己苦难的根源，便把幸福寄托于幻想世界，所以，“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②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它起着麻痹人民的反动作用，因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③

就当时德国来说，在理论上对宗教的批判实际已告结束。然而，宗教的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做到这点，当然不能

①②③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2、453、453页。

象鲍威尔等人那样只是停留在对宗教的批判上，而是要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把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二) 在分析研究当时德国状况的基础上，对理论与实践、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论述。当时英、法等欧洲主要国家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却仍处于封建制度的统治下，从社会发展的阶段讲，德国低于其它国家发展的历史水平，所以，在法国和英国行将结束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那里正在解决的问题，这里矛盾才被提出。

尽管德国是落后的，它的国家制度仍应成为批判的对象，这种批判依然是有意义的，它可以给敌人以打击，激起人民的勇气，促使德国人民觉醒起来；同时，这种批判对先进民族也是很有教益的，因为历史不断前进，它要经过许多阶段才能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有如德国的旧制度的残余依然在压抑着它们，因而仍然要同这种旧的残余进行斗争一样。

当然，批判还是要抓住当代问题的中心，它不仅要批判旧的封建制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才能把批判提高到这样的水平呢？当时德国的社会制度虽然落后，但体现在黑格尔著作中的德国的法哲学，却实质上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理论概括，因此，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否定。

但是，当时对德国社会制度的批判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实践派”，企图通过直接行动来影响和改变现实制度，忽视理论批判的作用；另一些由柏林的“自由人”组成的“理论派”，则轻视实践，把一切斗争都归结为理

论斗争。马克思批判了这两种错误倾向，认为必须把对德国现存制度的批判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并通过革命实践去解决这一课题。

然而，德国的革命实践是否能站到当代的高度，即不仅要达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而且要提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呢？

马克思根据对理论与实践、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的唯物主义的理解，探讨并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只要理论抓住了社会问题的根本，它就是彻底的理论。就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就是把德国革命的实践提高到社会主义革命高度的关键。

由于德国当时的落后，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确面临着重大困难，因为“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②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德国社会的现状。指出德国集中了当代文明社会和野蛮的旧制度的缺陷于一身，它越来越多地含有超出它的现状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某些不合理的方面。这就是说，当时德国不仅客观存在着资产阶级及人民群众同封建制度的矛盾，

^{①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462页。

而且已经客观地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所以当诸侯同帝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斗争的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就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①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阶级斗争的概念。起先，他对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看法还有些抽象，而这时他已把阶级斗争当做了他的历史观的基本概念之一。他认为，在德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可能性，就在于它已经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

(三) 认识到工业无产阶级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心脏”，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是随着刚刚着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贫苦群众，组成了无产阶级；同时，自发产生的贫民和原有的农奴等级也在逐渐不断地充实无产阶级的队伍。

无产阶级为其地位和利益所决定，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它与共产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完全被锁链束缚着的阶级，是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是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它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起码权利，它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社会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5页。

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已与私有制彻底决裂，因而它能坚决铲除私有制。可见，在关于解放人的问题上，马克思已经发展了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提出的论点，而把即将使人得到解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理解为共产主义革命。

关于什么是世界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黑格尔断言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作为意志而自行实现的理性力量”的国家。他鄙视人民为“无定型的群众”，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是自发的、非理性的、野蛮而可怕的。鲍威尔一伙抛弃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自命为“英雄”，宣称自己的“批判精神”就是推动社会改造的力量。他们仇视人民，因而与当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相对立。

马克思在正确地估计了英、法等国无产阶级在历次社会运动中所显示的力量，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革命性之后，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因素，从而得出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科学结论。据此，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心脏”。他指出：“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①，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这样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向敌人傲然挑战：“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②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第一次提出了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论点。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

①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6、464页。

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①实现人类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在于这两者的结合。所以，马克思又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他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②所有这些，都精辟地阐明了正在形成中的新型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使它同以往的一切旧哲学根本区别开来，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列宁在谈到它们的意义时指出：“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③马克思这两篇文章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力求解决物质和意识、市民社会和国家以及法和宗教的关系，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以及革命理论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等问题，尽管他当时尚未深入地研究经济问题，有些概念还不成熟，然而他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初步转变已经完成。如果说，马克思发现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宗教、政治和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依赖关系，使他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的话，那末，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发现，则使他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①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页。

③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7页。

第三节 恩格斯初期的思想和革命活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位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出生在德国莱茵省巴门的一个纺织工厂主的家庭。从恩格斯的曾祖父起，就在这里经营漂白、纺纱和花边作坊。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个虔信宗教的干练的工厂主。和马克思的那种开明的家庭不同，在恩格斯家中，笼罩着保守的虔诚主义精神，因而恩格斯年少时接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首先就得同家庭内这种虔诚主义进行斗争。

巴门在当时是普鲁士莱茵省资本主义纺织工业的中心城市（1930年巴门与爱北斐特合并成乌培塔尔市）。十九世纪30年代，巴门和爱北斐特共有居民四万多人，约有二百个中小型工厂（其中大多是纺纱厂、织布厂和染坊），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都极其恶劣。随着工业革命由英国传入德国，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然而机器的引进，却摧毁了家庭手工业，致使成千上万的工人流落街头。和受过法国革命影响的特利尔不同，巴门保守的虔诚主义的资产阶级不要自由主义，根本不参加争取出版自由和宪法的斗争，对1830年七月革命没有任何反映。他们所关心的是建立关税同盟、修筑铁路等经济问题。

在精神生活方面，当时巴门为虔诚主义所笼罩。虔诚主义这一宗教派别产生于十七世纪末，源于新教。它的代表人物反对当时流行的教会教义，宣传一种讲求实际和民主的基督教义，要求它的信徒过一种虔诚节俭的生活。起初，它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起过革新的作用；后来，日益蜕化为一种宗教神秘主义，转而反对资产阶级进步的启蒙思想。它宣扬人们尘世生活的“空虚”，胡说劳动群众的罪孽是他们穷困和痛苦的真正

原因。当时，只要是与虔诚主义教条相违背的思想和活动，都受到谴责，被咒骂为魔鬼的行为。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长大起来的恩格斯，从小就渴望着自由，憎恨封建专制制度，厌恶那给劳动群众带来沉重灾难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不是一下子就和自由民主运动发生接触的，但是，其社会生活条件使他从小就对工人群众深受压迫和贫困的悲惨情景有着具体的感性认识，这就使他容易接受自由民主思潮的影响。

恩格斯在十三岁以前，在巴门的理科中学读书，打下了数学、物理等方向的牢固基础。十四岁时，他进了全普鲁士最好的学校爱北斐特市立中学。爱北斐特的资本主义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里的工人早在1829年就起来捣毁机器，反抗过工厂主。自由民主运动在这里也较活跃，爱北斐特中学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教师对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有过较大的影响。

恩格斯的父亲为了把他培养成为自己事业的继承者，防止他向“危险”的思想道路上发展，1837年9月（即他中学毕业前一年）令其辍学。次年8月，恩格斯被送到不来梅，在他父亲的朋友经营的一家大公司里当办事员。虽然不来梅在当时也笼罩着宗教蒙昧主义的气氛，但这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使年轻的恩格斯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

恩格斯对“生意经”根本不感兴趣，对家庭和工商业界的庸俗习气十分厌恶。他利用不来梅的有利条件，阅读了大量的书报，从事业余诗作活动，并同“青年德意志”运动建立了联系。在一首题为《贝督因人》的诗里，恩格斯把贝督因人过去在祖国所过的自由而自豪的生活，同他们作为演员而被迫从事的屈辱的职业作了对比，第一次表达了强烈地向往自由的政治观点。在业余，

恩格斯还从事科学和政治问题的研究。他在1839年4月8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还谈到由于思考当时社会上所议论的宪政问题、犹太人解放问题、取消一切宗教强制和一切世袭贵族等问题，夜里睡不着觉，每当翻阅一本什么杂志时，都很注意寻求自由事业的进展情况。

在巴门和不来梅，恩格斯都注意深入考察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十分同情，而对资本家和上层社会则深恶痛绝。为了发表自己的新观点，并同旧世界作斗争，恩格斯经常给自由主义的报刊《德意志电讯》、《知识阶层晨报》等撰稿，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致使工人劳动繁重，工资低微，生活贫困，疾病蔓延，大量死亡。这种鲜明的态度和感情，充分地表现出恩格斯同旧家庭和旧社会秩序彻底决裂的决心。

1839年，恩格斯也被卷进了宗教、哲学、政治的社会斗争的漩涡，在思想上逐步形成了激进民主主义的观点。起先，在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影响下，恩格斯摒弃了正统教派。不久，他阅读了施特劳斯的作品，热烈地拥护它的观点。他在1839年11月写给威廉·格雷培的信说，那怕施特劳斯的《耶稣传》都是诡辩也不要紧，因为在其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切的基础的、关于基督教的神话起源的观念，这是可以重新用来解释圣经的历史的。在施特劳斯的这种影响下，恩格斯最终摆脱了宗教观念的束缚，变成了无神论者。

不仅如此，通过施特劳斯，恩格斯开始接近黑格尔哲学。1839年冬，他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写信说：“多亏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诚然，我不会成为象辛利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该吸取这个宏

伟的体系的最本质的要素。”^①这时，恩格斯精心研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等著作，并且被黑格尔的思想紧紧地吸引住了。他力图根据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点来理解当时的政治现实，认为在历史的发展中总有貌似倒退的现象发生，然而认真讲来，这种暂时的倒退是新的更大进步的开始，因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而是螺旋式的。他在《时代的倒退的征兆》中写道：“我……宁愿把历史比作一个随手画成的螺旋形，它的曲线决不是极其精确的。历史从一个看不见的点慢慢地开始自己的行程，懒洋洋地围绕着它转圈子；但是它的圈子越转越大，越来越快和越来越活跃地变成了飞行，最后，它象灼热的彗星一样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时常碰到自己的旧道，时常横穿这些旧道，每转一圈都更加接近于无限。谁能预见到它的尽头呢？”^②

这时，恩格斯的政治观点也越来越激进。由于厌恶现存的封建专制制度，憧憬自由，他接受了白尔尼的民主主义的基本政治观点，表现为一个争取进步思想的英勇战士。1840年末至1841年初，恩格斯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企图将白尔尼的政治激进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结合起来。这时，恩格斯的观点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发展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

1841年3月底，恩格斯离开不来梅回到家里。5月间他作了一次经瑞士到伦巴第的旅行，9月间又前往柏林服兵役。在柏林，他所在的近卫军炮兵营的驻地离大学不远，使他得以作为旁听生经常到大学听课，很快便同“博士俱乐部”建立了联系。当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刚刚发表，它对恩格斯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恩格斯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第一个公开地举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334、353—354页。

起无神论旗帜的人。

在反对谢林的斗争中，恩格斯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当普鲁士国家愈来愈感到黑格尔哲学是反对教会和国家的危险武器时，便把反动老朽的谢林请到柏林大学讲授“启示哲学”，企图以理性和信仰相结合的特殊方式战胜黑格尔主义，但启示哲学最后竟成了一种混乱的神秘主义和蒙昧的神智学。谢林对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攻击，激怒了当时在场听课的恩格斯。尽管恩格斯这时还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同谢林作斗争，但他还是迅速决定把谢林当做一个政治上的敌人来加以猛烈的攻击。他接连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1841年12月）、《谢林和启示。对绞杀自由哲学的最新反动派的批判》（1842年3月）、《谢林—基督的哲学家，或变人间智慧为神的智慧。为不懂得哲学用语的基督教信徒而作》（1842年5月）等文章和小册子，批判了谢林用神秘主义代替理智、庇护宗教、替君主专制作宣传的反动实质。这一批判，实际上也是抨击了普鲁士的反动君主制度。同谢林的斗争，使恩格斯得以直接投身于哲学-政治斗争，并且从此成为这一斗争的实际参加者。

恩格斯在初期，即在他批判谢林之前，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论著。他给报刊写的稿件，大部分内容只是涉及到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其中，主要的代表作则是1839年3月和4月间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乌培河谷来信》。

在《乌培河谷来信》中，恩格斯首先愤怒地揭露了他亲眼见到的那些非人的社会状况，沉痛地描绘了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他写道：每天晚上，醉汉们在街上荡来荡去，大声唱着最庸俗、最下流的歌曲；所有的酒店都挤满了人，特别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每天到晚上十一点钟，酒店关门的时候，醉汉们才成群结队

地从酒店拥出来，其中大部分都是掉到路旁的水沟里才清醒过来。他们当中最堕落的就是所谓“码头工人”，即颓废沮丧、没有固定住所和工资收入的人；这些人天蒙蒙亮就从自己的栖身之处——干草棚、马厩等处爬出来，有时甚至在粪堆或楼梯上度过整个夜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恩格斯指出，首先是工厂劳动大大助长了这种现象。在低矮的房子里进行工作，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从六岁起就是这样，这就势必要失掉全部力量和朝气。单干的织工从早到晚蹲在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髓。这些人的命运不是神秘主义就是酗酒，大多数人因肺结核死去。下层阶级，特别是工厂的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在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据说还是为了工人不致酗酒。只要到虔诚派教徒的作坊里就可看到：一个师傅坐在那里，右边摆着一本圣经，左边经常放着一瓶烧酒。恩格斯愤怒地指出：“如果不是厂主这样胡作非为，如果神秘主义不是象现在这样流行并且不会更广泛地流行的话，这一切也不会达到这样骇人听闻的程度。”^①

在《乌培河谷来信》中，年仅十八岁的恩格斯虽然还不可能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但是，他已表现出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教会黑暗势力，以及对工厂主们的痛恨，对处于贫困境地的工人和其它劳动者的深切同情。特别是这些无情的揭露，出自一个出身于虔诚宗教的厂主家庭的恩格斯笔下，充分反映出他与旧的信

^①恩格斯：《乌培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8页。

念、旧的家庭以及现存社会秩序彻底决裂的决心和勇气。当然，对这种可恶的社会制度的批判，还没有使恩格斯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使他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抱着更加明显的否定态度，加强了自由民主色彩。

恩格斯在不来梅商行里当练习生期间，积极参加当时的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不断得到发展。这从他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的文章和给友人格雷培兄弟的信中看得很清楚。

在1839年11月发表于《德意志电讯》上的《德意志民众读物》一文中，恩格斯强调民众读物对于反对封建贵族统治和虔诚主义以及争取自由的政治意义。他指出，民众读物应帮助那些未受教育的人，向他们指出反对贵族、反对封建黑暗势力的斗争的真理及其合理性，必须使人民（连同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发他们的勇敢和对祖国的爱。

这时，恩格斯在写给格雷培兄弟的信中，也表露出他对封建统治者的深恶痛绝。他认为，普鲁士的每一个王侯，根据其罪恶都应判处死刑。他明确地提出了必须用暴力来推翻封建统治者。他坚信：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猎人拿起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嘹亮的狩猎号角，吹响猎捕暴君的号音”，那时，“各个山上的宫殿将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王侯的宝座在摇晃，祭坛在颤抖”，而且没有人抵挡得住这场风暴。^①

恩格斯对社会生活具有特别敏锐的观察能力，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极其同情和关怀，他的思想发展与转变主要由于他

^①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1839年11月13—20日）》，转引自海·格姆科夫：《恩格斯传》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32页。

对现实生活矛盾的深刻感受，力求从中作出实际的结论。这是他和马克思以及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不同的特点。因此，恩格斯没有走上自我意识哲学或批判哲学的道路，而是力图根据黑格尔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辩证方法作出革命的政治结论。他认为时代的任务是要求把黑格尔的哲学和白尔尼的政治激进主义结合起来，要求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反对君主立宪，争取共和制。他反对把政治改革的愿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号召用人民革命来粉碎君主的反动统治。这种重视人民斗争作用的思想，构成了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

第四节 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恩格斯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最初转变，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反对谢林和为《莱茵报》撰稿期间，开始了这种转变；到曼彻斯特以后，由于投身工人运动并从事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终于完成了这种转变。

列宁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对恩格斯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曾有一个概述：当恩格斯“还是中学生的時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对哲学的钻研，使他更前进了。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转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

者。”^①

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看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是在英国，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无产阶级的。……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②

一、恩格斯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恩格斯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要从他对谢林的批判谈起。

在《谢林论黑格尔》一文中，恩格斯揭露了谢林全盘否定十九世纪初期和中期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施特劳斯等对哲学所作的发展。他指出，谢林一面竭力贬低黑格尔，一面把从黑格尔那里看到的一切正确的东西，统统宣布为自己的东西，这是一种对待思想的盗窃行为。

在《谢林和启示》中，恩格斯写道：同黑格尔相反，谢林认为只有关于世界的思想，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才是逻辑的思维过程的结果。谢林认为，理性实际上不能证明某种事物的存在，神的存在不能是理性的研究对象，它是属于比理性领域更高的启示领域的研究对象。谢林就是用启示等神秘主义方法来解释和证明神的存在和基督教的信仰的。恩格斯指出，谢林不是象黑格尔那样把具体世界的存在看成是理性定在的必然结果，而是把理性看成是一种也能存在于具体世界之外的抽象物。这样一来，绝对的

^{①②}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89—90页。

东西就不再象在黑格尔学说中那样是自然界和精神在观念中的统一，而成了一种纯粹空洞的抽象概念。从恩格斯对谢林的启示哲学的批判中，可以看到，他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在哲学的基本观点上仍然是一个信仰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者，他仍然把宇宙精神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当然，恩格斯也不是无条件地依附于黑格尔哲学，不过他认为，黑格尔的学说所以应当受到批判，并不象谢林所讲的那样是因为它用理性来说明信仰，而是因为复辟时期的压力下，它不再忠于自己的原则而有了反动的性质。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原则是好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功绩就在于保存了这些原则，排除了黑格尔哲学中那些保守的、自相矛盾的结论，因而他们能够批判基督教，而当精神摆脱了宗教桎梏之后，才可望人类开辟一个新时代。

这时，恩格斯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两个重要点上已有分歧：一是恩格斯反对从黑格尔退回到费希特，反对把精神同现实割裂开来，主张在主体和客体、精神和实体、人和周围世界之间建立联系；二是他反对把政治斗争理解为抽象的批判。这样一来，恩格斯在基本观点和倾向方面就跟马克思一致了，这必然使他同马克思一样逐步地跟那些日益走向主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分道扬镳。

正当青年黑格尔派从反对普鲁士国家的斗争中撤退下来的时候，恩格斯则开展了猛烈的抨击普鲁士封建制度的斗争。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恩格斯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对普鲁士君主专制制度开展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普鲁士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是专制制度的体现。在这个国家中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国家不承认还有什么权力比自己

高，它总是自命为绝对权力，而另一方面基督教则认为上帝和教会是绝对的，它永不会口服心服地接受国家观念。在国内政策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矛盾，如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企图建立中世纪式的封建专制的君主国家，但迫于形势又想保证某种自由，而对于基督教国家来说却不能容忍任何自由的存在。恩格斯指出：普鲁士的现状非常象过去法国所面临的状况。^①这就是说，在普鲁士，革命将把这种封建专制制度扫除尽净。这篇文章表明了恩格斯在政治上已离开了青年黑格尔派，它标志着恩格斯青年黑格尔时期的终结。

1842年年中，恩格斯的世界观已开始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转向唯物主义。推动他迈出第一步的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

费尔巴哈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在哲学方面的代表，激烈地反对封建的宗教思想，同时也否定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②它一下子把黑格尔哲学体系炸开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③

在费尔巴哈影响下，恩格斯逐渐抛弃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

^①恩格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43页。

^{②③}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义观点，开始转向唯物主义。这一转变，在恩格斯给《莱茵报》等报刊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表现得很清楚。

早在1842年4月，恩格斯就给《莱茵报》写稿。起初，他主要是论述南德的自由主义、反老年黑格尔派和历史法学派的斗争以及关于普鲁士的出版法等等。这些都是对当时青年黑格尔派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些问题。除了1842年5月10日他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旁听生日记》一文，第一次谈到普鲁士的财政制度、贸易自由和工业自由，以及反对专制制度和禁制关税等有关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以外，其它的文章基本上还是以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写成的。然而，当恩格斯于1842年10月底服役期满从柏林回巴门时，他在科伦拜访了当时德国的共产主义者赫斯，此后他便更加重视社会问题，开始把共产主义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同年11月赴英国以后，他在给《莱茵报》所写的一系列通讯里，已经不再表现出自由民主主义的思想，而是表现出共产主义的观点了。

恩格斯刚到英国时，他还批评执迷不悟的不列颠人怎么也弄不明白由精神原则所指明的历史的进步方向。但是，后来他面对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许多新问题摆在他的面前，使他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利益是人们一切思考和行动的中心。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来说，究竟是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还是思想和原则在推动历史前进？这个问题，由于他对英国的工业发展和无产阶级状况日益加深的研究，逐步得到了唯物主义的解决。

恩格斯到英国后，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当时英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存在？由于1842年8月英国纺织工人大罢工刚被镇压，宪章运动也一蹶不振，乍看起来，社会革命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恩格斯却认为这种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在对英

国的危机所作的分析中，恩格斯很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他认为，虽然英国工业化的速度很快，然而工业国又存在着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以及争夺市场的竞争，“一个工业国要靠本身的力量来摆脱这个窘境是办不到的”^①。随着工业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无产者阶级”。^②由于商业危机的扩大和失业的增长，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日益恶化，只要商业稍一停滞就会使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挨饿，而大规模的危机则将使整个阶级陷于绝境。到那时，工人阶级除了起义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尽管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觉悟还不很高，并且在1842年夏季初次发动的总罢工中失败了，“然而无产者从这些事件中间还是得到了好处，那就是他们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因此，“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③

在分析英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中，恩格斯也看到了由于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不同而形成了不同政党之间的斗争。代表旧贵族的托利党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以商人和厂主为核心的辉格党，维护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随着工人运动而形成的宪章派，则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它们都是为着本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斗争。在争取统治权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中间，“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④在围绕“谷物法”

①②③④恩格斯：《国内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8、549、550—551、547页。

所展开的斗争中，极其明显地表明这两个阶级所关心的都是自身的私利。所谓“谷物法”，就是限制甚至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封建土地贵族保卫谷物法，是因为谷物法能使他们高价出售粮食，从而保证他们的高额地租；资产阶级反对谷物法，是因为自由输入谷物能使粮价降低，从而使他们可以减少工人的工资，增加资本的利润。

同时，恩格斯也看到了工人们不屈不挠地为自身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认为只有他们所追求的才是真正的人类幸福，才有助于历史的进步。

在同工人的密切交往中，恩格斯深深感到工人们有勇气，敢斗争，具有坚贞不屈、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了争取社会进步，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热爱科学，富有聪明才智。这些都给恩格斯树立了榜样，给他以前进的动力。同时，工人们在思考和讨论问题时，“都从经验和确凿可靠的事实出发，并常常作出十分合情合理的结论”。^①“凡不能用事实证明的东西，丝毫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是以‘真正的事实’为立足点，因此上帝和其他宗教概念一类的虚幻的东西根本不在话下。”^②这种坚持从事实出发进行观察分析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对恩格斯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他更注重从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现实社会关系中了解和剖析英国社会状况。

自从恩格斯给《莱茵报》撰写这些通讯以来，他不仅阅读了英国政治书刊中的主要著作，而且开始研读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加上他的实际观察和研究，从而使他写的《伦敦来信》（实际上

^{①②}恩格斯：《伦敦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7页。

写于曼彻斯特)较之给《莱茵报》写的通讯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描绘了英国的社会状况。在这篇来信中,他指出在英国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和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条件下,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谷物法即将引起危机,并将导致革命的爆发。他认为,不久的将来是属于民主的,但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因为它根本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而是既反对封建制度、又反对资产阶级的主要以宪章运动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恩格斯认为,宪章运动缺乏必要的毅力,而具有毅力的欧文等英国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教育及合作社的示范来实现社会主义,不象宪章派那样重视阶级斗争,因此,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必须联合起来,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才能取得政权。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化的英国,无产阶级是唯一进步的、革命的成分。他寄希望于英国无产者、特别是受压迫和受剥削最深重的爱尔兰人民。他说:“给我20万爱尔兰人,我就能把整个不列颠君主政体推翻。”^①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恩格斯转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恩格斯还谈到:“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

^① 恩格斯:《伦敦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2页

政治历史的基础。”^①显然，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后，很快就形成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他的世界观转变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然而，这一转变还是初步的。他虽然看到了“工业国”所存在的种种矛盾，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物质利益的根本冲突，但是，还没有进一步把这些现象同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起来，对于社会革命的性质也还是不甚清楚的。他看到了在英国社会中物质利益对人们思想和行为起着支配作用，但仍然没有得出物质利益最终决定思想原则的唯物主义的一般结论。这是在恩格斯直接投身于工人运动并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以后，才进一步得到解决的。

二、恩格斯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恩格斯由于对英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开始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进程，这使他很快就摆脱了赫斯的空想和感伤的共产主义。从恩格斯1843年11月发表的旨在向英国无产阶级介绍法、德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可以看到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在英、法、德等国的产生情况是各不相同的：英国是通过社会经济运动达到的，法国是通过社会政治运动达到的，而德国则是通过哲学运动达到的。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共同目标，迫切需要互相了解。

恩格斯在叙述法国共产主义的情况时指出，法国革命为欧洲

^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7页。

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但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等,从而就产生了想实现社会自由与平等的巴贝夫的共产主义。在他之后,圣西门、特别是傅立叶发展了社会主义。傅立叶想指出一条人类能够通过协作来摆脱由竞争而产生的那些罪恶的道路,他的错误是在于想保存私有制和忽视政治斗争。尔后,卡贝的共产主义力图消灭私有制,但却不重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者当中,恩格斯特别提到了蒲鲁东,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坚决的批判,然而这一批判没有使蒲鲁东走向共产主义,而是走向无政府主义。

恩格斯在分析德国和瑞士的共产主义时认为,德国共产主义学说虽可溯源于农民战争,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出现的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则是魏特林。他受到法国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影响,决定在自己的祖国建立共产主义公社。接着,恩格斯详细地谈了由康德开始、中经费希特和谢林到黑格尔完成了新体系的哲学革命,和相继出现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这个运动发展了自己的先驱者的哲学结论,它在宣传无神论和共和制的思想中懂得政治改革不能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前提是确立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这样,他们中间有些人就逐渐放弃共和制的宣传而成为共产主义者了。由此,恩格斯说:“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①他指出,与从经济发展以及阶级斗争的危机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以无产阶级为自己主要支柱的英国共产主义学说不同,德国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在德国哲学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主要带有精神的、理论的性质,并且主要是在德国知识分子中间发生

^①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1页。

的。因此，在实践方面，在有关现代社会制度的实际事物方面，德国共产主义者还要多多向英国社会主义者学习。

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恩格斯还明确地提出了消灭私有制，通过社会革命来改造社会，这已十分接近于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文的观点了。可见，恩格斯这时已经明显地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了。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主要是以英国读者为对象叙述了法国和德国共产主义学说的主要特点，尔后，他又在《德法年鉴》中发表了为德国读者分析英国经济运动和社会运动的两篇文章，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些文章的内容表明，恩格斯当时也同马克思一样，已经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初步转变。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同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样，都是他们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在这一论著中，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分析批判。

恩格斯简要地回顾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他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它是从商人的彼此妒嫉和贪婪中产生出的一门发财致富的科学。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最初的一种幼稚想法就是以为金钱便是财富，为了要取得货币就必须少买多卖，一个国家依靠贸易顺差便可以使越来越多的黄金流入国内，这就是重商主义。随着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而发生的政治经济学革命，出现了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等人的经济学体系，它们虽然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比起重商主义的学说来是进步了，但是仍然没有对这些规律的基础作专门的分析，他们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时，就预先假定私有制是人类生活中天然

合理的和唯一可能的东西。这一派在当时英国政治经济学中居于支配地位，所以恩格斯集中火力对它进行了批判。恩格斯说明这一派别对劳动人民更加有害，它用诡辩和伪善来掩饰商人和金融家的掠夺，它赞美资本主义打倒了垄断，给穷乡僻壤带来了文明，使各民族和睦并减少了战争，实际上，资本主义却是加强了垄断，扩大了金钱的势力，造成了新的奴隶制，并且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来代替民族之间的战争。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政治经济学“同样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①“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②可见，恩格斯这时主要是依据伦理观点来进行批判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

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垄断、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两极分化、劳动者的日益贫困、以及道德上的堕落等等，都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是它所固有的客观规律。他从中得出了两个基本的结论：一是私有制关系的非人道的性质，二是这些关系的发展必然要引起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革命。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制造各种“理论”来掩盖事情的本质。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为了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脱罪责，胡说什么无产阶级的贫困是它本身造成的。他还编造了一种反动的“人口论”，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贫困、罪恶和危机都说成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所造成的，提出要用

^{①②}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8、600页。

暴力和饥饿的办法消灭过剩人口。对此，恩格斯痛斥道：“这种学说是过去一切学说中最粗暴最野蛮的一种学说，一种绝望的学说”。^①恩格斯批判说：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第一个错误，是它建立在反辩证法的方法论上。他说：“要是马尔萨斯不这样片面地看问题，他就会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从马尔萨斯开始写人口论时起，一切人口过剩的国家的情况，尤其是英国的情况，都极其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事实就是如此，马尔萨斯正应当把这些事实，全部加以研究，而研究这些事实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抓住了一个事实，而不理睬其他事实，因而他得出了荒谬的结论。”^②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第二个错误，是把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谈，以为有多少人能就业，就有多少人生出来。马尔萨斯看到了人口总是威胁着就业手段，劳动力的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由竞争的规律来调节，受着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然而，他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的扩大仅仅是机器力量增加和资本扩大的最终结果，而生活资料却只要生产力稍许提高，就会立刻增加。每一个工人必然能够生产出远比他自己的需要还要多的东西，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完全可以创造出人类所需要的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恩格斯从这个分析中得到的结论是：所谓人口过剩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

^{①②}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8、619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已经开始运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问题了。恩格斯看到了经济事实的决定作用，所以，他能紧紧地扣住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核心，揭示出在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和“崇高道德”的意识形态的背后所隐藏着的物质利益。比如，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的“国民财富”一词，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概括出的概念。恩格斯分析说，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但是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必须完全抛弃这个用语。“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公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①

又如，亚当·斯密颂扬商业是人道的。恩格斯分析说，商业比起中世纪公开的拦路行劫是要人道些，它对道德和人性也表示过应有的尊重。但是，它是怎样表示的呵！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同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关系，他表现得愈友好，就对他愈有利。这就是商业所讲的人道。“而这种为了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滥用道德的伪善手段就是贸易自由论所引以自豪的东西。”②

恩格斯还指出：“我们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就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制度所产生的矛盾，并从这个矛盾的两方面得出结论。”③他运用这种辩证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竞争和垄断的矛盾运动。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

①②③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0、602、600页。

上，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竞争的对立面就是垄断。重商主义者高喊“垄断”，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倡“竞争”，似乎是两相对立的，其实两者是统一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为每个竞争者都必然希望取得垄断地位，这样竞争就转化为垄断。另一方面，垄断也挡不住竞争的洪流，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竞争引起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斗争，在竞争中弱肉强食，最终就造成两极分化：一小撮百万富翁和亿万无产者。竞争产生了集中垄断，而垄断则造成了普遍的奴隶制。由竞争而引起的无产者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化，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是注定要灭亡的，它必将为摧毁垄断势力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所消灭。

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所得到的结论是：“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取决于需求；它指出竞争制度因此屠杀了，并且每日屠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①他又说：只要“继续照目前这样无意识地毫不思考地全凭偶然性来进行生产，那末商业危机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因而也一次比一次更严重；这样就必然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因而也必然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最后，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②这样，恩格斯便第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必然结果。这也就是《政

^{①②}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1、614页。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精华。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虽然是恩格斯早年不甚成熟的经济著作，它所依据的基本哲学前提仍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是，它作为一部“内容丰富而又富于独创性的著作”^①，仍然有相当的历史价值，所以，马克思称它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②。这篇文章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从此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不断的通讯联系。

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紧密相联的，是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另一篇文章，即对托马斯·卡莱尔^③的《过去和现在》一书的评论。

卡莱尔的这本书所讲过去和现在，就是十二世纪英国和十九世纪英国的对照。卡莱尔作为维护封建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人的代表，从右的方面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他谴责资产阶级，说它在利用工业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制造了无限的贫困，生产了数以百万计的产品，却让工人饿死；说它在拼命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把社会推进了物质奴役和精神奴役的深渊。由于这一切，它已不能治理社会了。

恩格斯虽然赞许卡莱尔的动人心弦的批判，但他不同意卡莱尔所站的封建贵族的立场，并且对卡莱尔的泛神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崇拜“真正的贵族”即“英雄”的社会政治观点进行了批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③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倾向于托利党，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上批判英国资产阶级，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观点，1848年后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

判。通过这种批判，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卡莱尔把当时英国社会的腐败，人们的思想空虚、伪善、说谎等等，都归罪于他所谓的无神论，认为只要人类坚持这种无神论而不获得自己的“灵魂”，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因此，他要求恢复宗教。卡莱尔作为一个泛神论者，他虽然抛弃了对人格神的宗教信仰，却要建立一种新宗教，即泛神论的“英雄崇拜”、“劳动崇拜”。在他看来，这种“英雄”和“劳动”是支配社会发展的内在的神秘力量。

恩格斯依据唯物主义观点指出，卡莱尔并没有找到产生社会弊病的真正原因，他没有看到“这种腐败和空虚，这种‘无灵魂’，这种非宗教和‘无神论’都是由宗教本身产生的。”因为宗教就是人的自我空虚的行为。“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①恩格斯认为，卡莱尔企图在基督教破产之后建立泛神论的新宗教，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说：“泛神论也不可能产生！泛神论本身就是基督教的产物，它与自己的前提是分不开的，至少现代斯宾诺莎、谢林、黑格尔以及卡莱尔的泛神论是这样。费尔巴哈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没有必要再来加以证明。”^②

费尔巴哈在1843年发表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里，已经证明了从斯宾诺莎到黑格尔的哲学，由于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让存在依附于一种超经验的绝对观念，因而归根到底都具有神学的性质。费尔巴哈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真正关系只能

^{①②}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7、649页。

是：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恩格斯正是依据费尔巴哈的这些基本观点来批判卡莱尔的泛神论的唯心主义的。

在批判卡莱尔的泛神论时，恩格斯提出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归还给人，要“消除一切自命为超自然和超人的事物”^①；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因此，“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②恩格斯说：“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不应当到虚幻的彼岸，到时间空间以外，到似乎置身于世界的深处或与世界对立的什么‘神’那里去找真理，而应当到近在咫尺的人的胸膛里去找真理。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③

总之，在当时的恩格斯看来，“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④也就是说，历史是人类的事业，而且只能是人类的事业，它没有任何超自然和超人的内容。

恩格斯在否定了卡莱尔的泛神论的世界观后，又批判了卡莱尔的“英雄崇拜”的社会政治思想。

恩格斯指出：“泛神论还是认为，有一种比人本身更高超的东西。因此卡莱尔就竭力建立‘真正的贵族’即‘英雄’，似乎英雄碰到好时候会比人高出一头。”^⑤可见，泛神论从逻辑上和实

^{①②③④⑤}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9、650、651、650、652页。

践上最终必然导致轻视群众，把群众当作“绵羊”和“愚民”，把“英雄”和贵族置于群众之上，从而为剥削阶级的统治服务。恩格斯否定了泛神论，在政治上自然也就抛弃了任何同群众对立或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崇拜。恩格斯说：如果否定了泛神论，如果所了解的人是真正的人，“他就不会再把人分成两类——山羊和绵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和平民，老爷和百姓；他就会发现天才的真正社会使命并不是用暴力去统治别人，而是去唤醒别人，带动别人。天才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这样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实现，因为思想被掌握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①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恩格斯在否定唯心主义的英雄崇拜时，并没有否认天才人物的作用。恩格斯反对把所谓的英雄人物同群众对立，驾凌于群众之上，而肯定代表群众的天才可以唤醒群众，说服群众，带动群众前进。这样，就为正确地理解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打下了思想基础。

站在劳动群众方面，维护他们，反对卡莱尔贵族式地鄙视他们，这是恩格斯的新世界观的一个根本特点。恩格斯在否定卡莱尔的英雄崇拜的同时，也否定了卡莱尔所主张的新的“真正的贵族”即“英雄”的统治。在回答英国将来的情况会怎样的问题时，恩格斯指出：“当然民主主义是个过渡阶段，但不是向新的改良的贵族制过渡，而是向真正的人类自由过渡的阶段”^②，即向共产主义过渡。

在恩格斯看来，无论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都已日暮途穷，

^{①②}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2—653页。

它们的统治迅速走向灭亡，唯有无产阶级才是未来的代表。恩格斯满怀激情地指出：“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①由此可见，恩格斯通过对无产阶级的直接了解，通过他的宗教的、哲学的、社会政治的以及经济的批判，已经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生活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阶级斗争比较激烈的国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亲身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同时又把理论的批判和实践斗争的任务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并为此目的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吸取并改造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优秀成果，这一切，终于使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中清楚地看到，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够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巨大力量，在自己的斗争中迫切需要组织上的准备和理论上的指导，而当时作为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又都是空想的、错误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在完成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初步转变之后，便立即着手探索和创立指导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①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8页。

第三章 创立无产阶级新型 哲学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在各自完成了世界观的初步转变以后，便从不同的途径开始探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型哲学的创立问题。马克思主要是通过批判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以及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来探索这一新型哲学的。恩格斯则主要是通过深入地观察和研究社会实际，独立地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探索，逐步认识到社会经济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基础，是构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基础。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映了他们这一时期探索的成果。

第一节 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形成中的地位

1843年底，马克思迁居巴黎后，除接触工人群众，同“正义者同盟”的盟员以及法国的秘密工人团体建立联系外，还用了很大的精力来从事科学研究。马克思把法国革命看成是政治和经济革命的典范。他搜集了大量的材料，细心地研究了法国革命的历史，打算写一部国民公会史。然而，这种研究使他认识到：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而阶级斗争又是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这和他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研究的结果（即法的关系根源于

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是一致的。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给马克思很大启发，使他认识到只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基础上，才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改造方式。于是，马克思放弃了国民公会史一书的写作，并且改变了他原定的既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又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庞大计划，开始系统地研究从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经过斯密和李嘉图到萨伊、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这样，马克思就从原先对宗教、哲学的批判，到政治、法律的批判，进而深入到对经济的批判了。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和恩格斯一起曾跟达姆斯塔德的出版人列斯凯签订合同，拟出版两卷《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预计要涉及政治经济学同社会、政治、法、道德有关的整个领域的大部头著作。后来，因迫切地需要清算青年黑格尔派和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以致这一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保留下来的这份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1844年3月至8月间马克思准备撰写这一著作的草稿片断。它虽然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上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费尔巴哈起了中间环节的作用。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没有无保留地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成为十足的费尔巴哈的信徒，但是他们也并不是轻而易举地跳过费尔巴哈阶段而达到新世界观的创立的。手稿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明，说明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确实经历了一个深受费尔巴哈影响的阶段。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离

开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同时也和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这时他已开始处于费尔巴哈的影响之下，但不满意费尔巴哈仅仅把批判局限在宗教领域之内，而是力求把对宗教的批判扩大到对政治和国家的批判。对国家和法的初步批判，已经使马克思认识到国家和法的本质植根于“市民社会”之中，只有通过“市民社会”的解剖才能获得揭开国家之谜的钥匙。而在“市民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问题是经济问题。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使马克思的思想深受触动，他十分同意恩格斯的下述见解：既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私有制当作无庸置疑的前提来接受，把政治经济学弄成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科学，因此，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及其起源，指出私有制的消灭是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在1844年的情况下，马克思还不可能具备足够的经济史的知识来科学地解决这一任务，他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与其说是经济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他以政治经济学所确立的经济事实和经济规律为依据，企图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进行全面系统的哲学人本学的批判。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一般的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是全赖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的。”^①所以，在手稿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以费尔巴哈的理论为基础的，他把这种批判叫做“实证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②。恩格斯也说过：“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

①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玉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①这也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在写这个手稿的时候还没有从根本上超出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

不过，在手稿中尽管费尔巴哈的哲学仍然是出发点，但由于它的一些主要原理和范畴已被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更加广泛的领域中，因而获得了彻底的发挥和发展，结果就使马克思有可能发现并克服费尔巴哈的局限性而继续前进。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和保守倾向，又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要素来发展并改造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样就使马克思既大大超出了黑格尔，又大大超出了费尔巴哈，并且沿着一条独创的和崭新的哲学路线不停地前进。

从手稿的内容来看，它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通过剖析异化劳动和实践这些基本范畴，探索了有关辩证方法和历史规律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使正在酝酿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初步汇合在一起。因此，这部手稿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一次新的飞跃的开始。

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研究手稿对探索新世界观的贡献。

一、异化劳动和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探索

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分析异化劳动全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而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的？这先要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理论谈起。

什么是“异化”呢？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 Alienatio 和 Alienare，有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的统治、让别人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支配等意思。异化作为哲学概念,它的含义简单地说,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

“异化”这个概念很早就出现了^①,但是,自从黑格尔以后,它才开始成为流行的哲学概念。黑格尔的异化概念,是他的哲学体系赖以建立的杠杆。他的异化概念的基本含义有三点:1.异化是绝对精神向自然和社会的外化和倒退,2.异化是思维的对象化、物化或客观化。3.异化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可见,黑格尔的异化概念是唯心主义的。所谓绝对理念异化出自自然界和社会,其实就是改了装的宗教创世说。同时,黑格尔还把任何对象化都视为异化;其扬弃异化的手段是虚幻的;在他看来,通过他的哲学,了解了异化产生的秘密,异化就会被最终地消除。

尽管如此,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也有一定的合理内容:它具有辩证运动的性质,因为黑格尔把精神的自我异化及其扬弃当作精神的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来理解。他还在抽象的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形式下,运用异化理论,阐述了人类借助劳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合理思想。

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异化概念,建立了人本主义的异化观。他证明了黑格尔哲学不过是用思想表达出来的并且得到合理的论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就是一个哲学化了的神,人就是神的异化,这是唯心主义的本

^①异化概念始于何时,其说不一。有的认为它肇始于《旧约》中关于偶像崇拜的概念。有的认为应追溯到柏拉图关于自然世界乃是理念世界的不完善的映象的见解。有的认为,在近代,霍布斯是第一个使用异化概念的哲学家。霍布斯说,国家的意志和公共的权利,就是个人自然权利的异化。卢梭从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考察了异化,认为私有财产是造成异化的根源,国家、特别是封建社会国家则是社会异化的集中体现,只有用暴力推翻封建统治,才能最终消灭异化。

未倒置。

费尔巴哈认为，人不是神的自我异化，相反，神倒是人的自我异化。人把自己的本质集中起来，转移到自身之外的对象上，加以崇拜，这就产生了神。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叫做“类”，即一切人所共同的东西。他说，人所共同的东西，就是理性、意志和爱，人把自己的“类”异化为上帝，人就丧失了自己的本质。“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赤贫；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为了无。”^①费尔巴哈认为，这就是社会病态的根源。为了使人们能够过符合于自己本质的生活，就必须消灭宗教，用人类爱来代替对神的爱。由于费尔巴哈指出了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异化性质，他的著作在当时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

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虽然是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的，然而，由于他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他只注意到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考察人，而没有看到还要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考察人，因此，一涉及到社会历史的领域，他就又陷入了唯心主义。他甚至主张在消灭有神的宗教以后，建立无神的爱的宗教。此外，异化概念的范围在他那里也大大地缩小了，他只看到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异化，而忽视尘世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等方面的异化现象。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是和他的人本主义相联系的，而他的人本主义作为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表述，必然带有相当浓厚的伦理唯心主义的色彩。这一点被“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赫斯所利用了。

赫斯在异化问题上比费尔巴哈前进了一步。他把异化概念从宗教、哲学领域，推广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

^①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2页。

社会中异化现象的普遍性，把异化的根源归之于私有制，从而在理论上开辟了从人道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然而，赫斯却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归结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斗争，鼓吹用爱来克服利己主义，以致他的共产主义议论陷入了感伤的空想和道德说教。在赫斯看来，一切权威都是所谓抽象的普遍物，都是“异化”，只有个人的生活才是真正现实的。克服异化，就是要回到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无政府状态去。后来，巴枯宁就把这一思想发展成了系统的无政府主义。

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马克思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财富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但是，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财富，却被资本家占有，转化为资本，并反过来成为奴役工人的异己力量。这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工人阶级的自我异化的图景。当马克思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史的知识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的和历史的分析时，他就试图借助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做出解释。

由于费尔巴哈认为异化是反人性的，异化必须消除，因此，当马克思把异化理论运用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非人化和反人道主义的性质时，他采取的首先是费尔巴哈的立场，即强调异化的消极的否定性质，批判黑格尔对异化所采取的既否定又肯定的调和态度。但是，马克思又和费尔巴哈不同，他吸取了黑格尔的能动原则，把人的本质不是象费尔巴哈那样了解为人类个体的抽象的共同性，而是了解为自由的自觉的创造性的劳动，并且象黑格尔那样把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当做“真正人的社会”的自我创造和生成的历史辩证法的过程来理解。因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虽然仍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却已经孕育着历史辩证法的萌芽。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多次使用过异化概念，主要论述了它的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体现着人的本质的政治异化；二是在私有制社会中，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只有消除金钱的统治，才能克服人的自我异化；三是充分肯定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分析，同时认为应进而分析世俗即社会本身的异化。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还谈到通过革命的方法来克服人的自我异化，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随着马克思世界观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他的异化概念也越来越离开抽象的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

从手稿看，马克思这时的异化理论仍然明显地受着费尔巴哈的影响。正如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是为了说明宗教的起源和本质一样，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起初乃是为了说明私有制的起源和本质。他指责政治经济学只是从私有制这个事实出发，却不向人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制的规律奉为普遍的永恒规律，却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制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家站在私有制的立场上说话，就象神学家站在神的立场上说话一样。政治经济学家把私有制的状态设想为人类的原始状态，把应当加以推演的东西，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的相互关系，当做没有起源的事实，就象神学家用原罪来说明人类罪恶的起源一样。为了揭示私有制的起源和本质，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这一概念。

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概念，是与他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分不开的。从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家们都认识到劳动是财富的本质，并把它归之于人本身，这就打破了把财富看做存在于人之外的外部对象的这种拜物教的幻想，这正象路德把宗教感情变成

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感情一样。因此，马克思说：“恩格斯把亚当·斯密叫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是完全正确的。”^①然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千方百计地替资本主义制度和这一制度所决定的非人的社会关系辩护，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②而马克思却抓住了劳动这一根本问题，从劳动异化这一现有的经济事实出发，考察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性。

对于异化劳动问题，马克思是从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两个大的方面来进行考察的。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问题从劳动者方面的考察，具体来说，又有四个方面：

第一、从生产的结果方面，亦即从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方面，考察了异化劳动。

马克思的考察，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经济事实出发的，即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这一事实表明什么呢？它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③这就是说，劳动产品同生产者分离，成为与生产者相对立的异己的东西。

在这里，马克思是将对象化和异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加以严格区别开的。他指出，劳动产品是固定在对象中的、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是劳动的对象化。简要地说，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

①②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6、91、44页。

对象化。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状态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①这就是说，劳动者生产出劳动产品，这是劳动的对象化；而劳动者生产出的产品不归他支配，并反过来奴役他自身，这便是劳动的异化。对象化不等于异化，而异化则包含着对象化。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贯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②这里，把对象化和异化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讲得十分明白了。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里，由于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象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因此，表现在他对对象的占有关系上竟异化到这种程度，以致劳动者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便越少，并且越发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马克思还详细地考察了劳动的对象化即生产以及劳动产品的异化问题。这实际上是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自然界就是劳动者用以进行生产的材料、对象，没有自然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不仅提供劳动的对象，同时还提供劳动者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越是通过自己

^{①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45页。

的劳动占有外部的自然界，他越是从上面两个方面失去其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他越是在这两个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这样，劳动者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同时却把一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的劳动，而使另一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却注定了劳动者的愚钝、痴呆。”^①

第二、从生产活动本身中考察了异化劳动。

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产品不过是生产活动的结果，如果劳动者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从自身把自己异化出去，那末劳动者怎么能象对待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同自己的活动的产物相对立呢？

然而，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意味着什么呢？

本来，劳动是人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的生命活动的表现，是人的本质。但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工人听从资本家支配，生产活动便成了不依赖于工人的、不属于工人的、并掉转头来反对工人自身的活动。

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对劳动者说来，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具体地说，劳动成为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活动，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劳动不是自由自在的，不劳动时如释重负，劳动时则如坐针毡，劳动不是需要的满足，而是赚取工资的手段，劳动时不是自愿的，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所以只要这种强制一消失，工人就会象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这种种表现都说明，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劳动者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它是劳动者自身的丧失。结果，劳动不是使人成为人，而是使人降低为动物。总之，劳动者同自己生产行为的关系，是一个同异己的、和自己对立的行為的关系。

第三、从劳动者的本质或类存在的关系方面，考察了异化劳动。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察中，马克思已经揭示了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本身这两个劳动环节的异化情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进行了推论，进而揭示了劳动者和他的本质或类存在的关系。“类存在”或“类生活”等概念，是费尔巴哈的用语。费尔巴哈用这些概念来表示人的意识和动物意识的区别，动物只能把个体当作对象，而人的意识的特点是能把“类”当作对象。人不仅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个体，而且是人类。马克思也肯定人是类的存在物，并进而认为人的类生活就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生产活动，能动地改造对象世界，这是人的类存在的特征。

固然，动物也进行生产，但它们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

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产品的异化，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也就是夺取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生活、他的类的对象性。劳动本身的异化，又把人的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地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样一来，人的类的本质也就变成了与人异类的本质。这也就是说，人的自由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仅仅是维持人的个体生存的一种手段，变成非人的动物的活动。

第四、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考察了异化劳动。

人从自己的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去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都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人既然和他的类存在异化了，那末人和别人也就异化了，当人与自己本身相对立的时候，那末其他人也与他相对立。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之所以不属于自己，正因为它属于别人。人的活动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就因为它是受别人支配的。而这个与他相对立的别人，是不劳动、不生产的。“总之，劳动者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产生出一个跟劳动不相干的、置身于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劳动者同劳动的关系，产生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跟这同一个劳动的关系。”^①在这里，马克思就透过物的关系，看到了人的关系、阶级的关系，并且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

以上四个方面，是马克思从劳动者这一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异化劳动这一基本事实所进行的全面考察。概括起来说，马克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

思是从人同自然的关系和人同人的关系这两个侧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的基本矛盾。由上述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中人同自然的关系的剖析，实际上已经讲到了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问题；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剖析中，实际上已经讲到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产品的占有以及生产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在这各种社会关系中，他抓住了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这一基本的阶级关系。尽管马克思在这里借助的还是当时德国哲学中流行的哲学术语，还未能制定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这些科学概念，但是，他已初步涉及到被后来的这些科学概念所概括的实际内容。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问题从劳动者方面进行考察后，接着他又从非劳动者方面进行了考察。这方面的考察，马克思主要是从非劳动者同劳动者、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来进一步揭示异化劳动的本质的。他写出了如下的提纲：

“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劳动者那里表现为外化、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劳动者那里都表现为外化、异化的状态。

“其次，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现实的、实践的关系，以及它同产品的关系（作为一种情意状态），在与他相对立的非劳动者那里表现为理论的关系。

“再次，凡是劳动者所做的不利于自己本身的事，非劳动者都对劳动者做，但是这个非劳动者却不对自己本身做他所做的不利于劳动者的事。”^①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

在马克思将要更加详细地考察这三种关系的时候，可惜手稿中断了。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正表明了人的活动后果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有其客观规律性的，“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①所以，他试图把异化劳动作为一把钥匙，来打开整个社会历史的奥秘之门。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剖析异化劳动之后，接着就分析了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关系。他认为，异化劳动和私有制两者的关系是相互的，但归根结底是异化劳动产生私有制。他指出：对异化劳动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即使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了的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实际上却无宁是外化了的劳动的结果，正象神灵本来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②

这样一来，马克思认为，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视为当然前提的私有制这一概念，就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而得到了说明。

虽然马克思对私有制的批判酷似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并且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解决私有制的起源问题，对于人如何达到自己的劳动的异化，这种异化如何根源于人类发展的本质的问题也未能解决，但是，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中毕竟包含着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的重要思想因素。在下面的一段论述中，我

①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54页。

们透过费尔巴哈的术语可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马克思说：“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①显然，马克思这种生产劳动创造人类生活的观点，超出了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正是沿着这条路线，从异化劳动的观点走向实践的观点，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分析异化劳动得出私有制的概念后，马克思指出：我们也可以借助于这两个要素来阐发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工资、分工……。而且我们将会发现这些范畴中的每一个范畴都不过是这两个基本要素的特定的、充分展开了的表现而已。例如工资，它不过是资本的必要费用之一，跟为了保持车轮的运转而注入车轴的润滑油具有同样的意义。在工资中，劳动本身也并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是表现为工资的奴仆。又如分工，它提高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和文明，然而却使劳动者陷于贫困以致沦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增长，然而却使劳动者日益依附于资本家，加剧劳动者间的竞争，把劳动者拖到生产过剩的疯狂竞争中去；接着生产过剩而来的则是同样猛烈的生产衰落。这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马克思还通过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的分析，剖析了资本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玉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揭示了这些阶级之间的利益都是相互敌对的。“我们在国民经济学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各种利益之间的敌对、斗争、战争被承认为社会结构的基础。”^①

此外，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只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②在他看来，宗教是思想异化的最重要的形式，它把资本对劳动者的奴役说成是神意的表现；唯心主义哲学把人的活动归结为思想活动，从而撇开了现实的实践，也达到了类似的结果；资产阶级的法和道德，以不同的方式，起着类似宗教的作用；而自然科学却不同，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然而，它“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③

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又分析了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说，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了全面的探索，而这种探索对他尔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从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解剖中，马克思还得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

^{①②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74、81页。

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①这就是说，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共产主义制度，这是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在深入地进行科学研究、接触工人运动之后，对共产主义充满着信心。他强调说：“有了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足以扬弃私有财产思想。而为了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的行动。历史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的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则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巨而漫长的过程。”^②

总起来说，异化劳动的理论，是马克思运用由他彻底发挥了的人本主义原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人道性质的批判和揭露，这一批判使马克思有可能站在人类发展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来考察私有财产及其所产生的后果的历史局限性和弊病，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就其视野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派所作的类似批判。但是，正因为异化劳动的理论是以人类发展的理想高度（真正人的社会）为出发点的，它以高度完善了的人作为人的原型，因此，就使这种批判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和空想的性质，因而异化理论注定不能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只有抛弃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同时也扬弃异化理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诞生出来。

马克思说：“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③因而，他从异化劳动理论向历史唯物主义过渡，中间是经过对实践观点的探索的。

^{①②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93、84页。

二、对实践观点和历史辩证法的最初探索

从异化理论向实践观点的转变，关系到对劳动二重性即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的分析。

马克思谈到劳动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时，实际上论及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上面讲到的异化劳动，由于它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两极化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加剧，最后导致私有制的扬弃；另一方面是指对象化的劳动即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占有。这种对象化的劳动不同于异化劳动，照马克思当时的观点，它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的生活和历史的自由自觉的创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这两种性质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结果劳动的对象化变成了劳动的异化，对自然界的占有变成了自然界的丧失。

然而，尽管有这种异化，劳动还是人类自我生成、自我创造唯一的推动原则。已往的历史理论都忽视了这一点，它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仅仅把宗教或诸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这些抽象普遍形式的历史，看做人的本质的实现和人的类的活动。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事实上，“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而“通常的、物质的工业……是以感性的、外在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力量。”

“在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产生活动——中生成着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而形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①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81页。

马克思在这里对劳动的分析已经转向实践的观点，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

事实上，劳动的性质一方面为生产关系所制约，另一方面为生产力的水平所制约。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历史制约性而形成的。只有不仅消灭了私有制，而且生产力也有了极大的提高，那种被当作生活的乐趣和“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劳动才能成为现实。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类必须在各种艰苦的劳动条件下，逐步发展和积累物质生产力，以便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从自然界的奴隶变为自然界的主人。正是这种不断的劳动（实践）和创造，以及由它所推动起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个观点，由于受异化理论的局限，在手稿中还没有能完全形成。

当马克思转向实践观点，开始对人类历史辩证发展过程进行探索的时候，势必要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其现成的抽象的唯心主义形式下是不能适用于解释历史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的，因此，必须对它加以批判和改造。

在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说：“依我看来，本书的最后一章——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分析，跟当今批判的神学家的意见相反，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①当时，除费尔巴哈外，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等都没有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反而加深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因此，马克思认为对黑格尔哲学有必要进行批判。马克思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范畴，着手改造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同时又吸取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的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不过是用思想表达出来的并且得到合理论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2）他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当作理论的基本原则，为真正的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3）他用以自身为基础的即以直接的、感觉可以确实地感知的事物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同黑格尔的那个以通过否定之否定而得到肯定的绝对精神为基础的唯心主义哲学对立起来。

在肯定费尔巴哈的功绩的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在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没有看到尽管黑格尔是用抽象的思辨形式表达的，但他确实第一个指出了以否定之否定为形式的辩证发展是一切存在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创造的形式。

对于被归结为精神的自我创造、自我认识过程的人和自然界的发展描绘，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主题。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描述了精神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转化。最初，主体作为感性意识，没有把自己同自己的客体区别开来。在它把自己从直接的现实分离出来并使自己与之对立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自我意识。随后的发展便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和对这种异化的扬弃，当能思维的主体（自我意识）由于理解到，并不存在不依赖于它的客体，相反，它自己就是客体性的本质，由此它便最终克服了这种主客的对立。这样，在最后的結果上，自我意识就把客观的规定理解为自己本身的环节，而达到主客同一体。黑格尔在这里所讲的

精神不断地占有现实，这一点在本质上是符合于能动的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自然界的日益占有的。

对精神的这种胚胎发展进行分析后，黑格尔又在《逻辑学》中叙述了以主客同一体的绝对观念为终结的、概念的内在辩证运动。而在绝对观念外化为构成它的否定的自然界之后，又随着人类的出现开始了绝对观念获得自身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绝对观念达到了对自己本身的完全理解。这一过程是在精神哲学中达到了自己的终点的，它的具体表现就是黑格尔哲学本身。因为在这一哲学中，那个为自己的全部先行的发展所丰富的绝对观念复归于自身。

的确，黑格尔哲学把事物的全部真实情况都加以神秘化了，但是，它的关于整个存在的辩证发展和关于人在劳动中自我创造的学说，却为马克思建立新的世界观提供了批判利用的思想资料。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主要是分析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马克思称《精神现象学》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①

首先，马克思承认了黑格尔的功绩，即：1.黑格尔把劳动看成是人的本质和人的自我创造手段，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看成是历史的内容；2.黑格尔把就起源来说属于各个哲学家的、不相关的概念的来龙去脉揭示出来加以概括，创造出无所不包的抽象来代替那特定的抽象，用那自身内部转圈子的抽象活动来代替那些僵化了的抽象概念，也就是说用概念的辩证法代替了僵化的形而上学。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页。

同时，马克思从三个方面揭露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神秘性，即：1.黑格尔把整个客观世界变成了思想物，变成了纯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由于他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把自然界归结为意识，把二者之间的关系归结为自我意识同意识的关系，造成人、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的神秘化；2.黑格尔只承认一种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他通过劳动的精神化而把劳动神秘化，这样，人的自我创造过程变成了思维的不断展开，而历史则变成了抽象的普遍概念发展的历史，而人占有对象世界也被认为只是以对精神存在的占有形式，即只有通过认识过程的形式来实现的；3.把辩证法神秘化，即把辩证发展的过程理解为抽象思维的那种已经不是走向外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运动，这样就把它变成了唯心主义的、概念的辩证法。

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就拿他对劳动的观点来看，他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然而他作为一个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又把劳动的一切具体的现实的内容抽象掉了，把它变成了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变成了思维的过程。在他看来，人在自己的思维中总是“回到自身”的，因此，就只表现出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而这种片面观点又正适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站在要求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把它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

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把人的发展看成是历史的辩证的自我创造过程。但是，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接受和发展了费尔巴哈把自然界和人看成是本身包含着自已的原因的客观实在的观点，认为人之所以能创造对象，只是因为人本身是为对象所创立

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人在创造活动中，并不象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的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的活动。”^①这就是说，马克思把这种创造对象的活动，理解为物质的、现实的过程。接着，他又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的生成是人的具体的实践活动的结果。这样，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就不再是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关系，而是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自然界的~~关系了，人的活动也不再是抽象的精神活动，而是人的实践活动，通过这种实践活动，人使自己包含在自然界中，改造自然界，同时也创造自己本身。~~~~

这种关于人、自然界和人的活动即实践的观点，这种把实践看作是人的本质，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联系环节，是人的自我创造的手段~~的观点，乃是马克思尔后据以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

马克思把人看作是能动的存在物，把对象性看作是人的自我创造的必要条件。他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秉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情欲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在他之外存在着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这是

①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120—121页。

表现和证实他的本质力量所必要的、重要的对象。”^②

虽然，人和动物一样是靠自然界的产物生活的，他的生命是同自然界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人和动物不同，人能够通过自觉的、有目的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正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自然界的产物对人来说，也不仅是生存的直接物质资料，而且首先是他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材料、工具和对象。自然界对人来说，也不是象对动物那样直接地存在着，而是按照它被人的劳动所改造的那种程度存在着。

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对象所以能变成人化了的对象，仅仅是由于它变成了社会的对象。人不能孤立地通过自觉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本质，而只能在和其他人的共同劳动中做到这一点，因此，他的自我对象化是和他的社会性分不开的。这样，在人的辩证的自我创造过程中，生产的对象变成社会化了的对象，而个人则变成社会化了的人。“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①

在马克思看来，人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也改造自己本身，改造了人的感觉和认识能力。他指出：人的感觉不同于原始的感觉，它们“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②在谈到人赖以全面地占有自然界的人的器官时，马克思指出，除五官外，还有思维、直观、意志、爱，亦即人所支配着的并且随着社会的人的形成而产生的那些感官的总和。马克

①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五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79页。

思认为，作为人类的意识，它只是在思维中重复着自己的现实的存在，“可见，思维和存在虽然是彼此有别的，但是同时二者又处于统一之中。”①

在马克思看来，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把工业的历史看做一部表现人的本质即实践的力量、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认识论。他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即认识论。费尔巴哈把认识论叫做心理学——编者注）”。②马克思还指出了以往的哲学都没有联系人的本质即社会实践来理解人的认识。他说：“迄今人们从来没有联系着人的本质，而总是仅仅从表面的有用性的角度，来理解这部心理学”。③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提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对立的解决决不仅仅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的、生活上的任务，而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一任务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所以哲学未能解决它。”④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有进一步的阐述。

黑格尔认为，人的自我创造过程具有辩证的性质，而这种辩证发展过程又是通过矛盾对立的发展以及否定之否定来完成的。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吸取了它的合理内核。

与黑格尔的抽象的概念的矛盾运动不同，马克思不仅具体分

①②③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6、80、80、80页。

析了异化劳动的内在矛盾,而且结合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和资本,具体地分析了矛盾对立的发展过程。在手稿中,马克思提纲式地说明了私有制的关系中劳动和资本这二者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指出这个关系的各要素所必定经历的运动是:“第一——二者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①马克思把私有制还不发展的阶段上,一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资本”拥有者的情况,概括为二者的直接的统一。所谓间接的统一,指的是在往后的发展中,劳动与资本分离,劳动的一方丧失资本,资本的一方丧失劳动,但他们不仅互相依赖,二者彼此还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这里,实际上论及了矛盾的同一性的含义。“〔第二——二者相互间的对立。〕”^②就是说,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方面互相排斥,劳动者和资本家都以对方为自己的对立面,并且双方都为图剥夺对方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尖锐的阶级对立就是如此。“〔第三——二者各自对自身的对立。〕”^③这里,马克思分析了劳动和资本的相互转化。资本向劳动的转化:资本究其来源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劳动是资本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资本中的一部分必须牺牲作为工资变成生产中的劳动。劳动向资本的转化:劳动者把自己作为一个资本,一个商品,不作为商品出卖就不能成为现实的劳动者。同时,也有一部分资本家破产沦为工人,以及少数例外的劳动者上升为资本家的相互转化情况。

马克思对劳动与资本的同一、对立、转化的论述,全面地揭示了劳动与资本的辩证关系,探讨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

①②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

这里，也反映出马克思对对立统一规律认识的进步。前面讲过，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十分强调对立面的斗争，他说：“真正的极端……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点，它们既不相互吸引，也不相互补充。”^①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则明确地肯定了对立面彼此互相促进，互相推动，互相转化，二者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

对于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马克思批判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否定之否定不是通过对虚假本质的否定而对真实本质的肯定，而是通过对虚假的亦即从自身异化出去的本质的否定而对这种本质加以肯定。

同时，马克思也肯定了黑格尔把否定的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以及辩证否定的合理因素。他指出：“把否定和保存即肯定结合起来的扬弃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②他认为，“扬弃是使外化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③，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积极的环节，通过辩证的否定作为中介，把许多逻辑概念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使之有条有理地联系起来。他认为这种辩证的否定不是倒退，而是前进发展。因此，作为私有制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决不是返回到违反自然的、原始状态去的贫困，而是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

马克思在批判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后，还把它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他认为，在人的自我创造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借助于生产（马克思总称之为“工业”）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5页。

②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127页。

历史可以归结为工业的发展。马克思对工业的发展，作了辩证的分析。他指出，在私有制范围内实现的工业进步，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使人的异化和非人化日益加深；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发展的结果，一头是资本积累日益增长，另一头是工人的贫困化日益加深，致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化，这就为共产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就以它本身的辩证运动决定了自己必然灭亡。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将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共产主义制度之后，使人类获得解放。

从以上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和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初步批判，都是从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原理出发的，表现出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重大影响，然而，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确实为建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大厦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勘测和探索。这部手稿虽然是不成熟的作品，但它作为创立无产阶级新哲学的开端，不仅直接为《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做了理论准备，而且也在某种意义上为《资本论》做了理论准备。

必须指出，手稿中所包含的新思想，还是很很不成熟的。自从30年代手稿问世^①后，许多资产阶级理论家就利用这点来歪曲马

^①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问世。直至1927年和1929年，它的一部分才相继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3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3卷，标题均为《〈神圣家族〉的准备著作》，没有受到人们注意。1932年，它在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上全文发表，并第一次加上《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这一标题。

克思主义，把手稿说成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启示录，有意抬高它，借以贬低马克思后来的成熟著作的意义。我们必须揭露和批判他们这种伎俩，科学地分析和评价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历史地位。

第二节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萌芽

在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批判来探索新世界观的同时，恩格斯则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通过实际的观察和研究对新世界观进行了独立的探索。

恩格斯从1842年11月底踏上英国的国土，就决心把自己全部身心献给无产阶级。他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他走遍了曼彻斯特、伦敦、北明翰、里子等许多工业城市的贫民窟，观察工人的日常生活，同工人谈话，了解他们的贫困状况和疾苦，亲眼看到工人为反抗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斗争。1844年8月，恩格斯途经巴黎返回德国时，他经过二十一个月亲身的调查研究，已经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通过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恩格斯不仅完成了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而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了明确的认识。

同年9月初，恩格斯从巴黎回到故乡巴门，这时正是德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因受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影响而异常活跃的时期。恩格斯在巴门、科伦、爱北斐特等地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发表演说。在参加这些活动中，恩格斯深深地感到制定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必要。他写信催促马克思，期望能尽快地把

他们的新思想、新原则“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①他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②

为了把自己的新思想发挥出来，恩格斯回到巴门后便致力整理他在英国收集的调查材料，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当时的英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及其必然产生的结果，这在德国和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着，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也给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所以，恩格斯说：“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当然也不会不起作用”。^③“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④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于1845年3月中旬写完，5月底由莱比锡的奥托·维干德的出版社出版。

关于这部著作的主要思想，恩格斯曾经明确地讲过：“我主要是描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必然性，而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证明无产阶级的这一斗争是完全合法的，是要用英国资产阶级的丑恶行径来戳

①《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0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页。

②③《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④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8页。

穿他们的花言巧语。我写的这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就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起诉书。”^①

在这本书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及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次作了全面的辩证唯物主义的 analysis，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

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研究一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探索新世界观上取得的进展。

一、通过对工业革命及其影响的分析，阐明了物质生产及其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

英国工人阶级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十八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所以，恩格斯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首先就是从考察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的。恩格斯详细地考察了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发展，从瓦特的蒸汽机和哈格里沃斯的“珍妮纺纱机”，直到蒸汽动力织机，给予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他从研究机器制造着手，进而研究了机器制造对金属加工和钢铁工业、铜工业以至采矿业的作 用，最后还研究了建立工业对改善交通工具方面所产生的后果。

恩格斯对工业革命考察的最初结果，写在他的题名为《英国状况》的一组文章中。他写道：“英国工业的这 一番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②这样，恩格斯便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至青年黑格尔派都没有认真注意过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纳入自己的考察范围，开始和他们的唯心史观区

^①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8页。

^②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4页。

别开来。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对工业革命的考察又深入了一步。他不仅详细地叙述了英国的工业史，而且更为精确地确定了工业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他不仅仅把工业革命描写为一种单纯的技术革命，而且把它描写为一种深刻的社会变革，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描述为一种自然历史进程。

恩格斯分析说，在使用机器以前，纺纱织布都是工人在家里进行的。尽管这种家庭手工业工人也只是一架替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但那时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毕竟比他们的后代好得多。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珍妮纺纱机。这架最初的很不完善的机器的出现，引起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的发展。可是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停止在这里。有些资本家开始把珍妮纺纱机安装在大建筑里面，并且用水力来发动，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减少工人，并且把自己的纱卖得比手摇机器的个体纺工便宜。工厂制度就这样奠定了基础。

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结果，一方面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差不多夺得了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而另一方面乃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的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陷入贫困苦难的境地。

恩格斯考察英国的工业发展后说：“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

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象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①

恩格斯还分析了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由于以前的一些阶级和阶层生存的基础被破坏了，这些阶级和阶层也解体了，而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而形成了无产阶级。由于机器的使用，工业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劳动力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工厂，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

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大资本家和没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和帮工。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地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由于不可能和大企业竞争，也被挤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了。同时，随着从前的手工业生产的被消灭，工人也没有任何可能成为资产者了。这样，工人阶级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居民中的一个稳定的阶级。这时，谁要是生而为工人，那末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所以，只有在这时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

在分析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后，恩格斯说：“这个现在布满了整个大不列颠的广大的工人群众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的

^①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5—296页。

社会地位一天天地吸引着文明世界的注意。”^①这几百万穷困不堪的人，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他们一天天地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一天天地更加迫切要求取得社会财富中的自己的一份，这些人的命运应该如何，这个问题，从1832年改革选举法的法案通过时起，已成了全国性的问题。

工业革命的另一结果，则是资产阶级上升到了真正贵族的地位。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厂主以惊人的速度增殖了自己的资本，商人也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一份，整个发展的结果是：英国人这时分成了三派，即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工人民主派。

从恩格斯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工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看成社会发展的基础，它不仅决定了无产阶级的产生、状况、发展和使命，同时也是我们理解资产阶级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灭亡的关键。所以，他说：“小工业创造了资产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并把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可是，这只是为了后来在某个时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们。”^②

此外，恩格斯还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重复，失业者和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而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剥削的日益加强等，都是不可避免的。

恩格斯在这里明确地把工业看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就是把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发展看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表明他的历

^{①②}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7、300页。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已经初步形成。1843年底以来，恩格斯开始也是用抽象人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接着，他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企图说明人的劳动和私有制关系的实质，至此，他已经进而认识到物质生产乃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二、通过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揭示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争取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不仅论证无产阶级是工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而且深入考察了工人阶级的低贱的经济地位、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

在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中，恩格斯首先仔细地了解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他详细地描写了工人们住的、穿的、吃的等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最后，这样概括地写道：“大城市里住的主要是工人，……这些工人根本没有什么财产，全靠工资过活，工资几乎总是只够勉强糊口。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根本不关心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养家活口，但是又不给他们能够长期维持正常生活的手段。因此，每一个工人，即使是最好的工人，也总有可能失业，因而就有可能饿死，确实也有许多人饿死了。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屋子里有多少家具，那就随贫穷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最穷的连最必需的家具都没有。工人的衣服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褴衫。食物一般都很坏，往往是几乎不能入口的，在许多场合下，至少是有时候，在量方面也不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会饿死人。”^①资本主义制

^①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7页。

度，对无产阶级来说，就是悲惨的世界。

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恩格斯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他们的生活方面，他还调查了他们的劳动状况，特别注意了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及其不断发展对于无产阶级状况的影响。

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工人们的劳动普遍地是时间很长，条件恶劣，繁重紧张，单调乏味，规章制度苛刻，老板监工肆虐。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工人的饭碗，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工资也随着机器的改进而普遍降低。产业后备军的出现，以及工厂大批地吸收工资甚低的爱尔兰工人，加剧了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更是吞噬了许多工人的生命。

资本主义的工厂劳动摧残人们的身心健康，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资产阶级的贪婪，造成了工人的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在曼彻斯特，除了许多畸形者，还可以看到大批的残废者，他们就好像是一批战争中归来的残废者一样。工人们都把工厂看成是“地狱的真正入口”。

资产阶级竭力掩盖自己的罪恶，似乎工人阶级状况这样坏并不是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本身的罪过。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各种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原因，都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①“所有这些都只是工业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工人，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不可能存在的。”^②

资本主义的工厂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奴隶制。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

^{①②}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5、335页。

权。这种奴隶制和旧式的公开的奴隶制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就永远卖掉，而是按日、按星期、按年卖掉的，因为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这种奴隶制，对于无产者说来有它的坏处，即没有人保障他的生计，资产阶级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厂去，让他饿死；而对资产阶级来说，这种奴隶制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则是十分有利的，他们可以随时辞退工人，并不因此使投下的资本受到损失，而且工人劳动的代价无论如何要比奴隶劳动的代价便宜得多。可见资本主义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

通过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恩格斯没有仅仅把无产阶级看做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指出了帮助无产阶级的必要。但是，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①

恩格斯分析说，机器大生产把许多工人聚集在一个厂房里共同劳动，使他们拥挤在城市里，这种劳动和生活的条件，迅速地推动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意识到自己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阶级思想的形成。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时，便开始在社

^①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页。

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所以，大城市成了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当资产者随心所欲地剥削工人、奴役工人，使工人明显地看出雇主仅仅是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追求利润才和他们发生联系的时候，工人就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这时他们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象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业和大城市。同样，爱尔兰工人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工资下降、境况更加恶化，但同时，它也促进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危机的来临。

总之，工业创造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使无产阶级能够作为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从事革命活动。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尽管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然而他们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更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工人们虽然不会读、不会写，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则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虽然不会算，可是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他们虽然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这些被资产者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却恰恰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这种愤怒表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的非人的状况里，表明他们不愿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表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而这种愤怒发展下去，就会爆发为革命。

贫困使工人选择：或是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是起而反抗资产者。正是这种卑贱的经济地位，使工人阶级站到了英国全民

族的运动的前列。而站在工人运动最前列的，正是那些资格最老、人数最多、智慧最高、力量最大、觉悟最高的工厂工人。

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就是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从他们同现代大工业生产的联系这个客观存在出发，来分析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革命本质的。这里，实际上所运用的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对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认识，又进一步解决了历史是由群众创造的问题。

三、通过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的 研究，证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然 的合理的，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

当时，尽管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上升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刚开始暴露，然而，恩格斯却以敏锐的眼光，很快就抓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人剥削人。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①

恩格斯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他说：“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②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发财的渴望。英国资产者对工人是否接

^{①②}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0、564页。

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为了满足自己无穷的贪欲，他们随心所欲地剥削工人，直至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

资产阶级为了赚更多的钱，为了雇佣更廉价的工人，于是就出现了竞争。恩格斯把这称为“社会战争”。他说：“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①可见，当时的社会关系是糟透了。

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他就要对工人进行剥削，所以它不可能没有工人。资产者只能靠商业或工业来扩大自己的资本，在这方面他都需要工人。即使他把自己的资本放出去生利，他也间接地需要工人，因为假若没有商业和工业，谁也不能使用他的资本，谁也不会付给他利息。“可见资产者总是需要无产者的，但是他之需要他们，并不是直接为了生活（要知道，他可以吃光自己的资本），而是为了发财，就象做买卖需要货物，驮东西需要牲口一样。无产者给资产者制造商品，资产者把它卖掉就可以赚钱。”^②这样，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基础上，便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关系中，无产阶级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无产者的工作没有保障，明天有没有工作由不得他。无产

^{①②}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362页。

者没有任何罪过，却生活在非人的居住条件下，他们虽然尽了一切努力，却还是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无产者不能避开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条件，“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的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件”。^①他们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得听任那个垄断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靠国家政权维护这种垄断的资产阶级的摆布。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恩格斯说明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②。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工人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工人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时就让工人饿死。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战争“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各方面已渐渐分成互相斗争的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③

当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认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无结果”的，甚至鼓吹什么“慈善和博爱”。恩格斯批判了欧文空想社会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指出：工人不可能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拯救，而必须靠自己的不断努力才能摆脱自己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④

^{①②③④}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1、274、419、500页。

为了论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必然的合理的，恩格斯还深入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并且第一次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论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来，并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最早，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所采取的原始的形式是恐怖和抢劫。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用盗窃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猛袭一个人，并以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

而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工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然而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是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个方面，只要工人一获得转瞬即逝的胜利，资产阶级就以自己的全部压力来袭击工人，惩罚工人，而机器还是使用起来。因此，工人们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以后又出现了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形式。这种联合起初是秘密的。当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种联合就扩展到了全英国。这种联合，体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的特点，因为工人在工会中的团结是消灭他的队伍内部竞争的第一个尝试。恩格斯把宪章主义评价为当时英国工人斗争的最高形式。他指出：“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①

^①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6页。

必须指出,在当时英、法的所有社会主义者把工会和罢工当作歧途来加以拒绝的时候,恩格斯肯定了工会组织和罢工斗争的作用,认为它可以保护工人不受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冷酷待遇之害。他认为,工会作为工人的集中的、群众性的反抗组织,可以帮助提高工人阶级觉悟,把工人组织起来,使工人能够推翻资产阶级。恩格斯还把罢工看做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斗争中去。

他在总结当时一些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时,看到这些罢工之所以象1842年的罢工一样没有获得进一步的结果,是“由于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他们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①尽管当时工人的罢工斗争存在着问题,但是,恩格斯从罢工中看到了工人阶级所表现出的那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恩格斯在谈到1844年3月31日开始的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的煤矿工人罢工时说:“煤矿工人对雇主的历时五个月的伟大斗争,……需要多么高度的真正人类的文化、热忱和坚强的意志呵!”这4万煤矿工人,被逼得“象一个人一样地站了起来,好象一支军队,不仅有纪律而且为一个愿望、一个意志所鼓舞,用最大限度的冷静和镇定把斗争一直进行到再反抗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②

通过斗争实践,工人愈来愈觉悟到,他们团结起来就会成为相当巨大的力量,在最必要的时候是能够向资产阶级挑战的。当资产阶级认为必须用一切手段镇压工人的反抗时,工人阶级“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总有一天,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的和社会的建

^{①②}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4、546页。

筑物将连同它的基础一同倾复。”^①

恩格斯根据对无产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分析指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②他引用《泰晤士报》的话说：“对官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恐怖行动的号召，它可能再一次地响彻我们全国。”^③

依据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状况及其革命本质的分析，恩格斯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工人阶级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在《英国状况》里，恩格斯已经指出了只有工人有前途，他们是具有创造民族历史和人类未来的力量。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进一步说明未来之所以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这是因为“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④

为了使未来真正属于工人阶级，使之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还必须创造一些基本的条件。恩格斯当时就提出了：工人阶级必须排除一切资产阶级成份的社会主义的影响，需要有真正的无产者的社会主义，还需要有新生的政党。这些见解，都表明恩格斯对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四、在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广泛地应用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所以能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规律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这是与

^{①②③④}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8、586、583、529页。

恩格斯在调查研究中，广泛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分不开的。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 坚持从唯物主义出发，“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

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考察时，力求对事实以及它们同各方面的联系获得完备的客观认识。他力求深入到无产阶级状况的“个别物”中，探索个别物和普遍物的有机联系，从个别物中揭示普遍物，揭示事实的总的联系，从而最终揭示出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本质。

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首先深入考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在考察社会经济发展时，他详尽地分析了生产工具的变革、机器的应用对各工业部门、交通、以及农业的影响，分析了工业日益集中的趋势。他不仅考察了工业革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也考察了它对社会的阶级关系、精神、道德所产生的影响。

在考察工人阶级的状况时，恩格斯首先了解了工人的实际生活情况。为了弄清楚工人们住的、穿的、吃的以及健康状况，他对于一些往往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和细节都非常重视。为了弄清楚贫民窟的真实情况，恩格斯不仅考察了曼彻斯特，还考察了英国其他工业城市。这样，就使得这一考察十分完备、严整。

恩格斯不仅考察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还调查了他们的劳动状况。他分析了机器生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研究了工厂工人、矿业工人、农业工人，他观察了机器生产同手工劳动的关系，机器生产同失业和工资的关系。对于工厂劳动，他还调查了劳动时间、劳动方式、工厂的空气、工作室尘埃和潮湿的程度、夜班劳动等等，以及它对男工、女工、童工和他们的家庭生活和道德精神方面的影响。

正是由于恩格斯考察了无产阶级状况的整个实际，所以他准确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地位。马克思称赞说：“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①“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②

2. 用从现象到本质、从偶然到必然、从相对到绝对的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方法来分析社会现象。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自由问题的分析就是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往往使工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工人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恩格斯透过这种现象，一下抓住它的本质。他说：“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③那种假自由是如何产生的呢？就是由这种现象造成的，即：工人不是一次就永远卖掉自己，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卖掉自己，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自己。

在恩格斯看来，奴隶的生存，因为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至少还有一块能用来养活自己的土地；而无产者却没有任何勉强维持自己生活的保证；只能指靠自己。这样，自由的工人所受的压迫和奴役决不会比封建时代的劳动群众即农奴少。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还对无产者的工资也作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8页注（48）。

③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0页。

了辩证的分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有时高一点，有时低一点，在各个劳动部门也各不相同，在各个城市间也有区别，但是它有没有一个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呢？在分析时，恩格斯首先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必须得到能保证他们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这个最低生活水平，是资本家的剥削欲不可超越的一个限度。然而，这个限度以及工资定额本身则是相对的。资产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给工人的工资不得低于工人养活自己和教养其子女使之习惯于正常的劳动所必要的最低限度；但是，为了使工人不同时依靠孩子的工资就不能过活，使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普通的工人，厂主给工人的工资也不可能太多。在最坏的情况下，工人情愿拿一半工资，而不愿失业以致饿死于街头。这点聊胜于无的东西就是最低工资。而最高工资则决定于资产者之间的竞争，但它也只能上升到劳动力需求所容许的程度。

通过这种辩证的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的这一本质，就揭露得比较清楚了。

3. 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等问题。

恩格斯从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角度来看待资产阶级的法律。他指出：“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①“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但

^①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0页。

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①

对于道德问题，恩格斯也作了唯物的辩证的分析。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不同的经济地位中，恩格斯看到了由此产生的工人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的道德是根本不同的。“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②

资产阶级是一个卑鄙齷齪的财迷，为了多赚钱，不惜采用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恩格斯指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现钱交易外，他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③

同时，资产阶级的道德还是极端虚伪的，它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自己的自私自利的面目掩盖起来。资产者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实际上，资产阶级行善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把施舍也看成是做买卖。

在谈到工人阶级的道德问题时，恩格斯把它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仅摧残工人的肉体，而且摧残工人

^{①②③}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5—516、410、565页。

的精神，使工人道德沦丧。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培养工人的道德品质、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的决定性的手段，因此，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道德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恢复和提高。

从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恩格斯看到了无产阶级的高尚的革命品质。工人“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①工人在罢工和起义中表现出来的斗争的勇气、毅力、决心、热情、自制力、团结、勇敢和不怕牺牲的这些高贵的品德，显示出他们最值得尊敬的一面。

工人们同情每一个为人类的进步而真诚地献出自己力量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个民族；他们仰慕一切高尚而美好的事物，不论它是发生在哪一国土上的。总之，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是一个具有高尚的宝贵的人类品质的革命阶级。这种品质表明，工人阶级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②

从本章这两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的剖析，还是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都从不同的途径对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做了可贵的探索。后来，恩格斯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时就说过：“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象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至于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进展，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可以看出。”^③

①②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66、529页。

③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页注。

第四章 批判思辨唯心主义，奠定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1842年至1848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立时期。

这一时期，西欧正处于革命风暴的前夜。刚刚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从各种斗争中愈来愈显示出自己的巨大作用，同时迫切地需要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以便组织起来，并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然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如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施蒂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蒲鲁东等，却拚命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影响无产阶级，使之脱离革命。他们的哲学观点，大多是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为依据的。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在批判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清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的斗争中，逐渐创立的。

马克思、恩格斯于1844年8月在巴黎的历史性的会见，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他们开始亲密合作后，第一个就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一伙的唯心主义，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神圣家族》这部哲学著作，就是这一批判所取得的重要思想成果。

達丁與出，則安由常登又主本資國應壽頤，升平085世武十

第一，对“左”倾教条主义理论战线的批判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紧迫任务。

显则愈来愈广泛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当时反对无产阶级

。逃农甜黑平黄匪都个社服不务明一个派也拉大两下狗汪，

一八九〇年威廉等人把马克思主义重新成为当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害的学说。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有害的学说，有必要从黑格尔那里拯救出来。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有害的学说，有必要从黑格尔那里拯救出来。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有害的学说，有必要从黑格尔那里拯救出来。

19世纪90年代，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盛极一时，特别是在黑格尔先哲曾著书立专制政府镇压民主革命运动的反动时期，黑格尔在波恩大学担任首相和普鲁士统治者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全线胜利，

从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来说，就是因国无有资产阶级，即革命的阶级，所以会发

一、辩证法的本质在于承认辩证法发展的普遍性，即承认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都有辩证法的发展，然而黑格尔认为辩证法只限于思维领域，认为精神是辩证发展的主体，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只是辩证发展的客体。

香饮物膳的客观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性质在于承认辩证发展是预先设定的,然而黑格尔却断言整个发展过程有一个终点,以便在校阅恩格斯著作时和尚未结束,在辩证法历史领域,他以恩格斯为主

聚徒讲学，授徒发愤，创立了“程氏门学”，程氏门学对立面的事是绝难而，就
地研究，这是程氏门学的特点。程氏门学对立面的事是绝难而，就

是相对的，可是黑格尔的哲学本身具有方法论体系这两方面的矛盾。正是由于李黑格尔哲学本身具有方法论体系这两方面的矛盾，所以他的李黑格尔哲学本身具有方法论体系这两方面的矛盾，所以他的李黑格尔哲学本身具有方法论体系这两方面的矛盾。

十九世纪30年代，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矛盾日趋尖锐，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的黑格尔学说，它的不同方面被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所利用，于是便出现了分裂。到了30年代末，黑格尔学派内的分裂愈来愈明显了，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即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

老年黑格尔派，又叫做黑格尔右派，以辛里克斯（1794—1861）等人为代表。他们固守着黑格尔的体系，抹煞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极力从黑格尔的体系中做出宗教上和政治上都十分反动的结论来。他们承认灵魂不死和神的存在，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同基督教的上帝等同起来，并且由此断言，黑格尔哲学乃是一种以理性的形式阐述的基督教神学。在政治上，他们象黑格尔一样，把普鲁士王国看做是“绝对精神”和“世界理性”的体现。他们支持普鲁士的君主专制的政体和官僚制度，支持教会，拥护一切现存的法律。因此，老年黑格尔派在宗教和政治这两个领域中都是十分保守和反动的。

青年黑格尔派，又叫做黑格尔左派，以施特劳斯、鲍威尔兄弟、施蒂纳和卢格为代表。费尔巴哈也属于这一派。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曾一度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与老年黑格尔派不同，青年黑格尔派不大重视黑格尔的体系，他们否定了黑格尔的神秘主义的超人类的“绝对精神”。他们当中，除费尔巴哈外，其余的都是以抽象的唯心主义形式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张个性解放的要求。比较起来，他们重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并且力图从中得出无神论和革命的结论来。在宗教问题上，他们批判了上帝创世说，否认神性，甚至根本不承认耶稣的历史存在；在政治上，他们反对等级制度和封建专制政体，主张

政教分离，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因此，青年黑格尔派在开始时，在政治上、宗教上都属于极端的反对派。

十九世纪30年代，青年黑格尔派还只是抽象地谈论一些哲学上的问题，对现实的问题采取超然的态度。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摆脱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青年黑格尔派，不得不把主要的力量转向反宗教的斗争。

从青年黑格尔派的整体来说，在反对封建、反对宗教的一些基本观点上，他们都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如对基督教的福音神话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却有分歧。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于1835年发表了《耶稣传》一书，揭开了青年黑格尔派内部斗争的序幕。施特劳斯不是象法国启蒙学者那样，简单地嘲笑圣经上的故事，把它们看做是愚昧无知或者甚至是欺骗的表现，也不是象黑格尔那样，只注意《圣经》和福音故事的象征意义，不去考察它们的历史的起源，而是根据实体的观点，即一切都保持在神秘的实体性中的观点，认为基督教是这种精神“实体”的产物，福音神话故事是由传教团体无意识地杂凑而成的。他认为耶稣可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活动家，以后基督教团体根据传统的神话资料，把犹太民族早有的关于“救世主”的传说，不自觉地附加在耶稣身上，如此代代相传，就成为后来的《福音》书了。

这样一来，施特劳斯不仅把福音故事的属神的内容归之于历史的考察，从而摧毁了宗教，而且也摧毁了黑格尔将神的概念理性化的调和企图，因此，恩格斯在谈到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时说：“这是第一部超出了正统黑格尔学说的著作。”^①在基督教

^①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9页。

在德国，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施特劳斯虽然因此被普鲁士反动当局革除了图宾根大学的教职，但是他对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却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开拓了道路。

施特劳斯的观点比起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黑格尔来，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的观点也有明显的漏洞。既然福音神话是整个国民精神实体的无意识的产物，不是某个人自我意识的产物，那末，为什么某些特征出现在某一部福音中，而在其他福音中没有呢？这些特征的出现，显然是受了该书作者或这位作者所代表的基督教团体的局部意见和利害关系的影响。布鲁诺·鲍威尔就是抓住施特劳斯这些理论弱点来进行抨击的。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是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神学家，最初属老年黑格尔派，后来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发表以后，鲍威尔猛烈地攻击这本书。为此，他写了《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1842年陆续出三卷），对《圣经》采取了更加激烈的否定态度，认为福音故事并不像施特劳斯所主张的是当时传道者的团体无意识杂凑成的，而是由当时抱有一定宗教目的的人物有意识地编造出来的。他还认为，《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神话和传说，完全是无稽之谈，耶稣不但不是神，而且历史上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鲍威尔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由于他坚持无神论和共和制思想，被赶出了波恩大学。他的弟弟埃德加·鲍威尔（1820—1886）表现得更为激进，1844年出版了《批判旧教会和国家的争论》一书，并因此入狱。

施特劳斯同鲍威尔兄弟关于福音故事如何产生的争论，后来发展成为下述问题的争论，即：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还是“自我意识”？施特劳斯主张精神性的“实

“实体”起决定作用，亦即“国民精神”或“民族精神”起决定作用，认为它必然导致人类理想的实现，而这一进程是跟人们的自觉活动完全无关的。这种观点反映了资产阶级中的温和派的思想意识。鲍威尔则主张“自我意识”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认为只有“自我意识”对现实的“批判”，才能使现实成为合理的。这就是说，他强调人的主观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种观点反映了资产阶级中的自由派的偏激思想。但是，鲍威尔却把人的主观活动唯心主义地绝对化了，他根本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他所说的人的主观活动是指只有个别的具有“批判思维”的个人，即所谓拥有“全能”的“自我意识”的人，才是创造历史的力量。

恩格斯指出，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①对于反宗教这一点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他们都不相信神的超自然的力量，否定了神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虽然他们提出的取代神的“实体”和“自我意识”，都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但这毕竟是对根深蒂固的上帝创世说的一种否定。当然，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世界观，使他们不可能彻底地批判宗教神学，更不可能正确地解决世界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和究竟依靠谁来变革德国的现实的问题。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这场争论，完全是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范围内所进行的。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既是实体，又是主体。他在自己的体系的开头，就把实体（绝对理念）规定为主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体，把绝对理念的发展描述为主体的自我发展的过程。在最初阶段，绝对理念作为自在的（无意识的）主体而出现，而在体系的结尾，即在精神发展阶段中，它便作为自为的（自我意识）主体而出现。因此，在他那里，整个体系表现为绝对主体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过程，并且以达到绝对知识而告终。

其实，“实体”和“自我意识”，在哲学史上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实体”曾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基本概念，而“自我意识”则是费希特哲学的核心。黑格尔在创立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时，把“实体”和“自我意识”概念统统都纳入他的体系中，使之成为“绝对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统一，即绝对精神。

马克思在谈到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争论时指出：“前者以斯宾诺莎主义为出发点，后者则以费希特主义为出发点。他们两人都就上述两个因素之中的每一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由于另一个因素的渗入而被歪曲这一点批判了黑格尔，可是他们使每一个因素都获得了片面的、因而是彻底的发展。因此，他们两人在自己的批判中都超出了黑格尔哲学的范围，但同时他们两人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而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只是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①

鲍威尔在同施特劳斯争论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成为当时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纲领。由于他把“自我意识”和“实体”完全对立起来，因而割裂了思想发展和具体现实之间的联系，破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坏了黑格尔所主张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简单地回到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去，使精神活动变成了完全离开具体现实发展的抽象思维活动，在普遍的自我意识的名义下无限地夸大“自我意识”的作用，因而把黑格尔哲学更加片面化了。

普鲁士政府对自由报刊的查禁和书报检查的加强，促成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分裂。其中，有一些人，如马克思、恩格斯等，坚持同封建专制主义斗争，深入进行实际的政治批判，转向共产主义。而鲍威尔兄弟一伙，在封建专制的严酷迫害面前，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日益远离政治和社会活动，日益倾向于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他们软弱无力而又孤芳自赏，把社会政治看成是他们这般有思想的高尚人士所不屑一顾的无足轻重的事情，这样他们就更加脱离人民，把群众看成是他们的障碍。他们在柏林组织“自由人”小集团。在他们看来，仿佛天才横溢的“自由人”是宇宙精神和普遍自我意识的体现，他们这一班出类拔萃的思想家负有用自己翻转乾坤的批判来决定历史进程的使命。他们强调自我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只承认他们这一伙批判的主体有生存的权利。这样，就为无政府主义者和极端个人主义者麦克斯·施蒂纳开辟了道路。

鲍威尔一伙曾企图将《莱茵报》变为他们的机关报，遭到了马克思的坚决抵制。鲍威尔一伙愈来愈向右演变，从此，马克思便同他们彻底决裂了。

1843年12月至1844年10月，鲍威尔兄弟、法赫尔、荣格尼茨、施里加等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办起了《文学总汇报》德文月刊，同马克思与卢格合办的《德法年鉴》相对抗。

在《文学总汇报》上，鲍威尔一伙鼓吹一种超越一切现实、超越党派和政治的批判，鄙弃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活

动，污蔑无产阶级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扬言要批判无产者；宣扬个别天才人物、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鲍威尔一伙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的文章所表露出来的立场和观点，表明他们已经堕落到政治反动和思想陈腐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地步。

鲍威尔一伙认为，只有个别杰出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就是说，进步的惟一动力是“批判的批判”，他们自己则是“批判的批判”的化身。他们把“群众”看成是精神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鲍威尔在他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中就说过：“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象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群众捍卫者所想象的那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①因此，他们把进攻的矛头主要是对准“群众”。对“群众”肆无忌惮的诽谤，这就是《文学总汇报》上大部分文章的主题。

鲍威尔一伙宣扬的这套谬论，正是当时一股反对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反动社会思潮的表现。因而，批判鲍威尔一伙的唯心主义哲学，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紧迫任务。

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共同批判鲍威尔等人的反动思潮

1844年8月底，恩格斯离开英国返回巴门，为了进一步结识《前进报》的同人，决定在归国途中顺便访问巴黎。在巴黎，恩格斯同马克思第二次见面。这次会见，开始了他们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亲密合作。

他们通过交谈，相互了解到在一切理论方面的观点都完全

^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一致，并感到对鲍威尔等人进行彻底批判的迫切性，就开始等他们合著的第一本书——《神圣家族》。

在恩格斯到来之前，格奥尔基·策克就要求马克思出来反对布鲁诺·鲍威尔一伙，并把《文学总汇报》第5、6、7期寄给了马克思。在会见恩格斯前不久，马克思又接到了该刊第8期，其中载有反对共产主义的《1842年》一文和“批判的批判”的纲领——《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等。鲍威尔等人公开地背弃了1842年《莱茵报》时期的激进主义，直接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德国的共产主义拥护者的观点。

原来，马克思就想写文章来进行反驳，他曾写信告诉费尔巴哈：“我将出版一本小册子来反对批判的这种堕落。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是您能在这以前把您的意见告诉我”。^①恩格斯在巴黎停留的几天里，他们共同拟定了全书的提纲，分好了章节，各写了序言。恩格斯写完了他所分到的几个章节。马克思承担了全书的绝大部分，直到1844年11月底才写完。

最初的书名叫《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计》。184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时，出版人列文蒂尔建议把这个标题改为副题，而给它冠以一个比较响亮的标题——《神圣家族》。这个标题，指的是布鲁诺·鲍威尔和他的朋友们。这些人由于把所谓“自我意识”神圣化，并且把批判变成超验的力量，使自己变成了“神圣家族”。

“神圣家族”这个名称，本来是意大利著名画家安得列阿·曼泰尼雅（1431—1506）的一幅画的题目。画中的人物是圣母玛

①《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1844年8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2页。

利亚抱着圣婴耶稣，旁边有玛利亚的丈夫圣约瑟，有圣伊利莎白，圣约翰、圣亚拿以及一些天使和神甫。取《神圣家族》做书名，就是借此来讽喻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一伙，形象地揭露出这些人妄自尊大、自以为超乎群众之上的丑态。

对于《神圣家族》这部书的写作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序言中有明确的说明。他们指出：

“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精神力量。鲍威尔的批判中为我们所驳斥的东西，正是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变‘批判’本身为某种超经验的力量，的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

“我们的叙述主要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我们手边有该杂志的前八期），因为在该报中鲍威尔的批判以及整个德国思辨的全部谰言达到了顶点。批判的批判（即《文学报》的批判）愈是用哲学把现实歪曲得令人捧腹，那就对我们愈有教益。法赫尔和施里加二人便是例子。对《文学报》所暴露的材料加以考察，就能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这也就是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①

《神圣家族》一书驳斥了鲍威尔一伙的唯心主义，清算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并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

把它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列宁认为，这部著作“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①

第二节 对鲍威尔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

在《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占据重要的地位。

恩格斯在谈到鲍威尔等人的哲学思想时写道：他们所做的，仅仅是用现成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这种公式，除了空空洞洞的公式便什么也没有。“它是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黑格尔哲学。这个哲学搽胭脂抹粉，把她那干瘪得令人厌恶的抽象的身体打扮起来，在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饥似渴地物色求婚者。”②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鲍威尔等人所宣扬的只不过是装扮起来的、片面发展了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

前一节讲过，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不过是把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某一个环节加以片面地发展。这种片面的发展，就是把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仅仅归结为普遍的自我意识，从而把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变成了主观唯心主义。

鲍威尔等人认为，“自我意识”即“精神”就是一切，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自我意识”是世界的创造者，世界是它的以太头脑的幻影和它的臆想的结果。他们不承认自我意识的“造物”是实在的物体。他们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普遍的自我意识

①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同实体的对立。鲍威尔绝对否定实体，其实，他所否定的正是整个现实世界、整个自然界，不是“形而上学”改装了的自然界，而是自然界本身，也就是说，他既否定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界，也否定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本身。绝对地否定作为实体的自然界，也就等于否定有别于思维的任何存在和有别于主体的任何客体。马恩对此批判说：“世界的感性的现实是不顾他这种想象的。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世界和他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提醒他在他以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是正是把他灌饱的东西。”^①工人群众也“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②马克思还进一步揭露说：“鲍威尔的辩证意识也是提升为自我意识的实体，或作为实体的自我意识。于是，自我意识就从人的属性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这是一幅讽刺人脱离自然的形而上学的神学漫画。”^③因此，这种自我意识的本质不是人，而是理念，因为理念的现实存在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抽象化的理念，因而它是无限的。人的一切属性就这样神秘地变成了想象的“无限自我意识”的属性。可见，鲍威尔对黑格尔的所谓批判，就是用“无限自我意识”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①②③不仅如此，鲍威尔还确实把黑格尔哲学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对于鲍威尔如何抹煞黑格尔哲学中的积极因素，把它没石化，马克思做了具体的分析。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1、86、175—176页。

马克思写道：

“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就在群众中拥有它所需要的材料，并且首先在哲学中得到它相应的表现。但是，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是事后才上场的。

“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1）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又不肯宣布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

（2）他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既然绝对精神只是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布鲁诺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

“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愿地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

“接着布鲁诺先生又取消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如果说黑格尔精神只是事后在幻想中创造历史，那末，鲍威尔先生则和他以外的其他群众相反，他是有意识地在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他现在就已经戏剧性地对待这批群众，而且在深思熟虑之后却故意发明历史和实现历史。

“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

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

“不仅如此！批判、已经体现出来的批判即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对待群众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现代的唯一的历史态度。现代的全部历史都归结为这两个方面在相互关系上的运动。所有的对立面都消溶在这一批判的对立面中了。”^①

马克思这一大段的分析，充分地说明了鲍威尔对黑格尔哲学的庸俗化和漫画化。

其一，鲍威尔用“自我意识”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并且自称是“绝对精神”的化身。

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只是人化了的绝对精神，实际上它是神的意识而不是人的意识。黑格尔从不把自我意识和任何个人的意识混为一谈。他坚决地防止一种错误的理解，即认为哲学家本人就是绝对精神。而鲍威尔兄弟和他们的信徒却恰恰相反。鲍威尔一方面保持自我意识的神性，把自我意识说成是无限的，是世界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他又把自我意识和哲学家的个人的意识混为一谈，宣称批判地思维的个人就是无限的自我意识的体现者。因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实际上就是他本人的意识。这样，他就用“自我意识”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其本人也就成了绝对精神的化身。绝对精神通过他们的有意识的批判活动，扮演了历史的创造者的角色，一切创造活动和主动的精神都归之于鲍威尔本人及其一伙，而其余的人类和世界则被当作“实体”，成为历史的消极被动的材料，是精神、批判以及无限自我意识的对立物。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109页。

其二，鲍威尔有意识扮演历史创造者的角色，认为他们的头脑自觉地发明历史和实现历史。

黑格尔认为历史是思想的历史，群众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仅仅是绝对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是要听从绝对精神摆布的奴隶。而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只是在事后出来给绝对精神树碑立传而已。哲学家只是在自己的体系和观念中，即在自己的思辨的想象中把绝对精神扮演成历史的创造者，而真正的已经发生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有一丝毫的改变。所以，黑格尔在用思辨的方式捏造历史的时候，他不能不照顾到历史的真实，并且常常在他的思辨的结构中作出把握真实历史内容的有价值的见解。所以，在黑格尔那里，哲学家只是体现“绝对精神”对自身的认识，而决不体现“绝对精神”对历史的创造作用。鲍威尔不满意黑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他宣称批判就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就是批判。这就是说，鲍威尔及其伙伴要有意识地扮演历史创造者的角色，运用他们的批判头脑，自觉地发明历史和实现历史。这样，黑格尔的历史理论在鲍威尔那里就变成了一幅荒谬透顶的漫画。

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这幅漫画只是满足于从某种精神产物中或从现实的关系和运动中撷取一种规定性，把这种规定性变为想象的规定性、变为范畴，并把这个范畴充作产物、关系或运动的观点。”^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6页。

其三，鲍威尔把黑格尔哲学的十分完备的哲学范畴归结为二，即精神和群众，损害了黑格尔哲学内容的丰富性。鲍威尔及其一伙认为，历史发展的内容就是精神反对群众的斗争，同时，把群众和粗糙的物质等同起来，把精神提升为绝对者。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把‘群众’和‘精神’之间的斗争‘规定’为过去全部历史的‘目的’；它宣称‘群众’是‘卑贱’的‘纯粹的无’，直截了当地把群众称为‘物质’，并把‘精神’当做真理性的东西和‘物质’对立起来。……最后，批判现在把精神和群众的对立跟‘批判’和群众的对立等同起来，这一点应当看做是批判在第一次征讨中还隐蔽着的秘密的进一步发展。以后它会更进一步，把自身和‘一般批判’等同起来，把自己说成是‘精神’、是绝对者、是无限的，相反地把群众说成是有限的、粗野的、肉体的、僵死的和无机的，因为‘批判’就是这样理解物质性的。”^①

马克思当时在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个《波拿巴》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变成了某种超验的存在物。……这种批判就成了灰心丧气但又妄自尊大的唯心史观。意识或自我意识被看成是唯一的‘人的本质’。……因此这种批判认为自己是历史上唯一的积极的因素。与这种批判相对立的是作为群众、作为怠惰的群众的整个人类，群众只是作为精神的对立面才有意义。”^②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揭露出了鲍威尔一伙所鼓吹的乃是比黑格尔的历史观更彻底、更露骨的唯心史观。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120页。

②《马克思致费尔巴哈（1844年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1—452页。

对于鲍威尔一伙的自我意识的哲学，马克思从多方面分析了它的认识论根源。

马克思从一般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进行分析说：“绝对的唯心主义者要想成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就必须经常地完成一种诡辩的过程，就是说，他先要把他身外的世界变成幻觉，变成自己头脑的单纯的突发之念，然后再宣布这种幻影是真正的幻影——是纯粹的幻想，而最后便宣告它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甚至不再为外部世界的假象所限制的存在。”^①鲍威尔一伙的自我意识也是通过这种诡辩的过程把自己变成了绝对的东西的。

此外，马克思还认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总秘密就是使陈旧的思辨的胡说死灰复燃，具体地说，它的秘密就在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实际上就是在直接重复《精神现象学》的基本观点。只不过在《精神现象学》中，是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而鲍威尔等人则把自我意识变成了人的自我意识，就是说，他把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变成了主观唯心主义。因此，要彻底批判鲍威尔一伙的主观唯心主义，还必须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

第三节 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

清算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神圣家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3—179页。

族》的一个主要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思辨唯心主义看做最危险的敌人，是因为它用“自我意识”（精神）代替现实的人，宣扬“精神创造众性，肉体则软弱无能”，它把现实的、客观的、套在人们头上的枷锁变成只是观念地、主观地存在的枷锁，把一切外部的现实斗争，都变成纯粹观念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取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一切问题，不论是理论问题，还是现实问题，都必须首先纳入思辨即纯粹抽象的框子，把一切现实问题都变成理论问题，而且进一步把普通人类的理智变成了脱离人类的神秘的精神力量，并用这种超自然的精神力量，诸如绝对精神、实体、自我意识等的自我发展来代替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说：“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①正常的人类理智形式是先有感性对象后有理性知识的，而思辨理性形式则把一切感性对象都说成是绝对精神的产物。

马克思利用了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材料，通过解剖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来透视了思辨哲学。思辨哲学把精神变为世界的本质，把历史变为精神的发展。这种感性世界向思维世界的转化，在《精神现象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马克思说：

“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5页。

复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但自我意识的赤裸裸的规定性是‘纯粹的范畴’，是赤裸裸的‘思想’，因此，这种‘思想’我能够在‘纯’思维中加以扬弃并且通过纯思维来加以克服。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它已经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因此，《现象学》最后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之所以用知识来代替，是因为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而自我意识则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之所以用绝对知识来代替，是因为自我意识只知道它自己，并且不再受任何实物世界的拘束。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此外，凡是表明普遍自我意识的有限性的一切东西——人及人类世界的任何感性、现实性、个性，在黑格尔看来都必然是界限。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4—245页。

以上这段话，是马克思揭露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神秘结构的老底，击中了它的要害，对我们了解黑格尔体系有很大的帮助。这段话，主要说明：（一）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用自我意识代替人，即剥夺了人的客观实在性；（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根本不理睬人类自我意识所具有的物质基础，因而它的结果只能是最保守的哲学（即唯心主义哲学）；

（三）从以上观点出发，最后得出用“绝对知识”代替人类全部现实的结论，这是合乎思辨逻辑的；（四）所以说，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了；（五）总之，全部《精神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

尽管思辨哲学力图证明自我意识、精神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存在，其实，客观物质世界仍然存在着。思辨哲学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会有意识和存在互相分别的世界存在；想不到当他们把客观物质世界当作范畴或观念的存在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用“真正实物的方式”改变“实物的现实”，这个客观物质世界居然还象往昔一样继续存在。

为了帮助群众识破对思辨哲学的幻想，彻底批判鲍威尔等人的唯心主义，马克思还深入地分析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根源。

我们知道，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就是说，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对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

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发展。

然而，思辨哲学对由特殊到一般和由一般到特殊这两个认识过程都完全歪曲了。

首先，马克思揭露了思辨哲学歪曲和颠倒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他举果实为例分析说，人们是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的。而思辨哲学家却把人们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出的“果实”这个抽象观念，想象为就是存在于我们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于是他们就宣布“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认为对梨来说，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来说，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这样，作为它们的本质，并不是它的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存在，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本质，即人们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于是，他们又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尽管人们从正常的认识辨别出苹果不同于梨，梨不同于扁桃，但是，思辨哲学家却说，这些感性的差别是非本质的、无关重要的。他们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实”。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实”这个“实体”。

从马克思的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一般的抽象的观念本来是从个别的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它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

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在这里，个别的、具体的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一般的、抽象的观念是第二性的。而思辨的哲学家却把这一关系完全颠倒了，他们把从个别的、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观念当作独立存在的本质，变成了第一性的，又把它硬塞给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宣布这一般的观念是个别的、具体的现实事物的本质，而个别的、具体的现实事物反而变成了第二性的，成了这一般观念的存在形式和样态，成了虚幻的东西。可见，思辨哲学的认识论根源之一就在于它颠倒了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歪曲了一般和个别的联系。思辨哲学把一般概念实体化，又把现实的、感性事物虚幻化，这样一来，一般概念也就变成空洞无物了。所以，马克思说：“用这种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的。如果有一位矿物学家，他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末，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象中的矿物学家而已。这位思辨的矿物学家看到任何一种矿物都说，这是‘矿物’，而他的学问就是天下有多少种矿物就说多少遍‘矿物’这个词。”^①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思辨哲学的贫乏空洞的特点。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思辨哲学对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的歪曲，指出思辨哲学在颠倒特殊和一般的关系的基础上，又把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歪曲为一般观点创造特殊事物的神秘的过程。

马克思说，要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不但如此，要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面，不抛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2页。

弃抽象是绝对不可能的。思辨哲学家抛弃了“果实”这个抽象，但是，他是用一种思辨的、神秘的方法来抛弃的，就是说，使人乍看起来，好象他并没有抛弃抽象似的。

马克思指出：摆在思辨哲学家面前的难题是：如果说苹果、梨、扁桃、草莓实际上不外是“一般实体”、“一般果实”，那末，试问这个“一般果实”又怎么会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又表现为扁桃的呢？这种和思辨哲学关于“一般实体”、“一般果实”显然相矛盾的多种多样的外观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黑格尔哲学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就不得不使用思辨的、神秘的方法，这就是，它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从而把抽象概念变为具体概念。

具体说来，对于“一般果实”怎样变成各种现实的果实的问题，思辨哲学家回答说：这是因为“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通常的千差万别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它们是“一般果实”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结晶。比如说，在苹果中“一般果实”让自己象苹果一般存在，在梨中“一般果实”让自己象梨一般存在。

这里，显然是把“一般果实”从作为苹果、梨等等的实体，一下子变成了创造、形成苹果、梨等等的能动的主体。这样一来，思辨哲学家就认为不能根据从实体观念得出的看法再说梨是“果实”，苹果是“果实”，扁桃是“果实”；相反地应该说“果实”确定自己为梨，“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果实”确定自己为扁桃，苹果、梨、扁桃相互之间的差别，正是“果实”的自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一般果实”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

至此，“一般果实”作为主体便表现出它的生命运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从而“一般果实”就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的抽象概念，变成包含有千差万别的果实的总和的具体概念了。所以说，这样“果实”就不再是无内容的、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实”都使自己得到一种更为发展、更为显著的存在，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成为活生生的统一体。马克思譬喻说，这个统一体把单个的果实都消溶于自身中，又从自身生出各种果实，正如人体的各部分不断消溶于血液，又不断从血液中生出一样。

马克思在对思辨哲学从一般概念构造出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所用的神秘方法进行剖析后，并对它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对思辨哲学从一般观念构造具体事物的神秘方法的批判，归纳起来有四点：

（一）思辨哲学从一般观念构造具体事物，同上帝创造万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基督教认为只有一个上帝的化身，而思辨哲学却认为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化身。

（二）思辨哲学从一般观念重新创造出来的个别的、具体事物，是虚幻的，超自然的，而不是真实的。马克思说，思辨哲学家最感兴趣的就是把现实的、普通的果实的存在制造出来，然后故弄玄虚地说：苹果、梨、扁桃、葡萄存在着。但是，在思辨的世界里重新得到的这些苹果、梨、扁桃和葡萄却最多不过是虚幻的苹果、梨、扁桃和葡萄，因为它们是“一般果实”的生命的各个环节，是理智所创造的抽象本质的生命的各个环节，因而本身就是理智的抽象产物。思辨哲学家感到高兴的，就是重新获得了各种

现实的果实，但这些果实已经是具有更高的神秘意义的果实，它们不是从物质的土地中，而是从思辨哲学家们的脑子的以太中生长出来的，它们是“一般果实”的化身，是绝对主体的化身。

(三) 思辨哲学家从一般观念构造个别的具体事物，也不能不以现实的事物为依据。马克思说，显而易见，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创造，只是因为他把苹果、梨等等东西中为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属性当做他自己发现的规定，把现实事物的名称加在只有抽象的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上。

(四) 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创造，根本上还是由于他们本身的观念的推演活动。他们把自己从苹果的观念推移到梨的观念这种他们本身的活动，说成“一般果实”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正是基于这种观念的推演活动，思辨哲学家才能证明这些果实的神秘的相互联系，证明“一般果实”怎样在这些果实的每一种中渐次地实现自身，并怎样必然地从自己的一种存在形式转到另一种存在形式。

马克思在总结思辨哲学家从一般观念构造出具体事物的神秘的方法时说：“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①黑格尔哲学就是凭借这种方法来构造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的。

依据对思辨哲学的认识论根源的深刻分析，马克思得出结论说，黑格尔的哲学是“头足倒置”的颠倒的世界观，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自然哲学中，都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

结果产生原因。

了解了思辨哲学的秘密，也就从根本上揭穿了鲍威尔等人用“自我意识”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但是，他们不善于象黑格尔那样“用巧妙的诡辩把哲学家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想象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本身所完成的过程”，也没有象黑格尔那样“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① 鲍威尔一伙的唯心主义不过是赤裸裸地表露出来的、并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

当我们了解了思辨哲学的秘密之后，黑格尔的具有神秘性质的历史观也就比较容易了解了。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②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本身只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过程，人类及其活动只不过是绝对精神借以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人类仅仅是精神的承担者。因此，不是人类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把人类作为绝对精神可以任意摆布的材料，人类是不值什么的，只有精神的发展才体现历史的终极目的。可见，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蔑视人类本身的使命与作用的。

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创造历史是无意识地完成的。因此，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76、108页。

体现绝对精神的全部发展的哲学，并不干预历史的发展，它只是在事后才以回忆的方式描述这整个过程。这样，黑格尔并未赋予哲学家以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并且他还十分忌讳这一点。他的历史理论仅仅限于对历史作思辨的解释。所以，在黑格尔的历史理论中，既无视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也未鼓吹个别英雄人物创造历史。

然而，当鲍威尔等人在袭用黑格尔的历史观时，却把绝对精神改为个人的自我意识，这样，当他们鼓吹个人意识创造历史时，就完全抹掉了现实的人类历史活动的丰富内容，大肆宣扬杰出人物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

第四节 对历史唯物主义重要原理的阐述

《神圣家族》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它的基本内容是阐述正在创立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系列重要原理。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用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初步阐明了社会生产方式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恩格斯后来回顾唯物史观形成的过程时说：“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①“但是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

有人要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①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通过批判鲍威尔等人的唯心史观，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重要原理如下：

一、阐述了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原理

费尔巴哈虽然有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在社会历史领域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他想用对抽象人的崇拜和“爱”的新宗教，代替信仰上帝的宗教，因此没有走出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马克思、恩格斯要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改造旧的历史观，就必须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费尔巴哈对抽象的人的崇拜的新宗教观。而要把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变成具体的现实的人，就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社会。

在进行这种分析中，马克思从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依赖关系，推演出了人们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必然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②这说明社会物质财富是为人们的生存所必需的，它对人来说是社会存在，而这些社会物质财富又是其他人劳动活动的产物，这样便由人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形成了生产活动中人对人的关系。列宁在评述马克思的这段话时写道：“这一段话极富有代表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页。

性，因为它表明马克思是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的基本思想的，——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的。”^①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第一次提出了把社会物质的生产方式作为理解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当鲍威尔等人企图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认为这样才能开始对历史现实的认识时，马克思批判说：“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鲍威尔一伙企图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实际上就是“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②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把社会发展某一时期的历史同该时期物质资料的生产状况直接联系在一起，认为物质资料的直接的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再次强调了他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中的观点。他说，犹太精神是依靠历史、通过历史并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这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现代犹太人的生活不能以他们的宗教……来解释；相反地，犹太教的生命力只能用虚幻地反映在犹太教中的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因此，“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③对此，列宁非常重视。他说：“马克思在这里尖锐而明确地强调指出了自己

①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140—141页。

的全部世界观的基本原则。”^①

马克思还进一步论证了：现实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精神和自我意识而客观存在的，人们的经济关系是人们的存在的基础，生产总是以某种客观物质条件为前提的。他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②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不是人们的观念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我们也只有在物质生产中才能认识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理解历史。

对于市民社会中人们依据物质利益而建立的现实的联系，马克思也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尽管鲍威尔等人要市民社会中的成员把自己设想为存在于极乐世界的自满自足的单个原子的存在，但是非极乐世界的感性的现实是不顾他这种想象的。人们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性，他的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一种需要，一个人的需要便同另一个满足他的需要的人建立起联系，这样就相互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皮条匠。由此可见，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利益，把市民社会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对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③

社会存在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物质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历

①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154页。

史的变革也是这样。马克思说：“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①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充分地利用他们考察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历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加深了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理解。他解释说，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一定的经济结构，与它相适应的是一定的政治制度。马克思指出：“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②这就为制定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还注意到，在国家 and 经济制度之间有着深刻的辩证关系，就是说，任何一种国家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制度决定的，但国家同样对这一制度也起反作用。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国家摧毁了限制资产阶级的封建权利和特权，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场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剖析的具体化，以及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在逐步形成中。

二、提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和随着历史发展这一作用将不断增长的重要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反对鲍威尔等人的英雄史观的斗争中提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145页。

出这一原理的。

鲍威尔等人鼓吹的英雄史观的特点，是将他们这伙自命不凡的“英雄”同广大群众绝对对立起来，无限夸大他们这伙“英雄”的作用，敌视和竭力贬低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在鲍威尔等人看来，只有个别的具有批判地“思维”的个人，才拥有“全能”的“自我意识”，才是强大的历史创造力。他们自命不凡，标榜自己是超群之才，宣扬社会历史是由他们这伙“哲学英雄”指挥前进的。同时，他们蔑视人民群众，胡说人民群众“精神空虚”、“毫无生气”，是“历史发展的障碍”，等等。群众在他们眼里被描绘成主要的社会祸害，认为由于这种祸害，人类的崇高意向和创举总是遭到失败。鲍威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①他们把群众看做是精神的对头和敌人。鲍威尔说：“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象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群众捍卫者所想象的那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②

由此，鲍威尔等人把进攻的矛头主要对准“群众”。对“群众”的连珠炮式的批判，这就是《文学总汇报》上大部分文章的主题。他们还认为共产主义更加依靠“群众”，因而放肆地攻击共产主义。

鲍威尔一伙还把“精神”同“群众”对立起来，认为历史的内容就是“精神”反对“群众”的斗争。

^{①②}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2、104页。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鲍威尔等人的批判，“把‘群众’和‘精神’之间的斗争‘规定’为过去全部历史的‘目的’；它宣称‘群众’是‘卑贱’的‘纯粹的无’，直截了当地把群众称为‘物质’，并把‘精神’当做真理性的东西和‘物质’对立起来。这样一来，难道绝对的批判不就是真正基督教德意志的批判吗？”①

不仅如此，鲍威尔等人还把“精神”和“群众”的对立跟“批判”和群众的对立等同起来；以后，又更进一步，把自身和“一般批判”等同起来，“把自己说成是‘精神’、是绝对者、是无限的，相反地把群众说成是有限的、粗野的、卤莽的、僵死的和无机的”。②

马克思揭露出鲍威尔等人把精神和群众对立的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玩艺，它只不过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和法国复辟时期“空论派”学说的翻版。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的发展，群众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承担者。法国复辟时期以弗·基佐和保·鲁瓦埃-科拉尔为代表的“空论派”，就宣布理性的独立自主和人民的独立自主是对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对鲍威尔等人诬蔑人民群众的谬论进行了批判。埃德加·鲍威尔胡说什么：“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制造”。恩格斯反驳说：“要是撇开单个工人不能生产任何完整的东·西·这·一·事·实（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谈的话，这种论点简直就是疯话。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③ 这里，恩格斯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120、120、22页。

明确地肯定了劳动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马克思也指出，只要看看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就可以理解工人群众的人格的高尚。

正是基于对群众的这种科学的认识，所以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

英国和法国的工人组织了各种团体，就表明他们非常彻底而广泛地理解从他们的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不可比拟的力量。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群众为反对资本主义奴役所进行的斗争，就是近代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是任何一个劳动群众都能懂得的真理。例如，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人并不认为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②所以，马克思强调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③

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们看到群众创造历史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66、152页。

的一切斗争，都是同他们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在鲍威尔等人看来，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运动，只要是反映了群众的利益，引起群众的关怀，它就是不成功的，没有实际成效的。马克思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例反驳说：“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尽管‘激情’已经消失，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装饰自己的摇篮的‘热情’之花也已经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①

马克思在肯定1789年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获得了实际成效的同时，也指出了在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中，只有对资产阶级以外的群众来说，由于革命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获得解放的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不成功的”。可见，如果说1789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

马克思由此总结出了一个有名的论断：“‘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了解，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②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这说明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人们的思想、动机，总是同一定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马克思既说明了人们的思想、动机同物质利益联系的必然性，也说明了这种联系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

由上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的阐述，已开始消除以往的历史理论的缺点。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①

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剖析资本主义 社会，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时，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恩格斯早在给《莱茵报》写的通讯《国内危机》等文章中，都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一定的认识，这是他们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标志。在《神圣家族》中，他们又对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明确回答了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担当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一

^①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伟大的历史使命。

为了揭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论证贫穷和富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自始至终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统一体中，两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说：“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中被诡辩所掩盖的相反的事实出发，即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贫穷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对私有制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充满矛盾的私有制本质表现得最触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愤的事实出发，即从贫穷困苦的事实出发。”^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的分析，就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状况出发的。

鲍威尔等人不研究资本主义这个整体的真正的运动，认为作为认识的宁静是高居于两个对立方面之上的，只有它那创造“整体本身”的活动才能消灭它所创造的抽象。这显然是思辨哲学的观点。

马克思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认为“贫富之间的这一全部对立正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②

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是如何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贫穷和富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对矛盾的呢？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43页。

首先，马克思肯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由两个对立的方面构成的一个统一体。他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①这一观点，显然是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分析的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统一运动的观点相衔接的。但是，从他往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就是：

接着，马克思着重分析了矛盾双方在统一体中各自所处的地位。他说：“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②

那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在统一体中各自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分析说，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资产阶级来说，它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

从异化的观点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是它们的异化情况也是不同的，资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

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从以上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对立的统一体中所处的不同地位的分析中，马克思得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①

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分析说，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它们意识到自己的贫困和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②

从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的唯物辩证的分析中，马克思得出了无产阶级肩负着消灭私有制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然而，鲍威尔等人却对此大加攻击，说什么这是把无产阶级看做神的原故。马克思批判了他们的这一谬论，强调指出这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非人的生活条件所造成的。马克思反驳说：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感受到那不可抗拒的贫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

因此，马克思得出了重要的科学结论。他说：“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紧接着，马克思强调说：“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同时，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充满了信心。他指出：无产阶级“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①

以上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精辟见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方法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总结英、法等资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所得出来的科学总结。

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人类解放的斗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的思想。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又进了一步，第一次表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是由其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这一重要思想。列宁在摘录《神圣家族》中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分析的大段文字时，肯定说：“其中非常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的几乎已经形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完成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还处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之下，还把道德应用于经济，例如他们在分析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时，主要是揭露他们的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揭示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人类本性”的矛盾，而不是如往后那样，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反映。因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还不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四、研究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概况，揭示 唯物主义理论同社会主义学说的必然联系

由于鲍威尔等人敌视唯物主义，歪曲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发展，否定社会主义学说和唯物主义理论的联系，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全面地研究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弄清

^①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页。

楚了它的来龙去脉,同时,对英国近代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培根、霍布斯、洛克的哲学思想也作了较深刻的分析。列宁认为这一章“是全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①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坚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哲学思想的发展,注意分析哲学思想发展的社会经济根源,注意哲学思想发展与政治斗争、与自然科学发展的联系,坚持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哲学上的基本派别相互斗争的角度来考察哲学史。

首先,马克思纵观近代欧洲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被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至十九世纪,这种形而上学体系又在德国思辨哲学中有过胜利而富有内容的复辟,在黑格尔那里,就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必然是新的唯物主义起来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②

从总体看,马克思深深感到当时的现实斗争与历史上的斗争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他写道:“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象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

^①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2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页。

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①

接着，马克思追溯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来源以及它们发展的概况。马克思指出：“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这两个派别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交错的。”^②

马克思先分析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源于笛卡儿这一派的发展线索。我们知道，笛卡儿是二元论者，他认为物质的特性是占有空间，但不能思维，精神(或心灵)的特性是能思维，但不占有空间，它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在物理学中，他认为只有一个实体即物质，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并把机械运动看做是物质生命的表现。而在形而上学中，却陷入了二元论的错误。法国机械唯物主义者接受了笛卡儿的物理学的唯物主义，而同他的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相对立。勒卢阿为这一学派奠定了基础，卡巴尼斯是该学派的极盛时代的代表人物，拉美特利是该学派的中心人物。直到马克思那个时候，法国还存在着笛卡儿派的唯物主义。它在机械的自然科学方面获得了卓越的成就，

而在法国以笛卡儿为主要代表的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遇上了唯物主义这一对抗者。与笛卡儿同时代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和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就是它的两个主要的反抗者。使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160页。

人则是比埃尔·培尔，他主要是驳斥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

在谈到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之所以被十八世纪唯物主义战胜的原因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由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马克思说：“实际上，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18世纪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①二是哲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马克思说：“17世纪的形而上学(想想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人)还是有积极的、世俗的内容的。它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与其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但是在18世纪初这种表面现象就已经消失了。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现在，正当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②这就说明当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联的时候，哲学就有积极的内容，它在自然科学中就会有所发现；反之，当哲学一旦离开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本身就会空洞无物、变得枯燥乏味了。

在分析完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源于笛卡儿的这一派后，马克思紧接着又分析了源于洛克的一派的发展线索。

我们知道，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英国出现了培根的唯物主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161—162页。

义。在培根那里，唯物主义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霍布斯系统化了培根的唯物主义，却使它变成了几何学一样的抽象，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正当神学和十七世纪形而上学遭到否定，唯物主义经过霍布斯片面发展后，人们感到需要一部能够把当时的生活实践归结为一个体系，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书的时刻，洛克关于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就适应这一需要而出现了，因此它象一位久盼的客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孔狄亚克在法国宣传和发展的洛克的学说，用洛克的感觉论反驳了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等人的形而上学体系。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并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的著作则是笛卡儿的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

马克思详细考察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来源和发展，主要是想弄清楚它们的发展规律、趋势和结果，弄清楚它与社会主义理论的联系。

在考察后，马克思指出：“笛卡儿的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财产，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则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①

从理论上，社会主义学说同唯物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写道：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页。

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①

接着，马克思还具体地分析了这些唯物主义理论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必然联系。他继续写道：

“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社会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②

正因为唯物主义理论同社会主义学说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从唯物主义理论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学说，所以很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是从唯物主义理论出发的。马克思举出了一系列的事实。他说，对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具有代表性的，是洛克的英国的早期学生之一孟德维尔对恶习的辩护。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167页。

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卡贝亡命英国，受到了当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当他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象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理论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

从马克思关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及它同十七世纪英、法唯物主义的关系，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联系诸方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划清界限，还没有最终创立自己新的世界观。这一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随后的著作中完成的。

总的说来，《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以及同他们的先驱者和思想敌人划清界限的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是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所开始提出的那些观点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第五章 清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全面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1845年2月初,马克思被逐出巴黎,迁居布鲁塞尔。4月初,恩格斯也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他们深入到政治运动中,并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们在团结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为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展开的紧张活动中,意识到自己有义务科学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他们的信念是正确的,于是便立即着手制定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当时,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鲍威尔、施蒂纳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企图用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来解释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献。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必须在清算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批判鲍威尔、施蒂纳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斗争中,来制定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的初期的理论成果,集中地反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部哲学著作中。

第一节 包含无产阶级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当时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

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象是一种也可能不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①

在哲学上，随着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先进分子中占据优势，它是刚从神学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新哲学。这一新哲学，曾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成就，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根据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检验，他们很快便认识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它否定革命实践，离开历史发展，离开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先进阶级来讲哲学，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必须改造这种哲学，才能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新的世界观。因此，在当时，思想战线上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错误，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特别是阐明革命实践的重大作用。

为了解决这一任务，1845年春天，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研究了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基督教的本质》等著

^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193页。

作之后，写出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份提纲马克思以《关于费尔巴哈》为题，写在他的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上。“提纲”制定了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观点的纲要。它在马克思生前未曾发表。恩格斯在1888年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将马克思的这份提纲作为该书的附录首次发表。为了使读者对马克思这份不是为出版而写的提纲更容易理解，恩格斯在1888年发表它的时候，还在文字上作了某些修改，并给予充分的评价，认为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①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观点，着重强调了实践在社会生活中和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强调了新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因而“提纲”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天才萌芽。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已经包含了往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所阐发的基本哲学观点的萌芽，可以说，它是新世界观的雏形。

从内容看，可以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十一条，大致分为总论、分论、结论这三个部分。具体说，在“提纲”的第一、二条中，马克思从总的方面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这里，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考察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的基础，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消极性，从而奠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页。

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提纲”的第三条至第九条，把实践的观点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观点。“提纲”的最后两条，总括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提出了哲学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领域里所引起的革命变革。

下面，我们对提纲的主要内容作一些分析研究。

一、从根本上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完成了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对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是当时欧洲唯物主义哲学的最新成就，因此，它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当时在伦敦、巴黎的“正义者同盟”的盟员都在努力地、广泛地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每周还为数百名德国手工业者以及盟员讲述《基督教的本质》。

然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毕竟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能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必须改造这种哲学，才能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写的这份提纲，正是反映了这一需要，也是对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的清算。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克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是有一个过程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本上还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下，到他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新的哲学原则同费尔巴哈哲

学原则的区别，开始超越费尔巴哈哲学，但是，当时并未完全克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甚至还过高地评价过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热烈地赞扬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说：“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编者注）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象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①当时，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也称赞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即《未来哲学原理》和《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对〈基督教的本质〉的补充》——编者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②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引导人们对费尔巴哈的著作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已经看到，费尔巴哈所提供的理论，远远不能满足无产阶级的需要。恩格斯后来说：“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过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②《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0页。

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①这里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底以前在思想上、理论上所达到的发展水平。

恩格斯还说过，1845年春天，马克思与他在布鲁塞尔重逢时，就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唯物主义理论的工作。马克思1845年5月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是他在这方面迈出的重要的一步。

“提纲”的中心思想，是强调指出感性的、物质的实践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和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这里把社会实践当做新的世界观的基本范畴提出来，这不仅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为制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提供了纲领。

“提纲”用实践的观点改造了旧哲学的认识论，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取代了费尔巴哈直观的反映论；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阐明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基本缺点就在于不了解实践的革命意义。同时，它也揭露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批判了他的唯心史观，指出其唯心史观的认识论根源也在于不懂得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提纲”对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一些具体表现作了批判，诸如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以及他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在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观点时，马克思第一次深刻地指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提纲”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特征，以及它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划时代的革命变革，从而同费尔巴哈以及一切以往的哲学学派划清了界限，开辟了人类思想史的新纪元。

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继续对费尔巴哈展开了批判，并且第一次全面地阐发了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马克思的这份提纲，可以说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纲要。

二、科学地解决了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马克思在“提纲”中，把实践的观点作为新的唯物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明确地把实践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因而正确地解决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科学地解决了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切唯心主义者，他们在说明认识的来源时，总是在思想范围内兜圈子，柏拉图、莱布尼茨认为人的认识是来自以“天赋观念”为基础的纯粹理性的活动，而贝克莱、休谟认为认识来自与物质现实脱离的一连串的感觉之中，黑格尔则认为人的认识渊源于“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虽然，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曾把“实践”作为认识的一个环节，但是，他所说的实践仍然是精神性的活动。

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者，包括费尔巴哈在内，关于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回答是很明确的，他们都认为人的认识是对客观外界的反应。可是客观外界如何反映到人脑中？对于这个问题，连同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者，都不能作出科学的回答。这是由于他们不懂得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所

以，他们的认识论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

马克思在“提纲”的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①这就是说，他们把客观外界事物看做同人的实践活动没有关系的纯客观的东西。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他们采取了“直观的形式”。在他们看来，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是由人的感觉器官去直接把握的。费尔巴哈就声称自己的哲学为“感性哲学”。他说：“我跟那些闭目静思的哲学家是天差地别的；为了进行思维，我需要感官，首先就是眼睛，我把我的思想建筑在只有借感官活动才能经常不断地获得的材料上面，我并不是由思想产生出对象，正相反，是由对象产生出思想；只是，这里的对象，专指在人脑以外存在着的東西。”^②

由上可见，费尔巴哈是把客观世界，当做人类的感觉的、直观的对象，而不当做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改造的对象。他完全不懂得客观世界首先是人类的实践对象和改造对象，人类也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地认识客观世界。总之，他们不理解认识的能动方面，所以，结果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它对能动的方面，也只是抽象地发展了。

事实上，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五彩缤纷的客观世界，早已打上

^①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②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页。

了人类实践的烙印。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靠商业的结果才在我们这个地区出现。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依靠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可靠的感性’所感知。”^①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告诉我们，作为人类认识的客体，并非象费尔巴哈所说的那样，是未经人的实践活动所改造过的那种“客体形式”。

马克思在“提纲”中，还指出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批判了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不是把人的活动看做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的错误观点。旧唯物主义者把认识主体的人，不是首先作为改造客观世界、进行社会实践的主体，而是把人仅仅理解为消极的、直观的、抽象的、孤立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他们不懂得离开了社会实践，人们便不能获得任何认识。诚如恩格斯所说的：“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②

在“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真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49页。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4页。

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

马克思把实践作为检验思维的真理性的标准，这一科学论断批判和结束了费尔巴哈和以往的哲学家们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混乱和错误的观点。

费尔巴哈由于不懂得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所以他不能科学地解决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问题。他对真理标准问题的看法比较混乱，这正反映了他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费尔巴哈坚持感觉是认识的出发点，认为感觉虽是主观的，但它的基础或原因是客观的，因而他有时把感性直观、把感觉作为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他说，能决定思维客观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乃是直观。”^②“只有那通过感性直观而确定自身，而修正自身的思维，才是真实的，反映客观的思维——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思维。”^③在费尔巴哈看来，感性直观是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东西，是直接通过自身而肯定自己的，因此，是绝对无可怀疑的，绝对自明的东西。他认为，“只有在感性开始的地方，一切怀疑和争论才停止。”^④但是，费尔巴哈没有注意到感觉的映象终究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感觉是存在于主体之内的，而检验主体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事物，这在主体范围之内是不可能获得证明的，只有人类实践的成功，才能证明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

①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②③④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9、178、170页。

有时，费尔巴哈又以人与人之间对事物的意见一致为标准。他说：“你的思想只有通过客观的考验，为作为你的客体的别人承认的时候，才是真实的。”^①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他更明确地说：“只有别人跟我相一致的地方，才是真的；一致是真理之第一象征，而这却只是因为类是真理之最终尺度。”^②费尔巴哈有时把这种意见一致称做“类的意识”，把它看做真理的标准。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只是依据个体性的尺度来思想，那末，所想到的东西就跟别人无关，仅仅是主观的想法；只有在类的尺度中来思想，那末，个人所想到的东西就是大家都能想到的，因而就是真的。因此，费尔巴哈断言：“跟类之本质相一致的，就是真的，跟类之本质相矛盾的，就是假的。真理就只有这样一条法则，除此以外便没有了。”^③

由于费尔巴哈把人的存在当做一种生物学上的类的存在，所以，他把类意识，也就是把区别于个人意识的集体意识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抬得很高。

以上种种不同的说法，无论是个人的感觉，人们共同的感觉或人类的集体意识，都没有超出主观意识的范围。费尔巴哈在这里同他所反对的唯心主义划不清界限。

费尔巴哈也曾使用过“实践”这个词，并且提出过“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他批判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从纯粹理性中寻找真理的标准，主张哲学要联系现实的人的生活实践。他曾谈论过，生活、实践比引证更有效。他说：“比淹博

①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1页。

②③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4页。

的征引更加有用到无量数倍的，却是实践，却是生活。我们每走一步，每看一眼，实践和生活都在对我们证实这一句话的真理性的。”^①有时他更为明确地指出：“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②

应当肯定，费尔巴哈强调要以生活、实践作为判断真理性的标准，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区别于从纯粹理性中寻找真理标准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把唯心主义者那种“与生活矛盾”即把生活、实践的观点排斥于理论之外的“思辨”，谴责为“僵死的、虚伪的思辨。”^③同时，费尔巴哈较之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更加明确地意识到单靠理论上的论证是不足以驳倒唯心主义和论证世界的现实性的。列宁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费尔巴哈从他的人本主义的原理出发，把“实践”仅仅理解为被他当出发点的那个抽象人的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或“利己主义本能”的活动，如吃、喝和人们之间的日常交往等等，而不是如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那样是一种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的、物质的活动。费尔巴哈之所以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生理活动，这是由他的人本主义哲学立场决定的。他既然从生物学、生理学意义上来理解人的本质，因此，就不可避免地把人的生理活动当做一种最基本的活动，亦即最基本的实践。费尔巴哈之所以又把实践理解为一种利己主义的活动，乃是他就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

①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54—555页。

②费尔巴哈：《说明我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片断》，《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48页。

③费尔巴哈：《论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特别是从意志自由方面着眼》，《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28页。

认为人的最基本的意向，就是自我保存的意向，就是利己主义的意向。他认为，人的最基本的追求，就是对于幸福的追求。人为了自我保存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既是出于生理上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利己主义原则。因此，他把人为实现自我保存而进行的利己主义活动，称做“实践的处世原则”。他说：“直到今天，犹太人还不变其特性。他们的原则、他们的上帝，乃是最实践的处世原则，是利己主义，并且，是以宗教为形式的利己主义。”^①不只如此，费尔巴哈还把他说的那种“实践”（他称之为“实践的直观”）贬低到所谓“理论的直观”即理论的活动之下，认为只有后者才是令人喜悦的、令人满足的、令人幸福的直观，而前者“是不纯洁的、为利己主义所玷污的直观”。^②费尔巴哈推崇理论，鄙视实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③

费尔巴哈所说的实践，既然只是人的生物学和生理学的一种自我保存和利己主义的活动，那末，这种实践既不能作为认识的基础，也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

前面已经讲过，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④马克思在“提纲”中关

①②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46、235页。

③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于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的论述，显然是《手稿》中这一思想的发展。不过，在“提纲”中，马克思赋予了实践以更为基本和重要的意义，他是在把实践观点作为新世界观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之点的情况下，把它作为真理的标准的。

三、体现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科学的自然观和科学的历史观的统一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科学的自然观和科学的历史观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是分离的。而所有的哲学家，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几乎都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哲学包含着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他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是为唯心主义体系服务的，以致他的辩证法被他的过分茂密的体系所窒息了。可见，从唯心主义出发，是不可能把辩证法贯彻到底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虽然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它又全盘否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但由于其形而上学方法的限制，使得他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仍然陷入了唯心主义。由此可见，凡是否认辩证法，坚持形而上学，就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总结了哲学史上的这些经验教训，并根据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认识到必须创立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史观相统一的科学的哲学体系。

马克思的这份“提纲”，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体现了唯物

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大家知道，无论是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还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尽管都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都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则，但他们由于不懂得思维对存在、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把认识过程仅仅看做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结果，因而忽视了人对外界事物的能动的改造的作用。例如，费尔巴哈就不懂得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人的认识不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能动地、积极地进行的，而只是消极地、受动地接受外界事物的刺激。他说：“自我的受动的状态是客体的能动的方面。正是因为客体是能动的，我们的自我才是受动的，——不过，自我不必耻于这种受动性。”^①由于主体是受动的，他认为客观事物就象空气通过我们的口、鼻以及一切毛孔，挤进我们身内来一般，进入主体之内，引起认识。

可见，旧唯物主义者之所以不能把唯物主义同辩证法统一起来，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人是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去认识世界的，不懂得主观对客观的反作用，把人对客观世界的关系只看作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不是看作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

马克思在“提纲”中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科学地解决了主体和客体、人和周围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肯定物质、存在的第一性和意识、思维的第二性，而且指出了意识的能动作用，指出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而实践是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的基础，实践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提纲”把唯物主义和辩

^①费尔巴哈：《论“哲学的开端”》，《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1页。

证法统一起来了。

同时，也只有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的
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统一起来。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了旧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
陷入了唯心主义，并且指明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的认识论根
源就在于不理解实践批判活动的作用和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首先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所以它才是认
识的基础。马克思在“提纲”中阐明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理，无一不是立足于社会实践的观点之上的。正是由于马克思
发现了社会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才探索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
认识论的一系列重要原理。

马克思在“提纲”中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
这就是说，社会实践是社会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社会生活只有
通过社会实践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一旦停止了社会实践，社会
生活也将立刻停止。离开了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就无
所谓社会和社会生活，因此，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只有从社
会实践中去把握。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才能把唯物主义的原则
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去，创立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后来，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明“提纲”中的这一基本观
点，指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
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
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
的东西。”^②社会实践不仅是社会生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

^①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
社1972年版，第1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
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时也是各种社会意识赖以产生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各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不仅科学地反映现实的社会理论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可以从社会实践中找到它们的根源,即使象宗教神学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神秘主义的信仰,也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虽然它们是对客观实际的歪曲反映,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它们的根源。所以,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①后来,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②马克思所阐发的关于社会意识本质的原理,为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才能正确地指出宗教这一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以及消灭宗教的根本途径。而费尔巴哈等的旧唯物主义则不可能正确地解释宗教这一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都是在一定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他在“提纲”第六条中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还在“提纲”中阐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批评了罗伯特·欧文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并且指出:“环境的

^①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①说明了环境改变的过程，也正是人们的革命实践的过程。人们在改变环境的实践中，同时又改造人们本身，既教育别人，又教育自己。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是统一的，它们统一的基础就是革命的实践。这里也说明了人民群众以本身的革命实践活动去改变社会生活条件，而不指望有什么救世主从上面来改变社会环境，这就进一步说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总之，在“提纲”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条目中，实践的观点同样象一根红线贯彻始终。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上，“提纲”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为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提出了雏形。

四、鲜明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实现人类真正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把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这些说明马克思已经接触到了无产阶级新型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

“提纲”发挥了上述观点，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页。

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基本特征,这就是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提纲”深刻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了哲学的阶级基础,使哲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改变了哲学的目的和使命,使哲学从解释世界的工具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

“提纲”的第十条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对立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他们用“市民社会”这个名词来表示当时已经摆脱了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马克思在这里借用资产阶级学者的这一术语,用来说明:旧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上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马克思在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时,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说明了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马克思在“提纲”第十一条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马克思总结了辩证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起的革命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它给哲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任务:不仅要说明世界,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

^{①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19页。

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哲学家，不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都是脱离社会实践的。由于他们不懂得理论来自实践，因而他们的理论也就不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们更不懂得理论要回到实践中去，为实践服务，因而，他们也就仅能给自己提出说明世界的任务，而不能给自己提出改变世界的任务。大家知道，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虽然从理论上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进行了批判，但他们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自己提出改变世界的任务。例如，霍尔巴赫曾经说过，人若是想改变世界的秩序，那只不过是一个盯在马车车辕上、却以为自己在指导马车行进的苍蝇而已。十九世纪40年代出现在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也批判了宗教神学，并竭力标榜自己是一切的无情批判者，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末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①

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宗教神学，宣扬了无神论；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捍卫了唯物主义，但是他也未给自己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只能观察对象而不能改变对象，因此，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积极地能动地改变自然，而是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23页。

在于消极地被动地观察自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物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①

马克思主义根据实践的观点改造了旧哲学，强调哲学要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一方面，它在理论上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和在哲学中的地位，说明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它坚持理论要付诸实践，变为人民群众的行动。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

马克思在“提纲”中，通过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些基本原理，为进一步系统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纲领。在“提纲”中，马克思着重强调社会实践在社会生活和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实践的观点贯穿“提纲”的始终。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应用于认识论，克服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消极性和直观性，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把实践的观点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最后，马克思从实践观点出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提出了无产阶级哲学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总之，社会实践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页。

^②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8—269页。

观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对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清算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清算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

马克思在谈到他同恩格斯一起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时说：1845年春，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①这就是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中，他们以批判黑格尔之后的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哲学的形式，来清算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写作这部巨著的直接起因，是1845年夏天费尔巴哈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9月“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发表了一批著作，而其中主要的是10月中旬《维干德季刊》第3卷发表了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文章。

1845年秋天，马克思、恩格斯就酝酿了这部书的具体写作计划，而着手写作，是在同年的11月。至1846年4月，本书的写作基本上完成，直到恩格斯写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第二卷的补充），本书的写作就告最后结束。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副标题是《对费尔巴哈、布·鲍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页。

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这部著作共分为两卷：第一卷的内容主要是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的哲学观点。本卷中很重要的一章，即对费尔巴哈哲学观点的批判的写作工作，持续到1846年的下半年，最后仍未完成。第二卷的内容是对各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的哲学观点的批判。本卷的第二章、第三章遗失了。

这部重要著作，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能发表。1846年5月，第一卷手稿的主要部分曾由约·魏德迈带到威斯特伐里亚，准备请当地的企业家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出版。但是，在1846年7月，当第二卷手稿的大部分寄到威斯特伐里亚以后，这些出版商由于批判触及到他们，就拒绝承印了。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多次设法出版这部著作，但由于警察的迫害和他们所反对的那些派别的代表的阻挠，始终未能实现。当时，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代表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的利益的出版商。……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①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只在1847年8月号 and 9月号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第四章，即《卡尔·格律恩》那一章。恩格斯逝世之后，手稿存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伯恩施坦、考茨基借口《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写完和不好理

^①《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8页。

解，一直不予发表。直到1932年，才在苏联发表这部书的德文全文。

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在批判当时德国哲学界各种唯心史观的斗争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主要的是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关于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以及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等一系列的重要思想。

这部著作在论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开始科学地论证他们在《德法年鉴》中提出的观点。但是，在这些代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一定阶段的著作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没有摆脱或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同时也没有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进行全面的批判。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在一切基本方面都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已不再把自己的学说叫做“现实的人道主义”，而把它叫做共产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学说不仅与唯心主义对立，而且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对立，同样它也与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立。可见，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同揭露当时工人运动中占居统治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空想观念紧密结合着的。

二、对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清算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该书第一卷的写作目的，即对于包括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在内

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说明。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同德国哲学的代表人物论战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改变当时的现实？对此青年黑格尔派作出了种种回答：有的说只要教会他们如何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来代替这些幻想，有的说只要教会他们如何批判地对待这些幻想，还有的说只要教会他们如何从头脑里抛掉这些幻想，这样，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这些天真的幼稚的空想构成现代青年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本书第一卷的目的在于揭露这些自称为狼、别人也把他们看作是狼的绵羊，指出他们的咩咩叫声只不过是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而这些哲学评论家们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的贫乏。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如此投合沉溺于幻想的精神萎靡的德国人民口味的哲学斗争，使这种斗争得不到任何信任。”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首先是从批判费尔巴哈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只有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才能最终地完成新世界观的创立工作。他们明确地指出：“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着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分析。”②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曾作了过高的评价，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提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16、20页。

法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写道：德国的批判，都没有离开过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地。“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尔哲学。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互相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起初他们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伪造的黑格尔的范畴，如实体和自我意识，但是后来却褻渎了这些范畴，用一些世俗的名称称呼它们，如‘类’、‘唯一者’、‘人’，等等。”^①

后来，恩格斯也指出：“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的立足地这一点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支脉。”^②施特劳斯和鲍威尔没有摆脱对黑格尔哲学的依赖关系，费尔巴哈也仍然停留在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因为费尔巴哈用“人”、“类”这些世俗的名称代替了黑格尔的思辨的范畴，表明了他历史领域中仍然是玩弄抽象概念的唯心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③

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出发点是其抽象的人性论。关于人的学说，或者叫做论人的本质的学说，在费尔巴哈的整个人本主义哲

①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51页。

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学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费尔巴哈曾经说过，他的学说的主要内容就是自然界和人，自然界是他的哲学的出发点，但人是他整个哲学的核心。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学说，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之上的，他对人的本质下过很多定义，有一些定义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不论那一个定义，他关于人的学说的出发点，都是把人当作一个生物学的本位，当作一个生理学上的实体。

费尔巴哈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自然界的异在。这就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以及宗教神学关于人的学说区别开来了。但是，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看做是自然存在物，是抽象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只把人当作感受着欢乐与痛苦、希望与悲哀的生物学的人，他只看到了“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而不是感性地活动的人。费尔巴哈不了解人不仅有着肉体 and 由肉体决定的自然需要，而且还有着实现这种需要的手段，即实践。由于实践不断作用于自然界，改造外部世界，使之适应于人们的需要。并且，人也不是单个的、孤立地从事对外部世界的改造活动，而是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上所结成的生产关系中进行改造世界的活动。因此，实践着的人又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联系之中。由于费尔巴哈撇开了人与现实活动的联系，这样的人就只能停留在抽象的范畴中。费尔巴哈从感性出发，并且紧紧地抓住感性，结果却陷入了最贫乏的抽象之中。因此，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学说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性生活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这个“人”仅仅是服从自然规律的自然物。他不懂得人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更重要的是社会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说：“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

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①

由于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的理解，他把现实生活中一切个人的不幸与痛苦，只是解释为人的本质的丧失，而不是现实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样，费尔巴哈就把个人和外部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说成是个人的本质与非本质之间的分裂。如何克服这种分裂？费尔巴哈只有诉诸“最高的直观”，即企图用“类”的抽象概念来摆脱个体的绝望处境。他认为：“只有类才能够同时废掉和替代神性与宗教。”^②可见，费尔巴哈所求助的这个“类”概念，只不过是把宗教的语言换成世俗的语言，因为这个“类”概念，仅仅是从基督教的上帝那里变化而来的。按照费尔巴哈的说法，个人在受苦受难时，不应该求救于上帝，而应求救于“类的思想”。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页。

②费尔巴哈：《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8—429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忽视政治和阶级斗争，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作了批判，指出费尔巴哈对现存的生活关系没有批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癧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癆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他们对于费尔巴哈批判思辨哲学把“绝对精神”、“实体”、“自我意识”作为历史的出发点是赞同的，确认历史的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又不赞成费尔巴哈把人看做是栖息于社会之外而离群索居的单个的人。他们认为，为了把个人作为出发点，必须首先研究人们生活的那个世界，他们的历史发展以及相互间的一切客观的现实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有生命的个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但是，他们认为“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③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不同，他们不满足于从抽象的个人出发，而是要从生活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的现实的个人出发，这些个人连同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制度，是以往历史的产物，同时通过他们的感性活动和创造又改变着现存制度，推动历史进一步发展。马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51、23、23页。

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①“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②个人是什么样的，就要看他们的物质活动以及制约着他们的活动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什么样的，因而对人的研究必须要归结到对人生活在其中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研究，发现它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样，对人的研究就可以象自然科学那样借助于“纯粹经验的方法”来进行，而不能象黑格尔、费尔巴哈那样，仅仅囿于哲学范围之内探索人的形而上学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区别人和动物的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宗教、意识或其他，而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资料的“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③

为了历史地、具体地确定各个历史阶段的个人及其物质生活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24、24页。

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经济形式（所有制形式）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标志历史发展的一定社会阶段的科学概念。他们认为，任何现实的个人，都是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历史上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一定的所有制形式构成一定社会的现实基础，它是全部历史活动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正是由于一切人都生活于一定历史阶段的一定的物质生活关系中，因而人的本质就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现实的具体的个人代替了费尔巴哈的超历史的抽象个人。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历史研究必须以现实的人为对象、并从分析现实的人得出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最基本的活动，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交往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这就克服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缺点，与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

对费尔巴哈把整个人类历史看做是“人的本质”、“人性”的实现过程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也进行了批判。费尔巴哈用抽象的“人”来代替过去和未来一切历史时代实际存在的个人，并把这种“个人”说成是历史的动力。在他那里，整个历史过程被看做是“人”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实现的过程。由于费尔巴哈的“人”是关于“人”的理想，是理想化了的人，他仍然是思辨的产物，是纯粹的范畴。因为“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

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象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①

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人性”当做“绝对物”，这种“绝对物”是对于人们的现实历史和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物质条件的抽象化的结果。这种抽象化的过程是按照思辨的逻辑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揭露说：“人们在其中生产自己生活的并且不以他们为转移的条件，与这些条件相联系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由这一切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当它们以思想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不能不采取观念条件和必然关系的形式，即在意识中表现为从一般人的概念中、从人的本质中、从人的本性中、从人自身中产生的规定。人们是什么，人们的关系是什么，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自身、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于是，在思想家们假定观念和思想支配着迄今的历史，假定这些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就是迄今存在的唯一的历史之后，在他们设想现实的关系要顺应人自身及其观念的关系，亦即顺应逻辑规定之后，在他们根本把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的历史变为人们的现实历史的基础之后，——在所有这一切之后，把意识、观念、圣物、固定观念的历史称为‘人’的历史并用这种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了。”②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和批判了费尔巴哈关于抽象的“人的本质”或“人性”决定历史发展的唯心史观之后，指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人的本质”或“人性”的

①《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9—200页。

实现。个人的发展也是取决于一定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①

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是根本不同的（这点，我们在本章第五节将要详细论述）。同时，他们还指出，一切旧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费尔巴哈同样如此，他“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哲学不仅要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③

第三节 对施蒂纳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

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杂志《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发表了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反驳费尔巴哈、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把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反驳比喻为高级僧侣在宗教会议上对异教徒的审判，戏称为“莱比锡宗教会议”。《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莱比锡宗教会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5、47、48页。

议”这一标题下，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

在谈到鲍威尔时，马克思、恩格斯讥喻道：他的头上罩着“纯粹批判”的灵光，披着“自我意识”的法衣，睥睨世界的万物。他以最高的自我意识的名义肆意摆脱“实体”概念，从而摧毁了完整的宗教和具有各种表现的国家。当他的眼光把“群众”“化为”灰尘的时候，教堂的废墟和国家的“残骸”就横陈在他的脚下。他好象上帝，既无父也无母，他是他自己的创造物，他自己的制品。一言以蔽之，他是精神的“拿破仑”。他在精神上的修炼就是经常不断地“倾听自己，而这种自我倾听又推动他达到自我规定”^①。

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又讥喻麦克斯·施蒂纳说：他用了将近六百页的篇幅来确定和证明了他与自身的同一，证明了他不是随便什么人，不是“张三或李四”，是圣麦克斯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关于他的灵光和其他特殊标志，可说的只有一点：它们是“唯一的”和“无与伦比的”，“它们是无可名状的”。他既是“词句”，又是“词句的所有者”，既是桑乔·潘萨，又是堂吉珂德。他苦修苦练的是对无思想进行痛苦的思想，对无可怀疑进行连篇累牍的怀疑，把毫不神圣的说成是神圣的。他总是习惯地说：我就是一切，而且是高于一切的某物。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指出：“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②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9、22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时指出：鲍威尔的哲学，依旧因袭黑格尔的老谱。“圣布鲁诺依旧在骑着他的老年黑格尔派的战马耀武扬威。”^①并且指出：“黑格尔用以反映——以歪曲的形式反映——现实冲突的那种抽象的和神秘的词句，在这个‘批判的’头脑看来就是现实冲突本身。布鲁诺接受了思辨的矛盾，并把这个矛盾的一部分同另一部分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词句就是现实问题本身。”^②

由于在《神圣家族》中，已对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批判，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中，着重批判了把鲍威尔的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极端的施蒂纳的唯心主义。

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是现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始祖之一。他和蒲鲁东（1809—1865）、巴枯宁（1814—1876）一起是无政府主义的三个主要代表。

麦克斯·施蒂纳是约翰·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除称他为施蒂纳外，还用了许多讽刺的外号，把他称为“圣师”、“柏林小市民”、“乡下佬雅各”、“教书匠”、“圣者”、“桑乔”、“堂吉珂德”等等。

施蒂纳是一个遭受贫病折磨的知识分子，1806年10月25日出生于法国巴伐利亚的拜洛伊特，幼年丧父，1835年于柏林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曾当过中学教员，属于青年黑格尔派。1842年初，恩格斯在柏林与他相识。施蒂纳的一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活动和业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2、93页。

绩。1844年他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本著作从理论上来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解体和庸俗化的代表作。在这本书里，黑格尔哲学的全部精华被弄得一干二净，而其糟粕确被大肆发挥。它把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变成了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辩证法变成了诡辩，把批判变成了空话。施蒂纳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的鼓吹者。在他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观念中，反映了德国小资产者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满。施蒂纳的个人主义，按其实质来说，是敌视共产主义，反对对私有制的任何侵犯的。

施蒂纳在这部书中，批判了鲍威尔和费尔巴哈，指出他们都不彻底的，不敢趋于极端。他认为，鲍威尔把“自我意识”当做最高的存在，费尔巴哈把“人”当做最高存在，这就象教会里的信徒把上帝当做最高存在一样，也和共产主义者把社会当做最高存在一样。他还认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都有宗教情绪，从这种观点出发，看不到主要的东西是个别的人，也就是“我”，而只有“我”才是唯一真实的东西。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的“唯一者”就是这个“我”。施蒂纳的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人”；第二部分讲“我”。在书的第一部分，他的基本思想是要说明“人”是利己主义者。他认为上帝和人类都是利己主义者。在当时，上帝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崇高的。他认为，人类要个人为全人类牺牲，上帝也要个人为上帝牺牲，上帝和人类都把它们的事业安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它们都是唯一者。他说，如果我也同样把自己的事业安放在我身上，那末我就和上帝一样，这时我也就是唯一者了。他还说，任何一个高于我之上的更高的存在，无论上帝也好，人也好，都削弱了我的唯一性的情感，并且都要在我的唯一性意识的阳光下枯萎。他认为，诸如

上帝、皇帝、教皇以及祖国等等，都是怪影、幽灵。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所讲的“人”也都是幽灵，都要加以毁灭。他还说，一切理想都是怪想，要想形成“共同体”即集体的思想也是怪想，而且抱有这种思想的人都被称做有宗教情绪。因此，真正的人必须使自己从所有这些胡说中解放出来，真正的人不允许承认任何别的东西，只允许承认唯一的“自我”本身。他说，只有真正把我的事业放在自己身上的人，才是唯一的利己主义者。施蒂纳明白地表示，他要把极端利己主义提到原则高度而使之获得经典性的表述。

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第二部分，施蒂纳关于“我”的基本思想是要说明“我是世界的创造者”。他说，我要的是我所有的一切，我要有我所能是、能有的一切，我要是要有的意志创造一切。

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阐发的思想，一直是百余年来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依据。一些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如蒲鲁东、巴枯宁等，都从施蒂纳的这本书中抄袭和偷运黑货。

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施蒂纳的观点对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都有一定的影响，对工人运动也有间接的影响，所以对它进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采用任意编造的手法，宣扬对精神力量的信仰，大量引用《圣经》中有关精神统治世界的无稽之谈，宣扬极端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本“天书”作了详细的揭露和批判。由于施蒂纳在书中大量引用《圣经》，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这本书看成和《圣经》一样的东西，他们在批判过程中，也用“旧

约”、“新约”、“创世记”、“启示录”、“所罗门的雅歌”等《圣经》上的标题来称呼该书的相应部分，还经常引用《圣经》里的话来讽刺和嘲笑施蒂纳。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宣扬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如下的揭露和批判：

其一，揭露和批判了施蒂纳一切从“我”出发的利己主义。

前面讲过，鲍威尔从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出发，把所谓个别具有“批判思维的人”，亦即把个别伟人看做决定历史发展的“至上”力量。而施蒂纳把鲍威尔的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到顶点，直接宣称“自我”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唯一者”，“我”就是世界万物的主宰。

施蒂纳认为，这个“唯一的我”是高于一切的某物，是一切中的一切。一切都是“自我”的产物，因而他把整个世界说成是他自己的所有物。施蒂纳公然鼓吹说：“我就是我的一切，这个我就是唯一者”。^①

施蒂纳还声称，只有“唯一者”即“我”才是世界的核心，是世界历史的动力，甚至就是世界历史本身。他反复强调说：“我一身既是创造者又是造物。”^②“我就是中心……如果我摆脱了不是我的一切东西，那末剩下下来的是什么呢？剩下来的仅仅是我，而且不外是我。”^③“唯一者”最后狂呼大叫：打倒一切完全不是自己的东西，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我更高了。施蒂纳的“唯一者”即“我”也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他既是万物的主宰，又是万物

①②③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299、511页。

的尺度。他衡量周围事物的唯一标准是：对我是否有用。施蒂纳说：“在我看来，你只不过是一种食品，正如你把我当作食品并加以利用一样。我们彼此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即相互有利、相互有用、相互有益的关系。”^①他认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世界上唯一现实的是利己主义。施蒂纳还认为对“唯一者”来说，除了利己主义的“我”之外，不存在任何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和公共生活规则。由此，施蒂纳进而认为，真理是“我”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制造的。除了“唯一者”的个人利益而外，不存在任何别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施蒂纳既然把“我”奉为造物主，但是这个造物主乃是需要物质利益的利己主义者。他需要的是支配物质世界，掌握物质利益的绝对自由。施蒂纳说：“世界是属于我的”，“我是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的所有者”，^②“他的（指别人的）财物就是我的财物，我以所有者的身份按照我的权力支配它们。”^③可见，施蒂纳要求个人绝对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掠夺社会财富的自由。施蒂纳说：“我并不在你的和你们的财产面前畏缩，而是把它看作是我的财产，其中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值得尊重的东西。”^④

施蒂纳还说，“唯一者”的“自我”，对社会只要求权利，而不对社会负任何义务，他把义务看做是对个人自由的束缚。施蒂纳说：怎样获得自由呢？“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不承认任何义务，也就是说，不要束缚自己也不要让自己受到束缚。”^⑤这种只要权利不尽义务的观点，也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施蒂纳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功利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即我是通过我

①②③④⑤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8、471、472、474、384页。

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利益(人剥削人)。”^①可见施蒂纳所宣扬的原则是赤裸裸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按照他的真正内容来说，他是讲求实利的小资产者的维护者，但他却奋起反对与小资产者相适合的意识，这种意识归根到底是小资产者对于他们所高攀不上的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观念。”^②

其二，揭露和批判了施蒂纳一切从“我”出发的无政府主义。

列宁说：“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③施蒂纳宣扬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是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核心。施蒂纳进一步发展了青年黑格尔派布·鲍威尔的观点，提出了把单独的个人即“唯一者”看做是创造一切的绝对本体的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同时，施蒂纳以这个单个的主体即“唯一者”作为评价社会秩序、制度和习俗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此作为他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施蒂纳从这种极端反动的唯我论出发，狂热地鼓吹极端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组织和纪律，反对共产主义，因为“唯一者”的行动是绝对自由的。

恩格斯说：“无政府主义者也成了十足的‘唯一者’，他们唯一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两个可以和睦相处的人。”^④这个“唯一者”不接受任何约束，不服从任何组织纪律，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9、303页。

③列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④恩格斯：《致麦·希尔德布兰德（1889年10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87页。

反对一切权威。他认为个人的一切要求、意向和愿望都必须无条件地得到满足。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不管是国家、社会、团体、人民、民族、祖国、人类以及世界本身，只要是束缚个人自由的，同“唯一者”的利益相抵触的，施蒂纳认为都要无情地把它消灭掉；任何意识形态，诸如伦理、道德、法律、权利、义务、正义、真理等等，只要同“唯一者”的自由意志相矛盾，统统都要当作“怪影”加以驱逐。施蒂纳还认为祖国、民族、人类、法律、义务这些概念，都是个人意识所造成的对自己的束缚。他说，如果个人的意识不敢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就要失去自己的利己主义。

施蒂纳认为国家是万恶之源，国家和我是两个死敌，必须把它打倒。他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就是由于“我”对自身的尊重，随着对自己个人的这种轻视的消失，国家也必定会消失。由于施蒂纳颠倒了国家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决定所有制。在他看来，资产者之所以能够获得财产，在于他受到国家的保卫，得到国家的恩赐。他认为国家具有无限的权力，他可以给资产者以财产。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国家是由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决定的。

施蒂纳进而认为，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不在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是由国家造成的，所以他认为“每一国家都是暴君”。施蒂纳说：“我自有的意志和国家是死敌，二者之间不可能有永恒的和平。”^①施蒂纳也反对一切政府，认为任何一种政府都是限制和支配个人的力量，因此，他主张什么政府也不要。正是这种反对一切国家和政府的主张，所以才被称为无政府主义。

^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2页

施蒂纳号召利己主义者起来暴动，建立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的理想制度，即所谓“利己主义者联盟”。显然，施蒂纳在这里所说的暴动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行动。他说：“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安排，暴动的目的则是使我们不再受别人的安排，而由我们自己安排自己。暴动不是反对现存的东西的斗争，因为如果它发展起来，现存的东西就会自行灭亡；它仅仅是使我从现存东西的统治下解脱出来的一种行动。……由于我的目的不是推翻存在的东西，而是我奋起凌驾于它之上，所以我的目的和我的行动丝毫没有政治的或社会的性质；它们只是针对着我和我的独立性的，所以它们是利己的。”^①这里表明了，施蒂纳所说的“暴动”乃是利己主义者实现自己贪欲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说，施蒂纳“之所以力图摆脱现存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是他的障碍，相反，在其他方面，他却力图尽快地把它攫为己有。”^②至于“利己主义者联盟”，尽管施蒂纳把它想象成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天堂，在其中不仅可以享受“高级自由”，而且还可以确保自己的财产，增加自己的力量。实际上这种“联盟”仍然是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在“联盟”中仍然保留着雇工剥削、高利贷等等，联盟之间仍然是尔虞我诈的关系。“联盟”和国家不同的地方仅在于，国家是凌驾于利己主义者之上的力量，“联盟”则是利己主义者自己的工具和武器，国家是利用“我”的，“联盟”则为“我”所用。可见，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真的不要政府，而是不要别人的政府，是要建立能为自己服务的政府。

其三，揭露和批判了施蒂纳为利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提供根

^{①②}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8、444页。

据而任意编造历史。

施蒂纳认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世界上唯一现实的是利己主义，为此，他企图按照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精神来概括人类历史，以便为自己荒谬的结论作论证。施蒂纳把利己主义当做是个人意识的实质和个人的权利，认为利己主义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实质上也是唯一的結果。

施蒂纳指出，人类的历史正如个人的发展一样，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发现”的过程，他经历了儿童、青年、老年三个阶段。在儿童时期，人被周围的“事物世界”所迷惑，却“企图洞察事物的底蕴或看看事物后面是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终究会克服“事物世界”，战胜这个世界，随即进入新的阶段，即进入青年时期。在青年时期，人发现“我们凌驾在世界之上，我们就是精神。”这是“第一次发现”。如果儿童只匆匆地寻问“什么是真理”，那末，青年则“力求掌握思想”，“领悟观念、精神”，并“寻找观念”，于是他就被真理、自由、人类、人、祖国、国家等等观念所鼓舞，也就被这些观念所统治。^①由于时间的推移，人由青年进入成人时间，即达到“第二次自我发现”。施蒂纳说：“正象我〈应读作‘青年’〉在事物后面发现正是作为精神的我一样，以后我〈应读作‘成人’〉一定在思想后面发现我正是作为思想的创造者和所有者。在精神时期，思想虽然是我头脑的产物，但它们超过了我〈青年〉；它们象热病时的胡想一样，在我上面萦绕并使我战慄；这是十分可怖的力量。思想对自己来说成了有形体的东西，成了怪影，如神、皇帝、教皇、祖国等等；我摧毁思想的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0页。

形体性，把思想收回到我自己的形体中来，并且说：只有我一个人有形体。我于是将世界作为我心目中的世界来把握，作为我的世界、我的所有物来把握：我把一切都归于我。”^①这时成人发现了青年认为统治自己的那些观念，不过是自己“热病时的胡想”，只要抛弃了这些胡想，人便解放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施蒂纳认为“成人在青年阶段把各种有关皇帝、祖国、国家等等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和关系的荒谬想法塞进自己的头脑，并且他认识到这些力量和关系仅仅是自己的观念，是自己的‘热病时的胡想’。这个成人，在圣麦克斯看来，只要他把有关这些力量的错误想法从头脑中挤出去，就可以把这些力量真正摧毁。”^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事情恰恰相反，只要他不再用他的幻想的眼镜观察世界，他就得考虑这一世界的实际的相互关系，研究和顺应这些关系；只要他摧毁了他所赋予世界的幻想的形体，他就会在自己的幻想之外发现世界的真实的形体。

由于施蒂纳把一切现实的关系仅仅看做是自己观念的产物，认为只要从头脑里排除自己对事物的错误看法，就足以使这些事物丧失自己的力量而无法对我们进行控制。马克思、恩格斯对施蒂纳的这种唯心主义讽喻说：“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末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③

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6、16页。

施蒂纳还认为,古代是儿童时期,宗教统治的中世纪是青年时期,近代正在实现由青年向成人的过渡。然而这些自我发现并非历史的发现,不过是施蒂纳的关于人的唯一的历史的虚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指出:施蒂纳所编造的历史,“成为关于精神和怪影的神话”,“我们认为圣麦克斯的这种编造历史的方法是最幼稚的,最简单的。作为儿童、青年和成人而出现在我们之前的三个简单范畴,即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和作为两者的统一的绝对否定(这里称为‘利己主义’),被当作全部历史的基础,并挂上各种各样的历史招牌;这些范畴和它们的恭顺的随员即辅助范畴一起,构成所描绘的一切伪历史的阶段的内容。”^①

但是,在施蒂纳为此所作的许多烦琐的三段式推论中,他到发现了什么呢?据说,他发现了人的本质是利己主义,按照底他的说法,古代人是唯实主义的利己主义者,中世纪的人是唯心主义的利己主义者,近代人才是两者统一的真正的利己主义者。历史应该向什么方向过渡呢?在施蒂纳看来,应该向无政府主义过渡。他把这种无政府主义称为“人道自由主义”。其实这种想象中的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不敢面向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施蒂纳还认为,资本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对于利己主义的我来说,都是不完善的存在方式。正如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把国家看得高于我之上,只有在“人道自由主义”中才抛弃了一切高于我之上的幻想(观念),直截了当地宣布:“我于是将世界作为我心目中的世界来把握,作为我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2页。

的世界、我的所有物来把握。”^①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说：“他把世界当作自己关于世界的观念来把握，而作为他的观念的世界，是他的想象的所有物、他的观念的所有物、他的作为所有物的观念、他的作为观念的所有物、他自身所有的观念或他的关于所有物的观念。他把所有这一切表达为一句无与伦比的话：‘我把一切都归于我。’”^②

据施蒂纳说，人类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还表现在人种之间的关系上：黑人是儿童时代的代表，蒙古人是青年时代的代表，被施蒂纳视为欧洲人种最优秀代表的高加索人，则是成人的化身，即真正利己主义的化身。

施蒂纳捏造历史，宣扬唯我主义，鼓吹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组织和纪律，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套谬论无疑都是反动的。

总之，施蒂纳和鲍威尔一样，他们的批判都是“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企图吹嘘自己是使世界免除一切灾难的绝对救世主。”^③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施蒂纳的无知可说是不可救药的。这表现在“他对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他认为历史过程只不过是‘骑士’、盗贼和怪影的历史，他当然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幻觉而得救。”^④ “这种无知使他仅满足于‘浏览’历史（即走马看花式地阅读黑格尔所用的历史材料），而不愿费功夫去‘知道’许多‘事物’。”^⑤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一文中说：“鲍威尔和施蒂纳是德国抽象哲学的最终结论的代表人物，因而也是在

^{①②③④⑤}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7、127、21、45、190页。

哲学上反对社会主义或者宁可说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头等重要的人物”。^①

第四节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

十九世纪40年代的德国，是一个以手工劳动为主体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国家，存在着一个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仅摧毁着德国的封建制度，而且摧毁着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业。“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代表濒于灭亡的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潮。从1844年起，它象瘟疫一样很快地在德国流行起来，在德国工人中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并通过格律恩传入了国际性的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阻碍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真正的社会主义”看做是危险的敌人，同它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发源地是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省，主要代表有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政论家赫斯(1812—1875)、格律恩(1817—1887)、吕宁(1818—1868)，记者克利盖(1820—1850)，激进的诗人和记者皮特曼(1811—1894)，作家泽米希(1820—1897)。1844年9月，赫斯和格律恩、皮特曼等在科伦建立了一个名叫共产主义的俱乐部，开始系统地宣传他们的观点。这些人自命为共产主义者，并把自己的学说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德国的社会主义”。他们还拥有许多刊物，主要的有赫斯主编的《社会明镜》，吕宁主编的《威斯特伐

^①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0页。

利亚汽船》，皮特曼主编的《莱茵社会改革年鉴》，克利盖主编的《人民论坛报》以及实际上由格律恩掌握的《特利尔日报》等等。

在格律恩、赫斯等人看来，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粗俗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还没有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于是他们就以“德国科学”的代表者的姿态出现，把英、法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抓过来，把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塞进去，创造了他们标榜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又害怕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并且竭力攻击共产主义学说的所谓“粗暴”和“片面性”，大肆宣扬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企图用超阶级的和平，博爱代替革命和阶级斗争。泽米希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一文中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①他们通过自己的报刊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并在国际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中传播这种谬论，妄图把工人运动引上邪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就开始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1845年年底写的《〈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等文章中，以及马克思在1846年1月18日给《特利尔日报》编辑部寄去的一封声明信中，初次公开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系统地分析了它的主要代表的作品，揭露了他们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革命斗争、为封建专制制度效劳的反动本质。1846年5

^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0页。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起草了《反克利盖的通告》，批判了克利盖把共产主义学说变成了关于“爱”的呓语，变成了玩弄华美词藻的无聊把戏。1846年8月，恩格斯还受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亲自去巴黎，同当时控制正义者同盟巴黎各组织的格律恩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847年初，恩格斯又写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这一冒牌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各个支派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后来，他们又在《共产党宣言》中专门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是他们进行理论斗争、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其二是被他们歪曲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①然而，他们完全不理解这些思想，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这些思想的纯粹文献上的联系甚至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这类文献的错误了解。本来这些共产主义体系以及批判性和论战性的共产主义著作不过是英、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现实运动的表现，而他们却把这些体系和著作同这一现实运动割裂开来，然后，又非常任意地把它们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就必然歪曲了英、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献，比如，它把具体的一定的个人间的关系变成了“人”的关系；代表一定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6页。

阶级利益的学说，变成了维护一切“人”的利益的理性和真理的表现；现实的历史，变成了人的思想的历史。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人的精神太空……和德国人的心灵太空中的变形而已。”^①

由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硬搬到德国来的时候，不可能把法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条件也搬到德国来，因此，法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在德国就失去了直接的实践意义。在法国，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对当时法国政治制度的攻击，肯定是革命的行动；而当时的德国呢，情况完全不同，德国当时的资产阶级不仅不是统治者，而且是现存各邦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对德国各邦封建专制政府来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他们的工具，他们正好利用它去反对资产阶级革命以维护封建统治。

例如，“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泽米希说：“你们……这些无产者……要当心呀！这个自由资产阶级曾经把你们煽动起来，唆使你们进行暴乱（请回想一下1830年吧！）。不要支持它的意图和斗争……让它单独去斗争吧。它的一切打算……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然而首先是永远不要参加政治革命，因为这种革命常常是心怀不满的少数人发动的，他们贪图权力，企图推翻现存政权，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②恩格斯尖锐地揭露了泽米希的封建保皇派的面目，指出：泽米希“具有领受萨克森王国政府的感谢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6—537页。

^②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61页。

最合法的权利，王国政府至少会授予他芸香枝的花冠（萨克森的最高勋章——编者注）以资奖励。如果让德国无产阶级听从他的这一忠告，那末萨克森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官僚主义的典型国家就可以长久安如磐石了。”^①因此，恩格斯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②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来源及其反动本质的同时，还强调指出，他们自己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同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胡说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一科学理论又恰恰是在彻底批判并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过程中创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并非把英国、法国的共产主义文献搬到德国来，而是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用新的世界观，对这些文献以至整个人类先进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改造，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自认为他们把法国的共产主义文献搬到德国来，并和他们的哲学良心调和起来，就创立了唯一正确的“德国科学”，还硬说他们负有使命要向世界揭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揭示绝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外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并不是一定的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纯粹是些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完全象他们所设想的德国哲学体系的产生一样，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即使这些著作是在宣传某些体系，它们仍然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是以一定国家里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61—662页。

^②恩格斯：《法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页。

的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总和为基础的。”^①

接着，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以“德国科学”代表者自居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乃是伪科学。他们说：“‘真正的社会主义’硬要人们相信，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其实，它本身首先就是某种神秘的科学；它的理论著作只是对那些熟知‘思维着的精神’的秘密的人才存在的。”^②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集中到一点，只不过是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人类之爱来代替共产主义。它是以宣扬超阶级的抽象的人为中心的、以调和阶级矛盾的泛爱说教为主要特征的反动理论。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础。恩格斯说：“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象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把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即美文学的和对于爱的过度崇拜——编者注）当做自己的出发点的。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③这种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当然是冒牌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论著和书信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谬论作了详尽、透彻的驳斥，并且通过这一斗争，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等重要思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846年8月，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7、535页。

^③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14页。

恩格斯在巴黎同格律恩的论战，痛斥了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上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庸人之见。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相反，他把共产主义的宗旨规定为：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①恩格斯提出的这三条原则，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界限。这些原则，后来在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论证。从此，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基本的内容已经确立起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只能“在小资产者中间寻找自己的群众，而在那些萎靡和堕落的著作家中寻找这些群众的代表。”^②1848年欧洲革命的风暴，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卷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第五节 系统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是一部批判性的著作，它还第一次系统地正面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后来说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③尽管他们当时尚未具备丰富的经济史方面的知识，因而在书中叙述的细节方面还有不够精确之处，在术语的使用上也未尽统一，但是，整个说

①《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8页。

③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页。

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已经完整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了人类历史的一般进程之后，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作了如下的概括：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①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还将两种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唯心主义历史观鲜明地对立起来。他们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因此，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历史并不是象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所说的那样“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就遇到有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3页。

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 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可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如鲍威尔和施蒂纳之类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反抗旧社会的革命群众，尽管这种革命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然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联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唯心主义历史观对立的基础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论述：

一、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的斗争中，进一步阐明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们将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一般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证明社会物质生活是第一性的，而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提出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①这里的“生活”一词，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则用更科学的概念“社会存在”加以代替，在那里，上述原理就被表述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简单地把一般唯物主义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去的结果，而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深入地进行探讨的成果。

对于社会存在，它的特点和发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长时间的精确的研究和分析。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曾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在当时，这一思想还未得到论证，还多少有些抽象。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思想得到了完整的发展，并得到系统的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①这种实际生活过程，就表现在：1.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3.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长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以上三个方面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因素。不应当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做是三个不同的阶段。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起，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这样，社会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劳动）和人本身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它完全不需要似乎还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存在。”^①

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通过以上论述，论证和制定了“社会存在”这一科学概念。他们把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当作基本的始初的关系，并认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指出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它的形式，这样就把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从社会历史中排除出去了。

只有在阐明了社会存在的实质及其变化的客观规律之后，我们才能说明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都把社会意识看做是脱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例如，费尔巴哈离开社会实践，企图用人本主义的观点来说明人们的意识，即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人类大脑的生理活动。他在《反对身体和灵魂、肉体 and 精神的二元论》一文中写道：“人脑和猿脑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是人与猿的头盖和颜面该有多么不同！猿所缺乏的根本不是思维的内部诸条件，不是脑；它所缺乏的只是思维的适当的外部关系。只归咎于颜面角偏斜，位置配置不利，所以它的脑没发展为思维器官。……猿因为脑的位置不对，所以不能思维；位置起决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页。

定作用；而位置是某种外在的、空间的东西。”^①这清楚地表明费尔巴哈把意识完全看做是一种单纯的生理现象。

他在因摩莱肖特的《关于食物的学说。通俗的叙述》一书出版而写的《自然科学和革命》一文中，甚至说过“人的食物是他的气质和思维形象的基础”这样的话。照此说来，第一，皇宫中的人和茅屋中的人，由于食物不同而影响他们的脑的结构，因而各自的想法就不同；第二是由于这两种人生活的外在环境不同，茅屋中的人住房狭窄，天棚低矮，妨碍了他的思考能力，而身居宫殿的王公贵族，住屋宽敞高大，从而有可能驰骋他的想象。这种说法，错误地把外在的居住条件当做决定人的思维的因素，这就必然得出剥削者比起劳动群众来更聪颖的荒谬结论。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费尔巴哈的错误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②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与存在的相互关系，对于意识依赖社会生活的发展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他们指出，意识，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意识从一开始就是和物质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

^①费尔巴哈：《反对身体和灵魂，肉体 and 精神的二元论》，《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05—20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页。

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还研究了意识的发展。他们认为，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即自然宗教。

自然宗教反映了人们和自然界的狭隘关系。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个人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

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的、或部落的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同对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不想象某种真实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意识发展到这一步，它开始具有相对独立性，似乎可以根据它自身的规律发展着，但归根到底，意识的发展始终是为社会状况所制约的。“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末，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①在分工存在的条件下，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

在由于分工的发展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之后，意识就总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中，个人总是在阶级对立中存在和发展的，个人的生活条件必然要取决于一定的阶级条件，而阶级对个人来说则是独立的。一定的阶级地位，决定个人的生活状况和命运。同一阶级成员具有同样的生活条件，获得同样的利益，因而也就产生了同样的生活习惯和社会意识。

但是，在每一个时代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越出本阶级的范围而成为统治思想。哪一个阶级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占统治地位，它在精神生产，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占居着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页。

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①可见，在阶级社会中，意识总是具有阶级性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道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随着无产阶级的产生，必然要产生共产主义的意识。他们说：与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必然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能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②

意识和存在的分离也是这样，它不仅有着阶级根源，同时也是人们社会关系独立化的结果。由于分工和交换的发展而自发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关系，表现出它是与人相独立的东西。人们把反映这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53、77—78页。

些关系的意识当做不依赖于人，而且统治着人们头脑的独立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说：“把统治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而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①黑格尔、鲍威尔、施蒂纳之流的唯心主义哲学就是这样做的。

马克思、恩格斯还揭露出唯心主义哲学家为了证明精神的最高统治，一般都采用了三个手法：第一，把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和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第二，把这些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统治思想置于某种秩序之中，证明在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从而把这些思想看做是“概念的自我规定”。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的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进一步变成“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思想家，而这些人又被规定为历史的创造者。正是采用了这些手法，唯心主义哲学家“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于是就可以放心地解开缰绳，让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②

综上所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全面而彻底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从而奠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坚实基础。正如恩格斯在后来所说的：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56页。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①

二、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

在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时，马克思、恩格斯公开承认，他们自觉地以一定的并非独断的、思辨的，而是现实的、实际的前提为出发点。

以往的唯物主义者形而上学地把自然界看成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这种不彻底性，指出在现存的社会中，物质环境本身乃是人们历史活动的产物，揭示了人们赖以生活和活动的自然条件本身的历史性。同时，他们肯定一定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的物质条件，人们的身体组织、肉体组织制约着他们对外部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但是，这两个历史前提并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对象。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观察作为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的人们的活动上。这种活动有两个方面：生产（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人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和交往（人们的相互关

^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7页。

系，首先是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和交往互相制约，但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生产是决定性的因素。

正是从这种前提出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比较全面地发展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原理，而且向前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在这部著作中，他们第一次从本质上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生产，就必然发生双重关系，即人对自然的关系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前者构成社会生产力，后者构成生产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使用“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但用得较少，主要是用以表示直接生产活动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未推广到人们对生产资料和产品以及在交换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经济关系。在这部书里，他们更多地是用“交往”、“交往关系”（又称“交往方式”，也有译作“交通关系”）等概念来表述生产关系。“交往”（Verkehr）这一术语的含义很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阶级、民族、国家的一切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交往”这一术语包括生产关系，此外也包括由生产关系产生的其他关系，它的基本内容就是指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存在的物质关系。为了表示这些关系所代表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所规定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也使用“交往形式”这一术语，以此表示“基础”这一概念，它同“市民社会”是同一序列的概念。

“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的制定是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够科学地制定，是由于发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起，就把私有制及其形式作为批判研究的中心课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讨了私有制的起源，但未成功。后来在《神圣家族》中虽然接触到了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但由于仍然没有发现它和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这一概念本身也未得到科学的说明。只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形成了标志生产关系的独立范畴，这就是交往关系或交往形式。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基本内容已经被较为清楚地描述出来了，但仍具有某种程度的不成熟性。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成熟的著作中，“生产力”这一概念包括：1. 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2. 具有一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并运用自己的体力和脑力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然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般是指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只是在很少的场合同时也谈到人。

那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指出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他们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①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决定因素，它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着生产方式的变更和人类历史的发展。

但是，生产又是以一定的生产关系为前提的。这就是说，生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34页。

产是和动物简单地向自然界索取食物不一样的，不可能是孤立的个人活动，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着人们的集体的活动，当然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社会关系，又是为一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所要求和决定的。一定的生产力就会要求一定的生产关系。所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也就产生了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相应的变化，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发展。

既然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因此，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具有历史性。凡是一切对于后世说来是过时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也都曾经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因而在其产生之初，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来说，是合理的和保证他们的个性发展的条件。实质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①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生矛盾、发生冲突之前，个人之间进行交往的条件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它们是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只能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这样，在上述矛盾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的。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条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观点也强加给过去的时代。只是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突破了自身原有的局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0页。

限性，这时他们才发觉这些条件已变成束缚他们的桎梏，并决定采取行动来打破这种桎梏。

这样，就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任何一种交往形式，“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①

从上面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社会关系的类型即交往形式，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同现存的交往形式发生矛盾，通过社会革命，一种新的、更高类型的交往形式将取代已经变成生产力桎梏的原先的交往形式。以后，这种新的交往形式又不再适合发展着的生产力而变成它的桎梏，并为另一种更进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这样，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依次更替的各阶段之间形成一种承续性的联系。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页。

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①

这一发现，对于弄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头等意义。我们知道，在此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已揭示了经济关系对政治、法律等关系的决定作用，而现在又进一步确定了什么东西决定经济本身，从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更深刻的基础。这就是说，归根到底，生产力决定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社会的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过渡。如果说，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么，现在则揭示了这个基础本身发展的内在机制。这样一来，社会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之间的依赖关系就被说明了。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发展以及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这一矛盾的规律的发现，为科学地认识整个历史和科学地划分历史时期提供了钥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其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外部表现，分工的每一个阶段决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他们根据这一新的认识，描绘了人类社会从产生直到必将向未来共产主义过渡的轮廓。

在对资产阶级私有制形式发展的前期历史和主要阶段的考察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出现了商业和生产的分离。商人作为特殊的阶级促进了产品的广泛交流，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广泛发展的商品交流必然要求冲破闭关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3—84页。

封建关系，创立新的社会关系。现在工商业资本并吞了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产阶级，这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考察了从行会制度到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的过渡。在这里，第一次划分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两个主要阶段：工场手工业时期和大工业时期。这里，已经包含了后来《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思想。

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它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因为资本主义第一次造成了巨大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说来，私人〔所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制度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①所以，要使生产力得到全面的发展，使它真正造福于广大群众，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公有制。

同以往的批判私有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指出了私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上存在的必然性以及私有制行将消灭的不可避免性。《德意志意识形态》则证明，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私有制消灭的必然性才显露出来，并且为它的消灭创造了物质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创造了两个基本物质前提：第一是生产的高度发展水平，这同私有制是根本不相容的，但对于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来说是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8页。

必需的。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真正的解放不可能是别的，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并通过现实的手段加以实现。没有蒸汽机、珍妮机—走锭精纺机，奴隶制就不能废除；没有改良的农业，农奴制就不能废除；只要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量和数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①第二，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这导致革命阶级的形成。这个原理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概括地叙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他们不象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描绘共产主义制度的详细结构，只是阐述了当时根据对现实的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所能预见到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他们强调说：“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②这将是一个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财产应当受联合起来的个人即整个社会支配的社会。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将消失，从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的工具的国家也将消失。阶级的分工将完全消灭，因此城乡的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将消灭，人们也不会终身束缚在这种或那种职业上，人们的个人活动不再作为某种异己的力量同他们相对抗。劳动由外部强制的活动变为自由人的真正的自主活动。社会将变成人们的真正的联合体，变成人们的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统一体。人们在联合起来之后，使社会生活条件受自己权力的支配。

①这段文字是1962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院公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新发现的一段文字。1966年，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新版俄文单行本收入。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4辑，第14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9页。

他们自己控制并自觉地组织他们的共同活动；他们调节生产并使整个社会的发展服从自己的总规划。在改造人们活动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改变人们自身，包括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制定了社会经济基础的概念，不过他们在运用这一概念时，仍沿用了过去的术语，即“市民社会”。

他们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①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②

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曾对国家形式和法权关系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初步看法。但是在那时，马克思还没有对市民社会本身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解剖。1843年底，马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41、41页。

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经过一段时期研究，他制定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科学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济基础”被规定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组织，包括整个工业和商业的活动与机构。这一表述是同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定义相一致的。

在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论述了经济基础对国家和法等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认为国家和法等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他们写到：“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①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①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国家和法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实质作了透彻鲜明的分析。他们还特别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和资产阶级私有制相适应的。

法同国家政权一样，也是所有制关系的表现。资产阶级法学家以为法权关系不是资本的权力表现，而是“普遍意志”的产物。他们把资产阶级所有权解释为纯粹的意志关系，即对物的任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7—378页。

意支配的权利。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说：“这种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幻想，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享有对某物的占有权，但实际上并没有占有某物。”^①

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们说：“因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现实基础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剥削阶级的“个人的统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必然要表现为一种“一般的权力”。问题在于，各个统治者的个人生活条件，同时又是作为整个统治阶级的共同生活条件而发展起来的，他们作为统治者，为了维护这些条件，必然要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并把个人的统治和权力变成一般的统治和权力。

既然剥削阶级必然要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既然国家政权是剥削阶级的生存条件和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那末，“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象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③

经济变革必然导致政治和观念等等的变革。但是，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和观念等上层建筑的发展，往往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2、70—71、38页。

展,因而新的基础和旧的上层建筑之间必然要发生对抗,这种对抗也只有经过革命才能消除。“较早时期的利益,在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已经为适应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所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表现为与个人隔离的虚幻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这种权力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打倒。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某些带有较大的概括性的问题上,意识有时似乎超过了当代的经验关系,因此人们在后来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指望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①后面这句话的意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作了更加明白的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还十分明确地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也处于不断的矛盾运动之中,而这种矛盾,也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他们说:“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末,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主生产力发生了矛盾。”^②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和法的存在,不以统治阶级意志为转移,它们是从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不过是以统治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因此,国家和法的消灭也必然以生产方式的改变为前提。“例如,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末,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③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已经十分明确地阐明了人类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36、378页。

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给予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一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

三、关于阶级、国家与社会革命诸问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阶级、国家与社会革命诸问题，并且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这一革命同以往革命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阶级时，认为阶级的产生、划分以及各阶级的状况，都是由生产决定的，由于生产水平不高，生产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因而形成了不同的阶级。他们说：由于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①

阶级是由分工划分出来的。由于分工使人们与劳动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不同，从而把人们分成不同的阶级。同时，“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一方面制约着不同社会阶级的分配和彼此的界限，同时它们在自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后者的制约。”^②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7、49页。

马克思、恩格斯还揭示了阶级社会中阶级存在的客观性，指出阶级的存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阶级对个人是独立的，个人屈从于阶级，阶级决定其成员的生活状况、思想和命运。同时还指出，阶级的存在不仅把被压迫阶级排斥于发展之外，而且也使统治阶级的智力及其发展范围受到局限。

他们还认为，社会分裂为阶级只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因而它不是永恒的，在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至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而必然要消灭时，阶级就会消灭，大工业就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表明，当时他们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都有了科学的认识。列宁说：“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①这个主要之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完成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探讨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问题。关于国家的起源和实质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他们指出，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阶级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这种阶级对立，就构成国家的现实基础。私有制和对抗阶级的存在，被统治的阶级感到自己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矛盾的，统治阶级则力图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的利益。于是国家就以公共的全社会利益的代表的身分出现了。“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

^①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7页。

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①

但是，在阶级社会里，国家始终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它所代表的利益始终只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国家不能解决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因为它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这样，一个要想取得统治的阶级，一定要首先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想夺得政权的剥削阶级，开始总是以整个社会代表的姿态出现，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在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里，这个阶级在颇大的程度上同其他的非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在这个阶级获得政权以后，它对社会上其他的非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敌视才充分显露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国家只是在表面上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而实质上，它是为了一定阶级的利益而实行强制。比如，资产阶级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可见“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②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国家中的统治意志。但是，“实际上，不是国家由于统治意志而存在，相反地，是从个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中所产生的国家同时具有统治意志的形式。”^③不是由于统治者的意志，不是由于暴力，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38、70、379页。

不是对政权的篡夺而构成国家的性质；而是由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某一阶级，即一定阶级而不是任何其他阶级的统治，这才是国家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说：“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互相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①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是很丰富的。他们不仅考察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具体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论证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这一革命同以往一切革命的根本区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着深刻分析。

首先，他们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的发展，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历史的必然。

其二，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不仅提供了共产主义的经济条件，而且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现代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7页。

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①

其三，“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②由于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和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要从无产阶级中产生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

其四，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同以往一切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1.它不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2.共产主义革命的形式是暴力革命，是武器的或物质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最后向我们指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象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③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论述，已经包含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主要之点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萌芽。后来，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④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表述了在革命实践中环境的改造和人们自身的改变是一致的思想。在《德意志意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8、53、38页。

^④《恩格斯致菲·范·派顿（1883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8页。

识形态》中强调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①

总起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是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个别观点,而是系统地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和基本原理,并且运用它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矛盾,得出了实质上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结论。在这里,唯物主义第一次被运用于认识社会现象,从而克服了所有以往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他们第一次提供了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完备的科学理解,并创立了研究历史的真正科学的方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完成的革命变革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页

第六章 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进一步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创立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于1847年7月发表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这部书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批成熟著作之一，正如马克思自己讲的：“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①

第一节 批判蒲鲁东主义，为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

一、《哲学的贫困》的写作和发表，直接的动因是为了回答蒲鲁东的公开挑战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840年，他因发表第一部理论著作《什么是财产？》而颇著声名。马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页。

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蒲鲁东的上述著作曾加以肯定，同时指出了它的小资产阶级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旅居巴黎时，曾同蒲鲁东有过交往，对他做过争取工作，希望他能改变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逐步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战士。1846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年5月5日，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建议他担任该委员会驻巴黎的通讯员，希望通过他来建立与法国工运的联系。

但是，蒲鲁东却顽固地坚持他原来的改良主义立场，死抱住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不放。他在同年5月17日从里昂发出的给马克思的回信中，鼓吹为了取得胜利，根本“就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而“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①，宣称在他即将发表的《贫困的哲学》这部著作中，将详细地论述关于如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和方法。

蒲鲁东设想的改革社会的方案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什么呢？他在上述回信中是这样讲的：“我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换句话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使财产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以便产生您们——德国社会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而我在目下只称之为自由、平等的那种东西。”^②

蒲鲁东在回信中，虽然也装模作样地表示过：“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但是，他不仅以思想先驱者的口吻教训马克思“不必用制造新的思想混乱来给人类增添新的麻烦；我们应该给

①②转引自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译本序言，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页。

世界树立一个明智的和眼光远大的宽容精神的榜样”，而且以法国工人阶级的当然代表自居，说什么“法国工人阶级的意愿显然是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的”。蒲鲁东还露骨地威胁马克思，扬言：“我国的无产者对知识的渴望是这样地强烈，倘若有谁除了血以外不能给他们别的饮料，那他们就会对他老实不客气。”^①

显然，这决不是一封普通的回信，而是公开的挑战书。蒲鲁东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就在这封回信后的几个星期，蒲鲁东出版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并请“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格律恩帮他把《贫困的哲学》翻译成德文出版；同时，还在工人群众中散发他们关于改革社会的“和平药方”。

为了回击蒲鲁东的公开挑战，1846年8月间，恩格斯受马克思的委托，亲自去巴黎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以便向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宣传共产主义，并同蒲鲁东、格律恩等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恩格斯的努力，1846年10月下旬，在“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蒲鲁东、格律恩关于改革社会的“和平药方”，确认恩格斯提出的论点，工人运动的目的是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暴力革命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唯一途径和手段。

马克思从恩格斯1846年9月16日、9月18日、10月23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以及给他本人的信中，得知了恩格斯在巴黎同那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斗争的第一手资料。1846年12月下旬，马克思从书商那里刚拿到《贫困的哲学》的文本，就立即着手进行批判。

^①转引自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57页。

由于俄国文学家巴·瓦·安年柯夫曾写信问过马克思对于蒲鲁东这部著作的意见,马克思在同年12月28日给他的回信中,提纲挈领地概述了对《贫困的哲学》的原则性批评意见。这封信实质上也就是马克思著述《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纲要。安年柯夫1847年1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您对蒲鲁东著作的意见,以其正确无误、清晰明白,而主要是立足于现实的意向,对我起了真正振奋精神的作用。”^①由于蒲鲁东不懂德文,为了更好地同蒲鲁东作斗争,以肃清蒲鲁东主义在法国工人群众中的影响,马克思是用法文写作《哲学的贫困》的。它不只在理论和方法上同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全面对立,而且在标题上也是针锋相对的。恩格斯在回顾写作和发表《哲学的贫困》的背景时指出:自从马克思和蒲鲁东“两人在巴黎常常终夜争论经济问题以来,他们的道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鲁东的著作证明,两人之间现在已经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置之不理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也就确认了这个不可弥合的裂口。”^②

二、《哲学的贫困》的写作和发表,主要是为 了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蒲鲁东的种种活动以及《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抛出,决不是什么孤立和偶然的事件,而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顽强的自我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东的分歧,也就是两种立场和世界观之间的根本对立。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和革命的俄国》俄文版,第147页。

②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5页。

各种矛盾日渐暴露，日趋激化。怎样看待这些矛盾？如何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是社会发展进程本身已经提出来的重大课题，客观上要求人们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作出明确的回答。是掩盖矛盾、粉饰太平，还是正视现实、无情揭露？是闭门造车，从自己头脑中冥思苦索改革社会的方案？还是面向现实，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中探索无产阶级自求解放的道路？由于人们的立场和世界观不同，决定他们必然采取不同的态度，由此而提出不同的纲领，创立不同的学派，表现为不同的社会思潮。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而论，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过程，但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促使他们把支配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规律，看作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永恒的自然规律，为资本主义的万世长存进行了论证。而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派别，虽然无情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黑暗，可是，由于他们跳不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框框，摆不脱抽象人性论的束缚，而总是从“自由”、“平等”、“博爱”的教义中来探求工人群众摆脱贫困的途径，因而他们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这也就是说，尽管他们在改革社会的具体主张上千差万别，而从世界观上来看，共同的特点都是不懂得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基础。

蒲鲁东设想的改革社会的“和平药方”，就是这种世界观的一个典型产物。他要无产者积蓄小额的股份，用这些钱首先在一种或几种行业里设立一个或几个作坊，让一部分股东在那里工作，产品一部分以原料加劳动的价格卖给股东，这样就可以不付给他们利润，其余的产品则按照市场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作坊（股份公司）的资本，一旦因新加入者的股金或老股东的新储金

而增加起来，这笔资本又可以用来设立新的作坊和工厂。据说如此循环往复地继续下去，最终将保证所有的无产者都有工作可做，所有的生产力都被收买过来，从而使资产者手中的资本失去支配劳动和获取利润的权力，资本也就由此而被“废除”了。这真是异想天开的绝妙主张——“能够凭空弄到钱，使所有工人早日进入地上天堂。”^①蒲鲁东的这种社会主义，即企图通过生产者之间直接的产品公平交换，以建立人人都自由、平等的社会，“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生产者保留下来”^②。这种改善资本主义的方案纯粹是一种空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有如用月亮的银光铸造法郎一样，是根本不能实现的。

《贫困的哲学》的炮制和抛出，标志着蒲鲁东从理论上更加系统地宣扬改良主义。他力图对自己设想的改革社会的“和平药方”，从经济学上加以说明，从哲学上加以论证。其实，蒲鲁东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肤浅，有时甚至是幼稚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从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不从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认识中引导出科学。蒲鲁东“还错误地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的解释看成一种新科学的基础。”^③他幻想通过自由生产者之间的产品的公平交换，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他自以为这样既批判了资产阶级

①②《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9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8页。

③马克思：《论蒲鲁东（给施韦泽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2页。

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其实，他根本没有摆脱这两者的理论错误和阶级局限。他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沿袭了关于资本主义“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继承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错觉（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 ”^① 不仅如此，蒲鲁东还远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②

蒲鲁东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蒲鲁东的全部理论，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矛盾和幻想，企图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来寻找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办法。显而易见，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这种“社会主义”，势必模糊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只能把工人运动引到邪路上去。

要把无产阶级引导到自求解放的康庄大道，必须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而为了确立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个突破口，唯物史观则是关键所在。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③，要探索和把握资本主

①②马克思：《论蒲鲁东（给施韦泽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2、32—33页。

③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4页。

义制度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一点也离不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考察，离不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经济规律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①要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又必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理论指南。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从经济上深刻地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彻底地揭露当时流行的种种“社会主义”的空想性，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这个历史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完成的。恩格斯后来回顾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而这种“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②《哲学的贫困》的写作和发表，正是为了把社会主义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在1845年以前，由于当时马克思还没有彻底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使得他在研究中未能足够地估价和充分利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在规律上的积极成果。1844年，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当时思想流派的评述还没有能摆脱人本主义观点的影响。他认为，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只是“例外地维护经济关系上的合乎人性的外观，但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恰恰是从这些关系同人性显然有区别的方面，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来把握这些关系的。”^③马克思对蒲鲁东则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只有“蒲鲁东永远结束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他认真地对待经济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并把它和经济关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4页。

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5—52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系的违反人性的现实尖锐地对立起来”，赞扬“蒲鲁东不同于其余的经济学家，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彻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①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起，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评价开始有了根本的改变。进一步的研究，使马克思愈来愈意识到人本主义立场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上的软弱无力，认识到“在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提出了一种思想：主要的剥削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由整个生产决定的，单独的个人都面临着这些关系。”^②正因为政治经济学严格地从经济意义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因而有可能在古典经济学家发现的基础上，探索资本主义制度以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超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发现——唯物史观的确立，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1845年春，当恩格斯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马克思已经用十分明晰的语句向恩格斯叙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到1846年夏天，“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③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出版，使马克思“有机会发挥这些基本点，以同这个从那时起就要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居于最重要地位的人的见解对立。”^④

1844年以后，导致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的一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3页。

③④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5页。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当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批判地改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成果,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的时候,蒲鲁东却企图使政治经济学更加唯心主义化。所以,马克思对于蒲鲁东歪曲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推销那套“公平交换”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货色,必然由衷的反感。马克思看到《贫困的哲学》后,敏锐地察觉到“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①马克思决心彻底批判它:“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②这就是马克思写作和发表《哲学的贫困》的主旨。

三、《哲学的贫困》的写作和发表,还在于使工人运动摆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只有为广大工人群众所掌握,才能使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为了实现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加速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化,必须不断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工人群众的影响。

蒲鲁东宣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当时和以后一个时期,在社会上是很有影响的。这首先是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人们把他

^①《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6页。

^②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8页。

看作是从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农民阶级出身的几乎唯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蒲鲁东出身于法国贝桑松一个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父亲是一个箍桶匠，也曾经在家酿造过啤酒，母亲也是农民家庭出身。由于家境困苦，蒲鲁东在少年时代就辍学而独立谋生，当过学徒、旅馆的雇工，做过排字工人和校对员，和友人合伙办过一个小规模的印刷所。正是从所承校的书籍中，他学到了非常庞杂的知识，特别是神学知识。1837年，蒲鲁东写了《普通语法试论》一书，他因此而获得了贝桑松大学一笔为期三年每年五百法郎的助学金。靠了这笔助学金，他迁居到巴黎，并在那里开始他的理论著述和宣传鼓动活动。

1840年，蒲鲁东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理论著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虽然，“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由于这本书的大胆风格，“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特别是由于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著名论断，而极大地激动了读者，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①蒲鲁东也由此而名噪一时，获得了很大声誉。

随着《贫困的哲学》的发表，蒲鲁东更是身价百倍。他把对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平均主义应用”，当做自己在经济科学上的“伟大发现”；他借用歪曲了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由此而造成极大的假象：在法国，

^①马克思：《论蒲鲁东（给施韦泽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页。

他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他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而当时理论界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还同时把蒲鲁东当做极端的革命者加以诅咒。其实，“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①马克思从来没有同意过那种认为蒲鲁东后来“背叛”了革命的说法，因为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蒲鲁东主义之所以获得相当多的人的拥护，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蒲鲁东的理论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心理和愿望，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要求。在那些由破产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小作坊主沦为无产者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主张必然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反响。恩格斯在讲到蒲鲁东主义在法、德工人和“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中的影响时指出，不少工人真诚地信奉蒲鲁东关于改革社会的“和平药方”，“他们口袋里连晚上在酒铺聚会时喝酒用的六个苏都没有，却想用他们的储金来购买整整一个美丽的法国！”^②

蒲鲁东心目中的“上帝”，就是那些耕种小块土地的农民和那些进行小规模生产的个体手工业者。蒲鲁东主义的全部要旨，就是要求保存和巩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这也正是蒲鲁东分析、研究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最后归宿。在《什么是财产？》中，他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论断；并明显地表现出二重性的思想，他公开宣称：“共产主义和私有制所希求的东西是好的，但两者所招致的东西都

①《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7—488页。

②《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9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页。

是坏的”，“共产主义否认独立和比例性，私有制则不适合于平等和法律的要求。”^①但是，蒲鲁东并不一概否定私有财产本身，而只是反对那种以特权和垄断为靠山的对于财产的滥用。在他看来，个人占有是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私有制杀害生命，这已由五千年来私有制的存在所证明了；占有符合公理，私有制违背公理。他认为，消灭私有制和保存占有，只要单单靠这一原则上的改变，你就根本改变了法律、政治、经济和一切制度，你就消灭了人间的一切罪恶。

蒲鲁东“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②他深信，有一种以互助交换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存在；只要不受国家权力和垄断制度的干扰，这种自然经济就能保证社会每个成员的利益得到平衡。他期望仍旧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家庭作为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在他看来，社会，就是这种家庭的组合；家庭，则是家长（父亲）领导下的父权集体。按照自然法则，每个家庭都会“自谋其利”；同时，家庭之间又会“休戚相关”，它们之间的分歧能够充分协调起来，从而把所有的家庭有机地维系在一个共同社会之中。

蒲鲁东认为，在资本主义垄断下，分工、竞争使劳动者备受打击，每况愈下。但是，在个体生产和自由交换的制度下，劳动分工将为人人创造丰富的产品，而无需资本主义那种违反人性的再分工；同样，在个体生产和自由交换的制度下，竞争也会变成一件好事，因为这时竞争是人人可以参加的，而不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仅仅限于那些垄断资本所有权和独占市场的少数

^①转引自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译本序言，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页。

^②《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7页。

人。他宣称，要使劳动产品得以公平地交换，并使个人自由得到保证，首要的措施就是推行“无息信贷”。他猛烈攻击以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断言金本位制使资本家得以垄断剥夺财富的手段；他认为只要确立以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就完全可以取消以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

蒲鲁东在经济方面的全部主张，集中到一点，就是这样一个公式：个人和家庭都应该按照公平交换的原则，获得劳动的全部果实。也就是说，个体生产者根据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进行的自由交换，是建设新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上，蒲鲁东大肆宣扬个人绝对自由的极端无政府主义，宣称个人只有从权威和社会身份中彻底解放出来，完全根据契约来处理自己的事情，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蒲鲁东看来，政治就是权力的集中，而这就始终意味着个人自由的相应损失。他攻击代议制政府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因为谁也不能真正代表别人，更何况群众根本不具备判断候选人好坏的能力。他也同样抨击公民投票的直接民主制，理由是这种民主制会使一个人或一小批人高居人民之上，从而直接导向专制统治。总之，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是错误的，它们的存在全都以剥夺人类平等为代价，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因此，必须废除“政府”。

在蒲鲁东看来，个体生产者之间的小规模协作虽然是需要的，但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必要的弊端而已。他认为，任何形式的“协作”，始终存在着限制家庭自主，削弱个人主动性，损害个人自由的危险。他断言：一个人除非是他身不由己或者是没有办法，否则他绝不会同他人合作。因此，蒲鲁东极力主张对协作的范围加以严格限制，只是为了有限的共同目标，才把那些过独

立家庭生活的人们加以联合，其目的则在于利用这种协作来加强个人的地位，而绝不能丝毫剥夺个人的自由。只有在个人充分自由的基础上，协作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使未来的社会组织成为人人都享有最充分自由和平等的单纯关系，保证人人都可以自由、平等地进行磋商，根本不会由于权力垄断或财富垄断而破坏协作和磋商的公平性。

蒲鲁东认为，遵照他的原则，实现他的纲领，那末，国家、政府或其他掌握强制权力的机构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个体生产者本人和他们根据生产需要而自愿建立起来的协作组织，完全可以自行办理有关的事务。因此，蒲鲁东在政治上大肆鼓吹个人极端自由的无政府主义。他说：“理想的共和国是一种绝对的无政府状态。它既不象在君主立宪政体下那样，是从属于秩序的自由，也不是受秩序严格控制的自由，而是一种摆脱了一切桎梏、迷信、偏见、诡辩、重利盘剥和权威的自由；它是一种相互性的自由，而不是一种受限制的自由；自由不是秩序的女儿而是秩序的母亲。”^①总之，蒲鲁东在理论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在实践中的面目，这就是蒲鲁东主义得以广泛流传的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

《贫困的哲学》，是“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②。蒲鲁东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资产阶级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

①转引自〔英〕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02页。

②马克思：《论蒲鲁东（给施韦泽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3页。

③《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8页。

决定了它的两重性，它“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它“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①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竞争和垄断的加剧，迫使大批小生产者日益破产，不断加入无产者的行列，成为产业工人的后备军，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一方面，它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小生产者保持着天然的联系，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中工农联盟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破了产的小生产者的大量涌入，又必然把小生产的思想意识、传统作风、习惯势力带进工人队伍，这就是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客观基础。改良主义是麻醉工人群众意识的鸦片烟。经过理论加工，被涂上经济学和哲学油彩的蒲鲁东主义，就更具欺骗性，对工人运动的危害也更大。因此，清除工人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把工人运动引导到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始终是一个不能回避、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而且必然经历反复的严重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断清除工人群众中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过程，也就是工人运动同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日益结合的过程。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情况更是这样。

马克思为了使工人群众摆脱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为了促进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尽快结合，即使对《贫困的哲学》的批判要付出他同蒲鲁东个人之间的“友谊永远结束”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①《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第二节 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进一步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一、剖析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蒲鲁东的哲学观点，是法学唯心主义和被歪曲了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大杂烩。他的整个历史观，是彻头彻尾反历史主义的。

蒲鲁东宣称：“平等是我们唯一的准绳，也是我们的理想。”^①在他看来，“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②平等观念代表着人类的真正本质，是至高无上的永恒理性原则，是建立新社会的真正基础。所谓历史，就是过去的各代人通过种种努力，把永恒的平等观念体现在各自的制度之中。由于历史发展的辩证性质，平等的原始意向反而招致了不平等的后果，这样就产生了平等和不平等的矛盾。而永恒理性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除不平等以实现平等。

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从而把社会看成理性的产物，把历史看成理性发展的历史，这种唯心史观，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在英、法等西欧国家，曾经风靡一时，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作为蒲鲁东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石的，也是这种唯心史观。蒲鲁东正是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人权关系中，提取他的平等观念和公平理想，又从这种基于抽象的平等观念和公平理想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设想他的改革社会的“和平药方”的。

①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9页。

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2页。

早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蒲鲁东就提出:“平等”作为永恒的理性原则,理所当然地应该作为构成财产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的财产关系中,存在的却是不平等而不是平等。可见,现存的财产关系和永恒的平等观念不相符合,是自相矛盾的。蒲鲁东由此宣称:“财产就是盗窃。”这个论断虽曾轰动一时,却并没有从经济关系上回答究竟什么是财产。所谓财产问题,实质上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财产关系,说到底,也就是生产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财产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①因此,要正确回答“什么是财产”,必须从生产关系入手,从历史发展中进行具体的考察,而决不能从它们的法律表现入手,孤立地、静止地作抽象议论。要批判地揭示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本质,“不能用咒骂来回答,而只能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②

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可是,他却撇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抓住“财产”、“盗窃”这些一般的法律概念大做文章,把经济学问题变成法学问题,清楚地表明在他那里事物是本末倒置的,不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决定法权关系,而是永恒的平等观念决定财产关系;表明他完全是用法学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

^{①②}马克思:《论蒲鲁东(给施韦泽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31页。

系时，……他就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①

《贫困的哲学》是《什么是财产？》一书的继续，也是蒲鲁东主义的完成。在这部著作中，蒲鲁东编造了一套“经济矛盾的体系”，企图对前一部著作提出的问题，从政治经济学上进行论证和说明。从现象上看，蒲鲁东从财产关系的法律表现转向经济方面，即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似乎是前进了。其实，蒲鲁东自以为在科学上完成的“伟大事业”，不过是借用被他歪曲了的黑格尔辩证法，把平等观念进一步理性和神圣化；用永恒的平等观念来篡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对它进行“空想主义的解释”和“平均主义的应用”。透过现象看实质，蒲鲁东还是在唯心史观中绕圈子。

研究政治经济学，当然离不开经济范畴，问题是如何看待、如何运用这些经济范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集中地暴露了蒲鲁东的唯心史观。蒲鲁东从经济学家那里知道了种种经济范畴，从黑格尔那里知道了范畴“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蒲鲁东的“伟大发现”就在于把永恒平等观念的幽灵强加给这些经济范畴，使它们成为永恒平等观念的化身，赋有实现平等和消除不平等的本质特性。蒲鲁东的“伟大发现”，还在于把这些作为永恒平等观念体现的经济范畴，纳入他主观臆造的序列之中，把社会发展的历史变成具有实现平等和消除不平等使命的经济范畴的逻辑推演过程。蒲鲁东宣称，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以后依次是“机器”、“竞争”、

^①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2页。

“垄断”、“国家税收”、“贸易平衡”、“信贷”、“所有制”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蒲鲁东“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①

为什么这些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的范畴，不幸又掉过头来反对平等呢？按照蒲鲁东的说法，这是因为每一个经济范畴都必然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性：既有肯定平等的好的一面，又有否定平等的坏的一面。每一个继之而来的范畴都是永恒平等观念为了消除前一个范畴所产生的不平等而创造出来的。所谓经济进化，就是“普遍理性”（或曰“社会天才”）不断地用新的范畴来克服前一个范畴的坏的一面，而保留其好的一面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蒲鲁东看来，上述种种经济范畴代表着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它们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来自一个，正如反题来自正题一样。在经济范畴的逻辑顺序中，逐步实现着永恒的平等观念。“社会天才将一直这样进行，直到它用尽自己的全部矛盾（……我料想，人类固有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时为止。”^②

在《贫困的哲学》这部著作的开头，蒲鲁东还郑重其事地宣称：“首先，我需要有关上帝的这个假设来树立社会科学的权威。”^③为了理解和把握他的“体系”，必须假设上帝的存在。他说：“要是没有这个假设，我的讨论将无法进行，也无法为人所了解。”^④

为什么蒲鲁东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

①《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2页。

②③④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1、21、1页。

思想家，不厌其烦地宣扬永恒的“普遍理性”、“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为什么蒲鲁东不惜乞灵于宗教神学和蒙昧主义，大谈特谈“上帝的存在”、“来自神的怀抱的秘密”？在《贫困的哲学》的序言里，他自己提供了一把解答这个问题的钥匙。蒲鲁东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看到了实现于历史中的进步，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社会发展似乎是和个人的发展彼此分离、甚至毫不相干，个人的行动尽管是自觉的，可是实际的结果却并不是预期的，也就是说，从行动的结果来看，人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蒲鲁东无法解释这些事实，因而断言：社会“不同于个人的地方主要在于行动的自发性”，社会“听从着热情的冲动，这种冲动，初看起来，一点也看不出是出于预先考虑和预先计划的；但是慢慢地，你会觉得它是受着一种最高意志的支配，这种意志，存在于社会之外，并用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把社会推向一个不可知的境界。”^①

正是由于蒲鲁东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编造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把历史发展归结于神秘的原因，把永恒的普遍理性当成历史的主宰，它在冥冥中驾驭社会的发展，支配人们的行动，而现实的人则不过是永恒的普遍理性为了自身发展而使用的工具。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社会的人。

可见，在《贫困的哲学》里，蒲鲁东费尽心机编造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无非是给他心爱的“平等观念”披上经济范畴的外装，用所谓的“辩证法”着意加以打扮，使之变成“原始的意

^①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页。

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①，把社会发展的历史变成经济范畴的逻辑推演过程，变成普遍理性不断消除不平等，以逐步实现永恒的平等观念的过程。

二、把社会发展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唯心史观的斗争中，进一步发挥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确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生产力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具有的决定作用，说明基于生产力一定发展水平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唯一基础，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在阶级社会里，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社会革命，使新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过时的生产方式成为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指出，历史决不是什么永恒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也不是经济范畴的逻辑推演，而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

首先，马克思在这里进一步论证了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明确地指出，生产力是人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人们总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活动的，他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生产力固然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2页。

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马克思说：“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①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内容作出了科学的规定。他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②这说明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包括劳动者即革命阶级本身，这也就科学地阐明了革命阶级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其次，马克思还揭示了社会机体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图景。由于生产是社会性的活动，而不是什么孤独的个人行为，所以，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必须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从事现实的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的物质生活问题。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这种生产关系，“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而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这种“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③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开始使用了“生产关系”这个统一的科学概念，而不是象先前那样用“交往关系”、“交往形式”等术语来表达生产关系的内容。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

①③《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

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页。

的整体。”^①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因此，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就决不是什么永恒理性或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基于生产力一定发展水平的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一切社会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有机整体。马克思说：“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②

社会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③

蒲鲁东其所以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除了搬弄永恒平等观念，法学空话和神秘的辩证怪论之外别无所能，原因就在于他根本不懂得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懂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不懂得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而经济范畴

①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②《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只不过是这些现象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

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观念，把经济关系当成了它的化身，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经济范畴的本质，颠倒了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之间的本源关系。

蒲鲁东不是把生产关系及其历史发展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是把所谓体现永恒平等观念的经济范畴的逻辑推演作为研究对象，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把物质生产发展史变成了抽象范畴的发展史。蒲鲁东所说的“普遍理性”，“不是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跃的人们的普通的理性”^①，“而是丧失理智的理性。”^②蒲鲁东所说的社会，“决不是由人所组成社会，因为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与组成社会的人毫无关系”。^③蒲鲁东所说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它“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④

正是由于蒲鲁东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一无所知，这也就决定了他必然不懂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人们自觉的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懂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及其历史发展。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是一身二任的，既是“他们本身历

^{①②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0、128、128页。

^④《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

史的剧中人物”，又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作者”。^①也就是说，历史既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又是人们个体发展的历史，既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这些规律又是通过人们的活动来实现的。人作为历史的“剧中人物”，说明历史决不是人们自由意志的产物。人们的活动必然会要受到社会、历史的种种制约，不能随心所欲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生产力，人们不能自由地进行选择，所以，对于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对于建立在一定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制度，人们也就决不能自由地进行选择。

这样讲来，是不是意味着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面前，人们将命定只能是消极被动和无所作为呢？决不是。因为，人们又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作者”。首先，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由作为物质实体的人们创造的；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的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人类的进步，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人们个体实践能力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②其次，我们虽然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但是，这些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也是人们自己生产出来的，而决不是蒲鲁东宣扬的社会之外的什么力量安排的，不是诸如永恒的普遍理性、“天命的目的”或“上帝的存在”在起作用。也就是说，人们不但生产各种物质资料，而且还适应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各种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社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

^②《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

会关系。再次，正是这些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起相应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人们，又按照自己的生产关系而创立出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最后，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当一定的社会关系不再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时，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文明的成果，人们将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将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关系，改变和这些社会关系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可见，作为物质资料生产者的人，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剧作者”，而决不是什么永恒普遍理性为了自身发展而使用的工具。不论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而建立的相应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还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而创造的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都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①

人作为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双重地位、作用，决定了人的本质必然是社会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永恒的。既然作为物质资料生产者的人，总是处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中的社会的人，而不是离群索居的自然的人，因此，人的本质也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人的自然天赋，决不能代表人的本质特征。“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②，他们之间的鸿沟是社会造成的。生产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生产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人的本质的历史发展。社会的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③人类的本质也必然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

^{①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160页。

不断改变。

以平等观念而论，它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反映，决不代表人类的永恒本质。马克思指出：“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但是，说以往各世纪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资料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把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当做过去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看待，否认世世代代不断改变前代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②可见，蒲鲁东宣扬的永恒平等观念，不过是形而上学的虚构，是彻头彻尾反历史主义的。从抽象的理性出发去论证永恒的平等观念，把实现永恒的平等观念当做最高理想，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通病。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致命之处，也在于此。

三、把生产关系及其历史发展作为政治经济学的 研究对象，是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前提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斗争中，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阐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性的生产活动，而不是抽象的范畴、原理；深刻地指出把生产关系及其历史发展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建立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前提。

正是由于蒲鲁东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无所知，这就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批判地利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成果，而只能是把政治经济学更加唯心主义化。以亚当·斯密和大

①《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

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

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过程，解释了生产是如何在这种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他们的错误在于，不是把这些规律看作人类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的规律，而是看成应当永远支配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规律；不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只是适应生产力一定发展水平的历史上暂时的经济关系，而是力图证明它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永恒的自然关系。为什么他们要把资本主义制度神圣化呢？从阶级的局限来看，这是由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①他们其所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无非是想以此表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②

从思想理论上来看，则是由于抽象的人性论在作怪、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③所以，他们都把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作研究政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页。

②马克思：《论蒲鲁东（给施韦泽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2页。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页。

治经济学的出发点。^①作为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他们具有这种荒诞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客观进程已经提出必须突破这种非历史观点的局限，彻底抛弃把人性作为社会制度存在的理性依据，而把社会制度的变迁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时，蒲鲁东却郑重其事地又把这种单个的、孤立的、自然的人，引进所谓“最新的政治经济学”中来，这就是明显的倒退。

在《贫困的哲学》里，蒲鲁东的论述是从价值问题开始的。他关于价值问题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他的反历史主义的世界观。蒲鲁东从经济学家那里知道了产品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他责怪经济学家没有阐明交换价值的起源以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的本性”，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他的肩上。蒲鲁东对交换价值的起源问题作了唯心主义的理解。他说：“由于我所需要的许多东西在自然界里为数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因此我不得不去协助生产我所缺少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不能单独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会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建议，把他们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同我所生产的产品交换。”^②这样就有了交换，产生了交换价值。显而易见，作为蒲鲁东论证交换价值起源的出发点的“我”，以及“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都是没有摆脱鲁滨逊式的，还处在和社会隔绝的孤独状态的自然个体，至于分工和分工所包含的交换，则却是凭空掉下来的。

其实，交换方式和生产方式紧密相关，生产方式的不同决定交换方式的不同。马克思指出：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过各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6页。

^②转引自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7页。

个不同的阶段。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生产超过消费的剩余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甚至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的对象，例如，象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等，也都成了买卖的对象。

蒲鲁东脱离生产方式及其历史发展，孤立地静止地议论交换问题，当然根本无法解释交换对象、内容、方式的上述种种变化。这种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是反历史主义、反科学的方法。

当需要说明某种经济观念的产生时，“蒲鲁东先生就会假定一个人，这个人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去完成这个产生的动作，这样问题就解决了。”^①从现象上看，这种抽象的分析方法似乎事事适用，它能用来解释一切；其实，它却什么也说明不了。

蒲鲁东关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의论述，同样是抽象的、反历史主义的。蒲鲁东把整个社会的需求撇在一边，置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竞争于不顾，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时而说成“稀少”和“众多”的矛盾，时而说成“需求”和“供给”的矛盾，时而又说成“意见”和“效用”的矛盾，最后，干脆归结为“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之间的矛盾。蒲鲁东宣称：“已经证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引起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②因为，“我作为自由的购买者，我就是

①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0、84页。

我的需要的裁判，是物品适用与否的裁判，是对这个物品愿意出多少价格的裁判。另一方面，你作为自由的生产者，那你就是制造物品用的资料的主人，因此，你能够缩减你的费用。”^①可见，蒲鲁东关于价值“矛盾的本性”的种种议论，不过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而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使抽象达到极端，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然后使这两个虚构的人物互相斗争。”^②

实际上，商品价值的内在矛盾，反映和代表着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必须从分析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入手，才能正确揭示价值的本质。在私有制下，生产和消费都是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者即使是自己生产资料的主人，也不能不受社会需要和竞争的制约而绝对自由的。首先，生产者只要是在以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里进行生产，他就不得不出卖产品；至于能不能卖得出去，并不取决于生产者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取决于竞争。其次，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大都是生产者从别处取得的，他能不能取得、取得多少、以及取得什么样的生产资料，也不取决于生产者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取决于市场的供应状况。再次，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生产者并不是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市场的需求状况，责成生产者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内进行生产。凡此种种表明，所谓“自由的生产者”，不过是蒲鲁东形而上学的虚构。

至于所谓“自由的购买者”，在现实的生活中也同样不存

^{①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4、87页。

在。“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①因为，消费者购买的愿望，“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②例如，从表面上看，工人买马铃薯，妇女买花边，这两者都是根据本人的意见行事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意见的差别就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又是社会组织的产物。

总之，生产和交换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研究价值问题决不能脱离这个大前提。

马克思接着分析说：“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③商品价值的矛盾，不是在“稀少”和“众多”、“需求”和“供给”、“意见”和“效用”之间，而是发生在出卖者所要求的交换价值和购买者所提出的交换价值之间。产品的交换价值，每次都是这些互相矛盾的估价的合力。“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构成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斗争的必然要素，而交换价值就是这个斗争的产物。”^④蒲鲁东吹嘘他揭示了价值矛盾的“深奥秘密”，其实，他只不过是“用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如稀少和众多、效用和意见，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费者（两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骑士）来代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需求和供给。”^⑤

蒲鲁东把政治经济学更加唯心主义化，突出地表现在他神化经济范畴，把它当作经济进化的动力和主宰。

本来，“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

①②③④⑤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6、86、85、87、87—88页。

其抽象。”①“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②这些“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③

蒲鲁东对事物的理解，却是另外的一幅图象：他不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看做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是神秘地把历史的社会关系看做这些抽象范畴的体现。在他看来，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如果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问题只在于“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那么，在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里，由于经济范畴都是先于人们生动活泼的生活而存在的，它们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因而在这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当然根本没有历史可言。难怪在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里，当做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统统都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公式。蒲鲁东自己也断言：“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产生，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④

“分工”，是蒲鲁东论述的一系列经济进化中的第一个范畴。他不从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中来考察这个问题，却抓住一个“分”字大做文章。其实，劳动的组成和划分，是视其所拥有的

①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144页。

②《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2页。

④转引自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

生产工具而各有不同的，“手工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①分工既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②，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必然具有各不相同的形式和内容。例如，等级制是某种分工，行会制是另一种分工；没有殖民地的十四、十五世纪的分工，不同于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十七世纪时的分工；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同于现代大工业时期的分工；城乡分离，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也都是某种分工；等等。蒲鲁东既不知道分工的来源，也不知道分工的发展，所以，在他那里，“分工”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抽象。

“机器”，是蒲鲁东论述的一系列经济进化的第二个范畴。从机器发展的历史看，在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前，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1825年起，在英国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就总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至于欧洲各国，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则是在国内和世界市场上同英国的竞争；在美国，采用机器，既由于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可见，机器的采用，本来是市场需求和竞争的必然结果。蒲鲁东却把“机器”说成是“分工”的产物，而且把“竞争”当做“机器”的反题。这表明他不懂得机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何况，机器正如拖犁的牛一样，本身根本不是什么经济范畴。机器本身和利用机器的方式，是不同的两码事。“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③，只有它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3页。

②③《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0、481页。

“所有制”，是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里的最后一个范畴。他把所有制和分工、竞争、垄断、税收、贸易、信贷等等并列起来，试图论证它们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来自一个，正好说明他根本不懂现实社会中的所有制的内容和实质。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统一的整体就构成所有制的内容。马克思说：“在现实世界中，……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①以资本主义社会而论，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就是由分工、竞争、垄断、税收、贸易、信贷等等总合起来构成的。要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②而封建主义的所有制，则是在另外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清楚地表明他“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③

把所有制了解为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把财产关系了解为独立的关系，而是了解为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是在生产的基础上直接产生出来的，并且随着生产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尽管财产的法权关系没有改变，仅仅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所有制的性质也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任何一种生产关系，如货币、资本、信贷、地租等等，如果孤立起来，就是抽象的和不可理解的，只有

①②③《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1、481、481—482页。

在它们的相互联结的总体上，在它们的系列和系统中，才能具体地确定和把握它们的性质。所以，只有生产关系的总和才构成了社会的基础，才能据以确定社会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社会经济形态。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有制形式”、“生产关系总和”和“社会经济形态”这些概念，则具有相同的意义。

蒲鲁东把分工、竞争、垄断、所有制等等并列起来，从方法论上来看也是错误的。因为，不论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范畴时，都不能不靠其他一些范畴来说明。可是，在需要借助其他范畴帮忙时，按照蒲鲁东的“在理性中的一定系列”，它们还根本不存在。及至它们按“逻辑顺序”被推导出来时，蒲鲁东又把它们当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范畴是同样年老了。蒲鲁东把作为永恒理性自我表现的种种范畴，用来构筑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的大厦，实际上，这就是把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割裂开来，把社会体系的各个有机环节变成等同数量的前后相随的单个的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当然，蒲鲁东之所以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①蒲鲁东看不到资本主义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②蒲鲁东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

①②《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6、482页。

阶级关系的范畴,实际上就是神化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他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制度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

总之,蒲鲁东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又拐弯抹角地回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陷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象封建的生产方式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①

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蒲鲁东的这种经济和哲学观点的斗争中,以论战的形式进一步发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新的基础上开始制定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后来,马克思在谈到《哲学的贫困》时写道:“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②

第三节 批判蒲鲁东的矛盾调和论,进一步 阐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

一、剖析蒲鲁东矛盾调和论的形而上学世界观

为了彻底地批判蒲鲁东的经济观点和哲学观点,马克思还着

^①《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②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8页。

重剖析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论。

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蒲鲁东关于财产问题的论述，明显地暴露出他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无可奈何态度。对于为什么原始的平等意向反而招致了不平等的后果的问题，他照搬了康德对待“二律背反”的处理办法。“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理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理性所不清楚的事情。”^①

在《贫困的哲学》这部著作中，蒲鲁东对待矛盾的态度，从形式上看，似乎前进了，由以前的无可如何变成了到处搬弄，企图运用“矛盾”来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阐述方法来代替了。”^②但是，蒲鲁东从黑格尔那里只是学来了“矛盾”的用语，而对于科学的辩证法仍然一窍不通。

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原封不动地承袭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根本立场。蒲鲁东通过经济范畴的逻辑推演来构成世界，说明历史的幻想，清楚地表明他对待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反科学态度，不是弃其体系、存其合理内核，而是去其精华、取其糟粕。

在费尔巴哈已经突破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情况下，蒲鲁东通过构造“经济矛盾的体系”，又要来复活思辨哲学的幽灵，这又是一个明显的倒退。

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泛逻辑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描述绝对观念创造世界的辩证运动。在黑格尔哲学里，抽象范畴是世界的本原，世上的万千事物则不过是逻辑范畴底布

^{①②}马克思：《论蒲鲁东（给韦施泽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31页。

上的花彩。这个唯心主义的怪想，是撇开事物的个性，对事物进行极度抽象的产物。如果把构成每一事物的种种特征、偶性统统抽去，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作为实体的势必将是一些逻辑范畴。同样，只要抽去各种各样运动的一切特征，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也就可以得到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运用这种方法，“那末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①黑格尔自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黑格尔运用泛逻辑主义为宗教、法等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蒲鲁东既然忽略了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在范畴中只看到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就不得不到纯粹逻辑理性的运动中去寻找这些思想的来历。正因为蒲鲁东顽固坚持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基本立场，势必无法解释经济范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们何以能成为世界的本原、历史的主宰。于是，只好归之于神秘，求救于“天命”。“上帝，伟大的不可知者”，由此，也就“变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辩证工具。”^②似乎这些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这些逻辑公式竟是从世界开始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永恒公式。

蒲鲁东除了坚持黑格尔主义这个根本立足点外，和黑格尔的博学相比，他的突出特点是对社会、对历史的惊人无知。所以，蒲鲁东所谓的“经济进化”，虽说也是在思辨的王国里发生和进行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1页。

^②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页。

的，但如果揭去纯粹理性神秘的帷幕，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给人们提供的不过是经济范畴在他头脑中的排列次序，“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①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时，进一步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在马克思看来，一切事物的运动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经济范畴的辩证法，观念的辩证法，是由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决定的。他说：“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②而“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③客观事物、人类历史是运动变化的，因而反映客观事物、人类历史运动变化的概念、经济范畴也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唯物辩证法要求首先对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进行探讨，而不能象蒲鲁东那样本末倒置，随心所欲地搞什么经济范畴的逻辑推演。

蒲鲁东的矛盾调和论，表现在他顽固地坚持用小资产阶级的善恶观念来改造辩证法，把矛盾加以伦理化。在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里，每一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都是由肯定平等的好的一方面和否定平等的坏的一方面拼凑组合而成，这就阉割了黑格尔关于矛盾自己运动的可贵思想。

在黑格尔那里，作为绝对观念自我表现的范畴，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它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

①《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

②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1、143页。

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它们之间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就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这种增殖过程就构成了思想群；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而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

蒲鲁东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了用“矛盾”构造“体系”的幻想，而抛弃了关于范畴自身运动的思想。蒲鲁东“看范畴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①蒲鲁东所谓的“辩证运动”，就是机械地划分出经济范畴的好、坏两个方面，通过对立范畴的“综合”，来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例如，“分工”的好的方面，“是实现条件上和智能上的平等的方法”；而其坏的方面，则是“分工变成了贫困的源泉”；应当解决的任务是，找寻“一种新的结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②“机器”是“分工”的反题，它好的一面在于减轻劳动，而坏的一面在于排挤工人、否定个性的发展。“竞争”是作为保存“机器”的好的一面，消除其坏的一面的“综合公式”而出现的。蒲鲁东虽然不能不承认竞争也有坏的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页。

^②转引自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159页。

方面，但他却极力颂扬竞争，认为它是更高形式的分工，它产生自由，“要使平等到来，必需有竞争。”^①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消除竞争，消除竞争和消除自由同样是不可能的；全部问题在于为它找到一种均衡，我看就是警察。”^②

“垄断”是“竞争”的反题，它也有好坏两个方面。“垄断既是社会构成的根源，是财富的必要条件，同时在同等程度上也是掠夺和贫困的根源；愈是要它产生福利，从它那里得到的祸害就愈多。没有他，社会进步就会停滞，有了它，劳动就将闲息，文明将衰落。”^③为了保存垄断的好的一面，消除其坏的一面，又过渡到国家和税收。他说，人类有如一个旅行家，步伐坚定，不后悔也不踌躇；走到垄断的拐角，他用忧郁的目光回头一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对一切生产品课以赋税，并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职务交给无产阶级并由垄断资本家付给报酬。^④

再往下接着就是：贸易差额可以消除捐税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如此等等。蒲鲁东就这样把所有的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了两卷本的“经济矛盾的体系”。

人们在这个“体系”里看到的，不是由于矛盾的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纯粹理性的运动，而是在经济范畴的好、坏两个方面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也就是说，蒲鲁东既然把范畴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简单地对比善和恶，归结为提出任务来消除恶，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末范畴就失去自己的

①②转引自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2页、173页。

③④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3—224、260—261页。

独立运动，而所谓的永恒的普遍理性实际上并未发生作用，因为它压根儿就没有内在的生命。

总之，蒲鲁东的“辩证法”，并没有描述什么理性的辩证运动，“代替它的至多不过是最纯粹的道德而已”。^①正是在阉割矛盾的自身运动这个基本点上，蒲鲁东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蒲鲁东“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末，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②。

蒲鲁东的矛盾调和论，还表现在他所谓的“辩证运动”是有始有终的。在“经济矛盾的体系”里，经济范畴的演变，从“分工”开始，到“所有制”终结；关于价值问题的论述，从交换价值开始，到“综合价值”终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体系”的建立，产生于消除一切矛盾的需要。蒲鲁东自己也承认：“尽管未曾得到证实，但是我料想，人类固有的矛盾是有止境的”。^③

二、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 是矛盾调和论的集中反映

在蒲鲁东看来，在他以前，“社会天才”只是看见“对抗因素”，尚未发现“综合公式”，因而所有的经济范畴都具有好坏两个方面；“社会天才”应该发现完美无缺的体现永恒平等观念的范畴，亦即彻底排除好坏两个方面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这个发现者就是蒲鲁东；这个“综合公式”就是“构成价值”。

蒲鲁东吹嘘“构成价值”是他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伟大发

^{①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7、148页。

^③转引自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1页。

现”，是他创立的经济矛盾体系的基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集中地反映出他的矛盾调和论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清楚地表现他如何顽固地坚持用永恒平等观念来改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

什么是“构成价值”？如前所述，蒲鲁东把商品内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归结为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有了矛盾怎么办？蒲鲁东为了谋求两者之间的平衡，于是发明了所谓的“构成价值”，它是用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矛盾的。

蒲鲁东从斯密和李嘉图那里知道了劳动是构成价值的基础，他由此产生一种幻想，认为一切产品只要都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进行交换，那末，它们的价值就会达到“构成状态”。蒲鲁东看到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情况，往往不是供大于求，就是求大于供。因此，他宣称，必须让所有的产品都严格地按照一定的比例生产出来，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一种产品都毫无过剩地为交换所吸收，从而所有产品的价值通过交换都能达到“构成状态”，由此也就可以保证供求关系达到完全的平衡。

蒲鲁东宣称：“价值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①他把整个社会财富比作化学中的化合物，如同化学中的各种元素必须根据确定的定律，按照不同的比例，才能化合成某种新的物质一样，社会财富也是由各种产品按比例互相配合而成的。在化学上，“产生配合的内部动作取决于各种不同物质的化合力，在社会上，该项内部动作就是交换，不仅是指起码形式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而且也指的是把私人工业所生产的一切价

^①转引自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2页。

值熔化成一个社会整体。财富的这类交换,最后,如同每一种元素加入混合体中所依据的比例一样,就是我们所说的价值,在配合后所剩下的多余部分,就叫做非价值。”^①就是说,在蒲鲁东看来,凡是产品能够在交换中得到社会承认,被列入社会财富的,它就“构成”为价值。而那些超过比例的多余部分,因为不能为交换所吸收,不被社会所承认,便不能作为社会财富的构成部分,也就不构成价值。由于各种产品的生产都必须在一定的比例之内进行,才能成为社会财富的一个构成部分,才构成价值,蒲鲁东就把它叫做“构成价值”。由于“构成价值”表现了交换中的一定比例,这种比例本身的基础则是人们的劳动,因此,蒲鲁东又把“构成价值”叫做“比例价值”。由于按照一定比例生产出来的产品,通过交换而被列入社会财富,取得了“构成价值”,由此而使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得到综合与调和,所以,蒲鲁东也把“构成价值”叫做“综合价值”。

蒲鲁东断言:“金银在一切商品中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②金银本来也是普通商品,它们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它们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后来,“君主们逐渐地占有了贵金属,并且~~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③作为货币的金银,是“最道地的商品”,“早就获得了稳固性和确实性”,“不论交易中有什麼动荡,这种商品都能保持一定的比值并在各种支付中被人接受”^④。就是说,作为货币的金银,能够随时随地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使用,按照它们的价

①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8-79页。

②③④转引自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0页。

值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取得了“构成价值”。蒲鲁东由此认定，只要其他一切商品都严格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来估价，按照生产它们时所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进行直接交换，那末，它们就肯定会象金银一样，具有随时随地进行交换的可能，由此而取得各自的“构成价值”，而不致发生跌价或者成为无人问津的废物。这样一来，对金银这种特殊货币的需求就会消失，因而也就可以进而消灭货币制度。

蒲鲁东关于“构成价值”的种种论述，完全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虚构，充分暴露出他对价值的本质一无所知。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单独构成的”。^①因为，价值根本就不是什么可以单独构成的物品，而是反映和代表着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关系之中，商品的价值才能得到确定和实现。

首先，供求之间的比例关系，根本不取决于产品都严格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进行交换。只有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动才告诉生产者，某种商品的生产是大于需求还是小于需求，他应该增加生产还是压缩生产。由于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动是经常的，所以，生产资本也就不断地出入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正是供求关系的这种波动性，调节着各个产业部门之间比例关系，使得各种产品都能大致按照生产它们所实际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实现其价值。

因此，马克思指出：“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是不存在的，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②这就是说，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

^{①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106页。

社会里，脱离供求关系的波动，就根本谈不到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尺度。

其次，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使蒲鲁东鼓吹的“比例规律”变成比例失调的规律。在私有制下，一个人每小时的劳动和另一个人每小时的劳动是不是等值，这是要由竞争来解决的问题。因为，要使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较各种不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而“确定这种尺度表的就是竞争。”^①正是由于竞争，把劳动时间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个规律，势必成为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因为，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够在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就会使市场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而且，跌价的不仅是运到市场上去的商品，连生产工具以及整个企业也都在内。竞争迫使生产者出卖花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贵于花一小时所生产的产品。所以，马克思强调指出：“千万不要忽视，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而这种最低额又是由竞争来规定。”^②也正是由于竞争，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尺度不仅会造成劳动的不断跌价，而且，价格过高、生产过剩以及其他许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现象，也都可以用这种估价的方法来解释。

总之，资本主义的竞争，必然伴随着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把劳动时间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个规律，正是在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才得以实现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③，蒲鲁东所追求的“比例规律”，由此

①②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6、107、109页。

也必然成为比例不断失调的规律。

再次，产品的价值虽然必须通过交换过程才能实现，但是，它却不是在交换过程中构成，而是在生产过程中由人们创造的。蒲鲁东撇开生产过程，孤立地局限在交换领域里来论证价值的“构成”问题，充分表明他根本不懂得生产方式对交换方式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①退一步来说，即使假定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从事劳动的直接生产者，那末，要使他们之间的交换完全按照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进行，也必须事先对花费在生产各类产品上的劳动时间的数量取得一致的协议，而这种协议却恰恰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也就是对价值本身的否定。可见，离开生产的社会关系来考察价值问题是寸步难行的。

综上所述，可见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的要害，正在于置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于不顾，撇开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撇开供求关系的波动运动，撇开整个生产过程，抽象地议论价值的“构成”，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硬要去追求什么正确的“比例性关系”，以及所谓的“按比例规律”行事，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向邪路。

正是由于蒲鲁东曲解了价值的本质，从“构成价值”这个根本错误的前提出发，蒲鲁东关于工资问题的理论也必然是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7页。

错误的。首先,蒲鲁东关于“等量的劳动时间相交换”的公式,将保证一切生产者都会得到平等报酬的论断,不过是把一种没有根据的假设看作结果。因为,要做到在劳动量相等的条件下,一个人的产品和另一个人的产品平等地相交换,必须首先假定这样一个前提,即整个社会组织仅仅是由直接生产的劳动者所组成,或者说,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以相等的劳动时间得到相等的报酬的工人,交换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然而这个前提,却恰恰是蒲鲁东编造“构成价值”所要论证的结论。显而易见,这种作法,就是把需要证明的道理当作已经证明了的论据来使用。

“这种说法就是假定,平等分配还在交换以前就存在了。”^①

其次,关于“等量的劳动时间相交换”的公式,注定是工人遭受资本家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企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因为,这种等量的劳动时间相交换,并没有改变生产者的相互地位,正如工人和工厂主的相互关系没有任何改变一样。资本家雇用工人是把他们当作生产工具,是由于他们的劳动“隐含着价值”,而不是为了什么公平交换。只要正视资本主义的现实,就不难看出:“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这种做法和现存的阶级对抗、和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是多么不相容。”^②

也正是由于蒲鲁东曲解了价值的本质,从“构成价值”这个根本错误的前提出发,蒲鲁东关于货币的理论,也同样是脱离生产的社会关系的虚构。首先,“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③为什么要创造一种普遍的交换手段来使交换价值个别

①②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5、95、119页。

化？这必须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历史发展去求得解答。货币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生产发展的需要，是一系列交换行为的结果。因此，货币所表现的关系，也象任何其他经济关系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是其他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的一个环节。货币和个人交换一样，也是和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作为货币的金银价值的构成，必须以许多其他产品的价值已经构成作为前提条件。蒲鲁东把货币从现实的生产方式的总体中分离出来，孤立地进行考察，因而他既不可能阐明货币的起源，更不可能揭示货币的本质。

其次，蒲鲁东关于金银“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①的论断，这是把君主的专横看作政治经济中的最高原因。马克思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②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而它们之所以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那是因为生产的发展需要普遍的交流手段。

再次，蒲鲁东把作为货币的金银和作为普遍商品的金银混为一谈，把金银作为货币的特性强加于所有由劳动时间来确定其价值的产品，力求证明它们不但可以具备、而且必须具备货币的特性，这个企图也是徒劳的。因为，取得货币身份的金银和作为普通商品的金银，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货币作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只是充当价值符号，充当一切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在一

^①转引自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页。

^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122页。

切商品中，只有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由生产它们的劳动时间来确立其价值的，因为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的金银可以用纸币来代替，而纸币却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货币可以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正因为它排斥了其他一切商品具有普遍交换的可能性。换言之，任何其他产品要进入交换过程，都必须经过货币的媒介，都要利用货币这种普遍的交换手段。至于货币的职能恰恰落在了金银的身上，而不是任何别种商品身上，这是和金银作为贵金属所固有的物质特性分不开的。

从阶级和历史根源来看，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是小生产者幻想调和矛盾的产物。在蒲鲁东看来，一切经济范畴的矛盾，都是由价值的矛盾引起的，只要价值的矛盾解决了，其他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换言之，价值问题的解决，也就是社会问题的解决。蒲鲁东编造关于“构成价值”的种种神话，正是企图以他发明的价值理论为指南，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全部社会问题。按照“构成价值”论的要求，所有的生产者不仅都要严格地按照所谓的正确的“比例性关系”来进行生产，而且都要永远以公平的价格相互交换，以便用“劳动货币”来消灭货币和资本，把社会全体成员变成交换等量劳动的自由生产者，把社会组织变成通过公平交换而组合起来的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建立起一个协调一致、人人平等的小生产者的新社会。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却无情地粉碎了蒲鲁东的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历史事实已经表明，蒲鲁东所迫切要求和殷切企望的供求之间的那种“比例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早已过时，不复存在。过去，在中世纪行会制度下，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只是在极其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由于当时社会需求不大，需求先于并且支配着供给，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正是

这种状况，维持了社会生产的正确的或者大致正确的比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这种正确的比例必然会消失。现代机器这种生产工具的特点，由于激烈的竞争，由于资本家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生产不能等待需求，生产一定要走在需要的前面，供给强制着需求。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①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社会集团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和现实也一再表明，蒲鲁东所心向往之的个人交换，或者只适宜于过去几个世纪的小手工业和它所特有的“正确比例”；或者适宜于大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竞争、贫困和无政府状态。要使社会生产确实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要真正实现没有竞争、贫困和无政府状态的社会进步，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彻底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谁企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保持旧时的供求比例关系，既希望保存私有制，保留竞争，维护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又妄想要避免它们必然会带来的悲惨后果，“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②。这也正是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的致命之处。

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平均主义应用，决不是蒲鲁东的独创和发明。只要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一点儿了解，就不会不知道，上个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突出表现。小资产者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决定它们的理论代表人物必然

^{②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页。

要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就是他们存在的基础,他们正是社会矛盾活生生的体现。列宁在概括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时指出:“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地,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允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①

三、揭示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征, 强调 矛盾和对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在反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 进一步批判地利用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成果, 把它从抽象观念的思辨领域移置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上, 系统地应用于对社会和对历史的研究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提供了不少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现象的范例, 在分析过程中揭示了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着的辩证过程。而在《哲学的贫困》中, 马克思已特别注意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本身, 并概括地揭示了它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形而上学观点时, 研究了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相互制约性, 研究了矛盾双方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蒲鲁东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归结为“富足”与“贫穷”的矛盾, 但是, 由于他坚持形而上学观点, 所以, 他不懂得,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富足”和“贫穷”作为矛盾的双方, 则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是相互制约又相互斗争的关系。马克思指出: “资产阶级运动在其

^①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页。

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①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是由贫穷产生的，而且资本主义形态的财富，也必然会产生贫穷，富足和贫穷这两个对立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蒲鲁东企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消除“贫穷”，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同时，蒲鲁东也根本不懂对立双方的不同作用，企图采取消除“坏”的方面来解决矛盾。马克思说：“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②因为，“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③例如，如果取消了封建社会的坏的方面，其结果势必是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的灭绝，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因而历史的发展也就会一笔勾销。

正是由于马克思注意到对唯物辩证法本身的研究，所以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地指出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马克思说：“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④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对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在不断地进行概括的。前面讲过，在《黑

①②③④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156、146、154、146页。

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谈到唯物辩证法时，强调的是矛盾双方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它们既不相互吸引，也不相互补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分析了矛盾对立统一的三种情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结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基本矛盾的分析，说明了矛盾双方在统一体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而《哲学的贫困》中所提出的这一论断，不仅全面地阐明了矛盾双方既统一、又斗争，通过斗争发展成为新的统一体的辩证运动，而且科学地指出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这充分地表明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观点的成熟性。

在批判蒲鲁东的形而上学观点时，马克思还认为，对立面斗争和转化的理论，对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剖析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蒲鲁东以及所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他们不是根本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对抗，就是力图歪曲它们的实质，并且企图加以调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虽然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但是，当他们还是空想主义者的时候，当他们还停留在自己头脑里寻找“科学”、“真理”并醉心于创立各自体系的时候，同样不能正确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矛盾，看不到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阶级。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①

《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就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页。

在于进一步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丰富和发展了历史的辩证法。

由于蒲鲁东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无所知，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不懂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不懂社会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蒲鲁东看到了历史的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它首先只及于少数的特权者；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的工厂中，“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性”^①，看到了雇佣工人的屈辱身份、工资微薄和生活贫困，但是，他根本不理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更不知道如何来改变这种现状。为什么历史的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归根到底，这是因为生产力是由于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都是以被压迫阶级的存在作为必要条件的。马克思说：“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②例如，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的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

为什么社会革命是历史进步不可缺少的环节？归根到底，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首先，革命课题的提出，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提出来的；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生产

^①转引自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5页。

^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力发展的最大障碍，“将导致人们的肉搏”^①。其次，革命的目的，就是改变不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和一切社会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说：“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而“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②再次，实现革命任务的物质力量，也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准备和积聚起来的。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作为前提，而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以资本主义社会而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对抗，已经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随着它们之间的对抗的发展，无产者将逐渐团结起来，由自在的阶级转化为一个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就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决定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进展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总之，“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

^{①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8、197页。

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①

所有这些，统统在蒲鲁东的视野之外。他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中，去探索社会发展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不从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运动中去引导出社会科学，而是“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②

正是这种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使蒲鲁东从无产者的贫困中只看到贫困，而看不到在贫困中存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的因素。也正是这种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使蒲鲁东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以为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革命，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

从本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已经全面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8页。

^②《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6页。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问世和它在思想史上实现的革命

1847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起草了1848年2月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一次完整的系统的阐述。它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新的世界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政党活动的结果，它证明了新世界观的伟大价值。它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及其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开端，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式问世和它在思想史上的革命变革的实现。

第一节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恩格斯在谈到十九世纪30年代以来的德国的社会主义时写道：“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

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①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融合过程的历史，也就是《共产党宣言》产生的历史。

对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已有了详细的论述。这里，我们主要是了解一下当时的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以及它同马克思为代表的理论运动融合的过程。

十九世纪30—40年代，西欧工业无产阶级随着在政治上作用的加强，它本身也进一步团结和组织起来，不仅建立了工会，而且还建立了政治性组织。当时影响较大的工人政治组织有英国的宪章协会、法国的四季社和德国的正义者同盟。然而，这些团体组织上涣散、不稳定或带有密谋性和宗派性，思想上受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因而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走上正确的斗争道路，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正义者同盟的历史，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情况。正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流亡者同盟。它是1834年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的一个公开团体由于支持南德反对派报纸而遭到法国政府压制以后，成立的第一个秘密组织。它的盟员是几百个手工业工人。同盟的目标是：解放和复兴德国，确立和保持社会和政治的平等、自由、公民道德和民族统一。它象法国的人权社一样，追求民主共和国的目标，是一个分成许多等级的密谋组织。1836年，从流亡者同盟中分出了最激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正义者同盟。它开始努力制定一个工人纲领，其最高目标是“共有制”或“财产共有制”。它是当时具有巴贝夫主义传统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

^①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8页。

一个德国分支。盟员要求有一部关于“财产共有制”的著作，在经过长时间讨论的基础上，1838年，魏特林(1808—1871)写出了《人类的现状及其未来》，三年后，他又完成了自己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这两部著作，吸收了傅立叶、巴贝夫、蒲鲁东、拉梅耐和其他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加上魏特林自己创立的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在魏特林看来，耶稣是共产主义者中的第一个人。他的财产共有制，是从早期基督教中推演出来的。这两部著作，在若干年中，实际上成为同盟的纲领。

1839年5月12日，同盟各支部参加了四季社在巴黎领导的起义。失败后，同盟的领导人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先后被驱出巴黎，来到伦敦。1840年，沙佩尔等又在伦敦把同盟恢复起来，随后在巴黎、瑞士和德国都建立了支部。这时，同盟已开始有明显的变化：它逐渐从德国人的组织变成了国际性的组织，参加同盟的除德国人外，还有法国人、英国人、波兰人、瑞士人，部分盟员和领导者吸取巴黎失败的教训，已停止对巴黎秘密活动者的依赖性；在英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同盟的领导人也逐渐抛弃手工业者的狭隘性；从1842年以来，他们开始对费尔巴哈等的德国哲学著作感兴趣。然而，这时魏特林的观点及其密谋策略，仍在同盟中占居统治地位。“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阶级调和思想，对同盟也有一定的影响。德国哲学从1839年至1846年这一时期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在同盟组织内部有它的追随者。

在革命高涨的情况下，恩格斯看到：“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

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①为此，他们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同时，还积极为建立共产主义政党而斗争。

他们为建党而斗争的第一步，是在1846年初于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确定它的任务是同各国社会主义团体建立经常联系，了解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批判错误观点，逐步统一思想，团结真正的革命分子，为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作准备。由于他们积极活动的结果，建立了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广泛的通讯联系，把英、法、德、比利时和波兰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加深了他们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

1843年，沙佩尔就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由于他们不同意在同盟中盛行的空想共产主义观点，不赞成同盟的宗派主义密谋活动的原则，拒绝加入同盟。虽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仍然通过口头演说、书信和报刊，来积极地影响盟员的观点。在他们的影响下，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沙佩尔、莫尔和亨·鲍威尔也赞同在各地建立通讯委员会的思想，并在伦敦也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伦敦的盟员也愈来愈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理论是正确的。

为了改造正义者同盟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反对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反对格律恩、克利盖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

1847年春，正义者同盟委派莫尔先后到布鲁塞尔和巴黎，找

^①《恩格斯致格·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9页。

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邀请他们加入同盟，参与改组同盟的工作。莫尔明确说明同盟确信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正确，如果他们愿意加入同盟，可以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阐述自己的观点，还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见到有可能改组同盟，便欣然同意加入。

1847年6月2日至9日，在伦敦举行了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会前的提议，大会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了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明确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1847年11月29日到12月8日，在伦敦举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都出席了大会。会上，他们捍卫并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近十天的激烈争辩，大会批准了上次大会所草拟的新章程，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委托他们两人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草拟同盟的纲领，作为党的宣言公布出来。

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由恩格斯亲笔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以及会后经过恩格斯修改的《共产主义原理》，都是用问答体裁写成的。这种表述形式，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按照大会的委托，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活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们仍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撰写《共产党宣言》。会后，他们在伦敦共同拟定了提纲，并写了好几天。接着，他们又到布鲁塞尔共同写作。在恩格斯12月底前往巴黎后，马克思又写了将近一个月。直至中央委员会催促，到1月底，马克思便将宣言的手稿寄到了伦敦。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德国流亡者布尔哈特开设的一个小印刷所里刊印出来。不久，人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想方设法用各种欧洲文字出版《共产党宣言》。

这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历史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它给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资本主义奴役、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道路。正如列宁所说的：“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①

第二节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 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问世

前几章讲过，1844年至1847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已经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共产党宣言》彻底地贯彻了这一世界观，运用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世界观。列宁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②所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问世。

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

^①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

^②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8页。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①

恩格斯在这里所指出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从物质生产、经济基础去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都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必须用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的各种现象；无产阶级只有消灭阶级和剥削，解放全人类，才能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这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这一贯穿全书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哲学基础。

由于《共产党宣言》贯穿着包含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唯物主义，所以，它消除了以往一切社会主义流派的唯心主义虚构和空想的成份。魏特林对历史发展明显地缺乏认识。他认为：说人类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那是反动派的语言；它要么总是成熟的，要么就总是不成熟的。克利盖声称，历史为我们证明不了

^①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页。

什么。沙佩尔、亨·鲍威尔、莫尔和普芬德接近于这样的认识：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他们也没有看到这些斗争的经济基础。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一切社会科学的结论都只能从历史本身的合乎规律的运动中引导出来，而不能从任何其他非历史的前提如抽象的理性或人的本质等等中引导出来。恩格斯在谈到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时也说：“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①坚持从历史本身出发来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这就是指导我们认识历史的基本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共产党宣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必然灭亡的规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共产党宣言》体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来，在历史上出现的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乃是暂时的、过渡的，而历史的发展则是由社会内部所固有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造成的。

《共产党宣言》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就是由于封建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的结果。它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

^①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1-312页。

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这就是说，封建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生产关系逐渐发生了改变。但是，生产力还在不停地向前发展着。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即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新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因而它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都没有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

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当封建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变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封建的生产关系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类似

的运动又在进行着。《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总之，资产阶级使生产具有社会性，把成千上万的工人集中在大企业里，开创了更高水平的社会分工，使各经济部门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私人占有产品，同生产的社会性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本身所起的作用，在客观上为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作了准备。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是必然的。

（二）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阐明了用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用无产阶级政治统治代替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光辉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

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也在不断上升。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取代封建的政治统治的是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亦即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然而，政治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不是消极的，它也有一定的反作用。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就是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当它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它对基础表现出积极的作用，表现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同时，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

其便利，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迫使它们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它的突出表现。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市场。其实，这完全无济于事，它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同样，资产阶级利用其政治统治竭力想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即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无产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一无所有，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现代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工人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工厂主本人的奴役。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资本家对工人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最初是自发的暴动和捣毁机器，后

来革命的无产阶级认清了自己的目的，进而自觉地组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进行有组织的反抗，他们组织成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进行的斗争，必然要发展成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分析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确定了最近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共产党宣言》最重要的思想。虽然“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是后来1850年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才提出来的，但是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的表述”。^①

虽然早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文中，已经研究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破坏者的历史使命问题，但是，那时他们还没有谈到无产阶级只有靠建立自己的政

^①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页。

治统治、自己的政权，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只是在他们积极参加法国、英国、德国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研究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规律，克服了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固有的“人民政权”的抽象要求后，才得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作为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政治条件这一结论。

(三)在对以往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的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就已经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学说。在《共产党宣言》中，阶级斗争的学说得到了更精辟的概述。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这里所讲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之所以没有将原始社会除外，这是因为在1847年，对社会的史前状态，即对原始公社几乎还没有人知道。

接着，《宣言》具体地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各个社会形态中所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它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的各个社会中，既然存在着阶级，那末就必然存在着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页。

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出规律性。

《宣言》在分析了以往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共同性外，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特点。“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无产阶级革命也有它的特点，这就是：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的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产阶级为了增殖资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它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35页。

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共产党宣言》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同以前的思想家，如法国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论述有着本质的不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虽然也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然而，他们只承认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只承认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的必然性，而不承认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必然性。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化，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看到了阶级、阶级斗争同财产关系、经济条件的联系，但是，他们最终还是用人的天性、征服等来解释阶级的产生，他们的理论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与此相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则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它从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说明阶级和阶级斗争，来说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它公开宣布：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四）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基本原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同其社会存在的关系，确定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任务。

《共产党宣言》明显地肯定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它在谈到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时说：“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

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①

它还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它论证说,思想的历史,证明了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还有,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同样的道理,“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②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还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为武器,驳斥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所宣扬的如自由、正义等等所谓“永恒的真理”。他们指出,由于对立的阶级在各个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各不相同,因而反映这些不同的社会存在的观念、意识是各不相同的,真理都具有相对性,真理的内容总是具体的。然而,为什么会具有所谓永恒的真理这种共同的形式呢?道理很明显,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不管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41、37页。

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都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正是根据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宣言》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任务，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

（五）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和批判了当时各种反动的、保守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流派，使无产阶级认识它们的本质，同它们划清思想界限。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暴露之后，被资产阶级取代了的封建贵族，经常处在资产阶级威胁之下而度着苟延残喘生活的小生产者，以及一部分妄想废除资本主义的弊端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者自己，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来发泄自己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表白自己的利益。这样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派别。

为了帮助同盟盟员和无产阶级识别各种社会主义的本质，同它们划清界线，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专门分析和批判了这些社会主义流派。在每种“社会主义”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定的阶级利益，都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因此，正如列宁所说的：“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评也是在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4页。

论的根源的。”^①

马克思、恩格斯把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分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封建的社会主义是作为法国贵族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英国贵族在1832年的改革法案中最后遭受失败的结果而产生的。这两个国家的贵族，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击败资产阶级而恢复其旧日的统治地位了。为了激起人们的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己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维护封建贵族的利益，赞美和企图恢复早已被历史所淘汰了的封建的剥削制度，所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他们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就是由于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则是从小资产者的眼光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中世纪的城市市民和小农等级，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苟延残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他们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同时有的国家农民阶级仍大量存在。反映这一阶级利益的著作家，自然是用

^①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小资产阶级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这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虽然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若干矛盾，但是它们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要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却是想恢复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的生产关系。他们不是要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容纳不了的生产力，却是要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已容纳不了的生产力，硬塞进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落后的小生产者的生产关系里去。所以，它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已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它是处在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已开始暴露的情况下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他们既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消灭小生产者，又害怕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消灭了私有制，因此，他们既反对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反对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思想上，他们想把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同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协调起来，提倡用“爱”来解决阶级社会的矛盾。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求之不得的吓唬资产阶级的稻草人，它也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端，以便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在资产阶级看来，资本主义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所以，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不愿意要无产阶级。他们既然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才想去废除它的弊

端，那末，废除这些弊端的手段，必须以毫不触动这个制度的存在为原则，所以，他们企图通过一些行政上的改良的办法来消除这些弊端，他们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说资本主义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企图调和阶级矛盾，从而消除阶级斗争。

《共产党宣言》对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评述，是历史主义地对待文化遗产的典范。它分析了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产生的历史条件，指出它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宣言》一方面指出了这些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缺点，一方面也肯定了它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积极意义。它的缺点主要在于他们没有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没有找到赖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真实力量，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不是一个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因此，他们总是希望有一个什么开明的皇帝和资本家接受他们的理想方案，就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社会主义了。但是，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矛盾，斥责了剥削者的罪行，指出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特征，其中有些虽不免是幻想，但有些却是天才的揣测。它既不象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那样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象反动的社会主义那样是要恢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这显然是由于当时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的局限所造成的。正是由于这样，后来发展到他们的门徒那里，就变成反动的学派了，逐渐地堕落到上述

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共产党宣言》的确体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它透彻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表明这种新的世界观已经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理论武器。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明显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过去一切哲学中的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在形态上与过去一切哲学体系根本不同的崭新的哲学,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更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后,使哲学的内容以及它同其他各种科学的关系,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了;哲学对于生活、对于社会斗争和对于人民群众都产生了完全新的关系;哲学的社会使命和作用,也根本地改变了。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乃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最伟大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造成的革命变革,首先表现在它引起了哲学对象的根本改变,使它成为科学的世界观。

哲学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它的对象以及它所研究的问题的范围是不断改变的。在古代,哲学是同其他各种科学部门混在一起的。后来,由于科学认识的发展,人类知识的积累和不断扩大,出现了许多具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部门,逐渐与哲学分离开来,这样,哲学所研究的问题的范围也逐渐缩小了。

以前的哲学,由于它是产生在科学发展比较低级的阶段,社

会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自然科学也还不能阐明自然界现象各方面的相互联系，它们远远不能给世界发展的全貌提供出一幅完整的图画，那时，哲学家为了描绘世界的整体，在许多方面还必须靠想象和逻辑推演来弥补科学材料的不足。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一切哲学家，都竭力想把哲学说成是科学中的科学，并且企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每个哲学家都吹嘘自己的体系是穷尽了一切知识，是人类认识发展的顶峰。黑格尔是这样。费尔巴哈也是这样，他就妄图创造一种“未来的哲学”，企图建立一些永世不灭的真理。实际上，这样的体系，虽然也对当时科学成就有所概括，但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大量的主观臆测的成分，其中虽有许多有价值的天才的猜测，对人类思想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有过贡献，但也有许多猜测是不科学的、荒谬的。他们还将这种臆造出来的哲学体系和公式强加于一切科学之上，因而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的哲学不同，它产生于人类科学发展的新阶段。这时，自然科学的成就，能够使人了解自然界的辩证运动的一般过程。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所引起的整个社会的迅速变化，以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社会历史领域里研究材料的积累，它也象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已有可能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联系。因此，以往那种大部分靠主观臆测和逻辑推演构造包罗万象的体系的哲学，那种所谓“科学的科学”，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

法。”^①这时，哲学的任务，就仅限于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进行概括和总结，使人们对整个世界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有一个总的了解。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了一个不同于过去任何哲学体系的科学的 worldview。

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的革命变革，同时表现在它是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即辩证法这一崭新的哲学形态。

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进行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和宗教神学思想的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一切力量来破坏和诋毁唯物主义。嗣后，唯心主义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又实现了富有内容的复辟。费尔巴哈的功绩，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决裂，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然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着严重的形而上学的缺陷。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坚决地捍卫了唯物主义。他们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成果，主要是批判地改造和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把它向前推进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统一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它们虽然肯定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但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它不了解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不了解思维对存在有巨大的反作用，不了解在实践的基础上存在可以转化为思维，思维也可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8页。

以转化为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肯定了社会实践的作用，在实践的基础上，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存在和思维的辩证关系，使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之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因此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那末要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就要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他们通过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现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成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

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建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实现了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中的革命变革。科学的自然观和科学的历史观的统一，就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因而实现了哲学领域中的革命变革。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科学发现之一。列宁也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崭新的哲学形态，还因为它包含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即辩证法。

在黑格尔哲学中，包含有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重要的成果即辩证法，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神秘的、抽象的，在它现成的形态上不适于研究自然和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费尔巴哈哲学一样，也是由于从黑格尔哲学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产生的结果，然而它与费尔巴哈哲学不同，黑格尔哲学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法被当做了出发点，并且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概念的辩证法不过是客观事物的辩证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

^①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①

马克思、恩格斯还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和社会历史领域。他们认为，“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②社会历史领域也是这样：“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③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彻底革命的。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④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造成的革命变革，还在于它把伟大的认识

①②③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8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

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哲学学说，除极少数以外，都是剥削阶级思想家所创造的，它们表现了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这些哲学都是为少数人的。在这些哲学当中，也有些是进步的，这是因为它所代表的阶级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表现出它们关心物质生产以及科学文化的发展，关心对反动的社会秩序的斗争。即使是这样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剥削阶级的哲学家，他们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对社会进行根本的革命改造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们不同，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用来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造旧世界和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而斗争的精神武器，因而它是广大群众的哲学，是反映群众的利益，为群众所理解，指导群众的革命实践以争取彻底解放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绝大多数都是为少数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们不敢承认自己的阶级性，总是要把自己说成是超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同，它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公然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解放事业服务的，为反对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罪恶制度服务的，公开申明：“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①同时，过去的哲学家们都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从此，马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页。

克思主义哲学再也不是过去那种囿于少数人的脱离实际的冥思玄想和空谈的旧哲学了，它的确是从未有过的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真正科学的哲学。这也从一个方面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认识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是一个崭新的哲学形态，所以它具有与以往任何一种哲学不同的本质特征：一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以往的唯物主义，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以往的辩证法，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虽然任何哲学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不论是唯心主义哲学，还是旧唯物主义哲学，它们都是错误的或是不完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概括各门科学的成果而得出的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世界观，也是各个领域中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唯一科学的方法论，所以，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统一。三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它本身就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永远同实践密切联系着的创造性的科学。四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哲学，即使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哲学，它至多只能在某些方面具有某种程度的科学性，决不可能成为完全科学的哲学，它们的阶级性和科学性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它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因此，

它需要而且也有可能彻底地揭示客观真理，它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是一致的。正如列宁所说的：“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但是，它并没有结束哲学的发展，相反地，它是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它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不断地向前发展。

^①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